HISTORY Students

中国读本

隋唐史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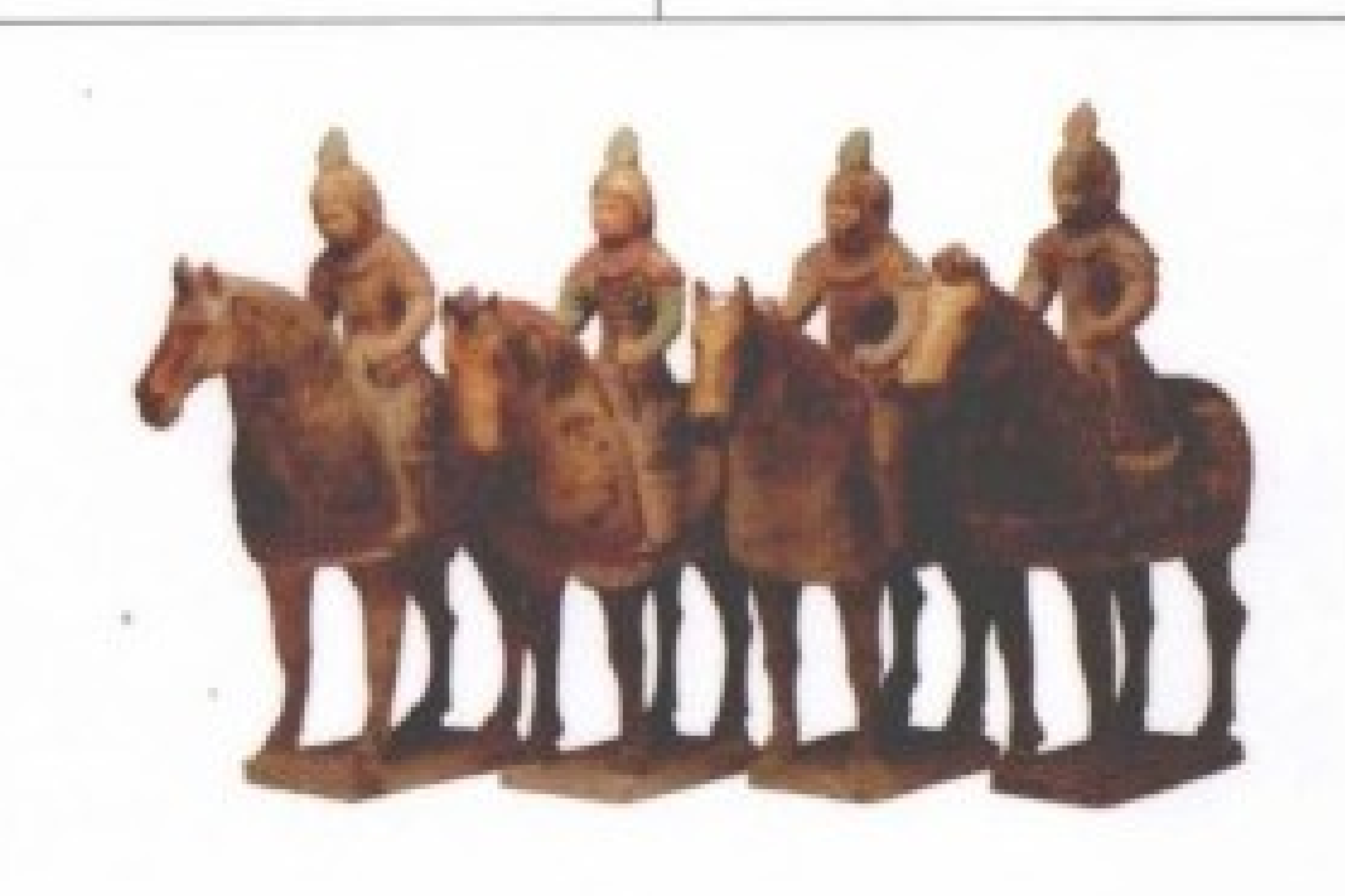
乌廷玉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历史特级教师鼎力推荐

《中国读本（史话分卷）》丛书是目前所见学生历史读物中最好的。一是丛书的各单本作者都是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这保证了内容的专业性；二是丛书的内容深浅适中，既体现了大纲要求，又有所拓展，可以作为课内知识的有效补充，很适合学生阅读。同时，本书也适合老师们作为资源来储备。

——白幼蒂（北师大附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市高级中学实验课本编委）

本套丛书是按照新课标要求进行编辑的，扣住了教学大纲，既体现了教学重点，又有适当的延伸，对拓展学生知识面很有必要，是一套质量很高的学生课外读物。

——李明赞（北京四中历史特级教师，国家新课标高中历史教材编撰者之一）

此书最大特点就是将知识、学术融为一体，既有严谨治学态度、科学辩证唯物史观，又能够栩栩如生描述再现一个过去，语言表达通俗易懂，人生哲理深入浅出，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层面要求，更有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的拓展。对于青少年学习、探究历史，《中国读本（史话分卷）》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范桂英（北京十五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

ISBN 978-7-5078-3082-8



定价：30.00元（上、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史话（上下）/乌廷玉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10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082-8

Ⅰ. 隋…　Ⅱ. 乌…　Ⅲ. 中国—古代史—隋唐时代—通俗读物
Ⅳ. K2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4320号

隋唐史话（上下）

著　　者	乌廷玉
责任编辑	李　惠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275千字
印　　张	20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09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082-8/G·1280
定　　价	30.00元（上、下）

目　录

第三章　唐朝的衰落

第四章　隋唐的文化

第三章　唐朝的衰落

安史之乱是唐朝从盛世走向衰亡的转折点。经过八年的战争，北方经济严重破坏，户籍紊乱，朝廷控制的人口减少2/3以上，中央政府直辖的军队比前期大大缩减，唐王期的政治形势从内重外轻转变为外重内轻。朝廷之外有藩镇割据，中央和藩镇之间的斗争，互有胜败，这是唐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延续了100余年。在朝廷内部有宦官专政和牛李党争（朋党之争）。宦官专政有时又和牛李党争纠结在一起，盘根错节，形成政治上不治之症，前后延续40余年。

唐朝中叶前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官员人数激增。贵族、官僚、商人都疯狂兼并土地，大批农民破产。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破坏，租庸调已无法征收，于是产生了两税法。两税法以钱计税，后来物轻钱重，人民加重了负担。

唐朝晚期吏治败坏，灾荒严重，赋役繁数，阶级矛盾尖锐化。公元9世纪末叶，爆发了黄巢起义，沉重打击了李唐政权。公元907年，唐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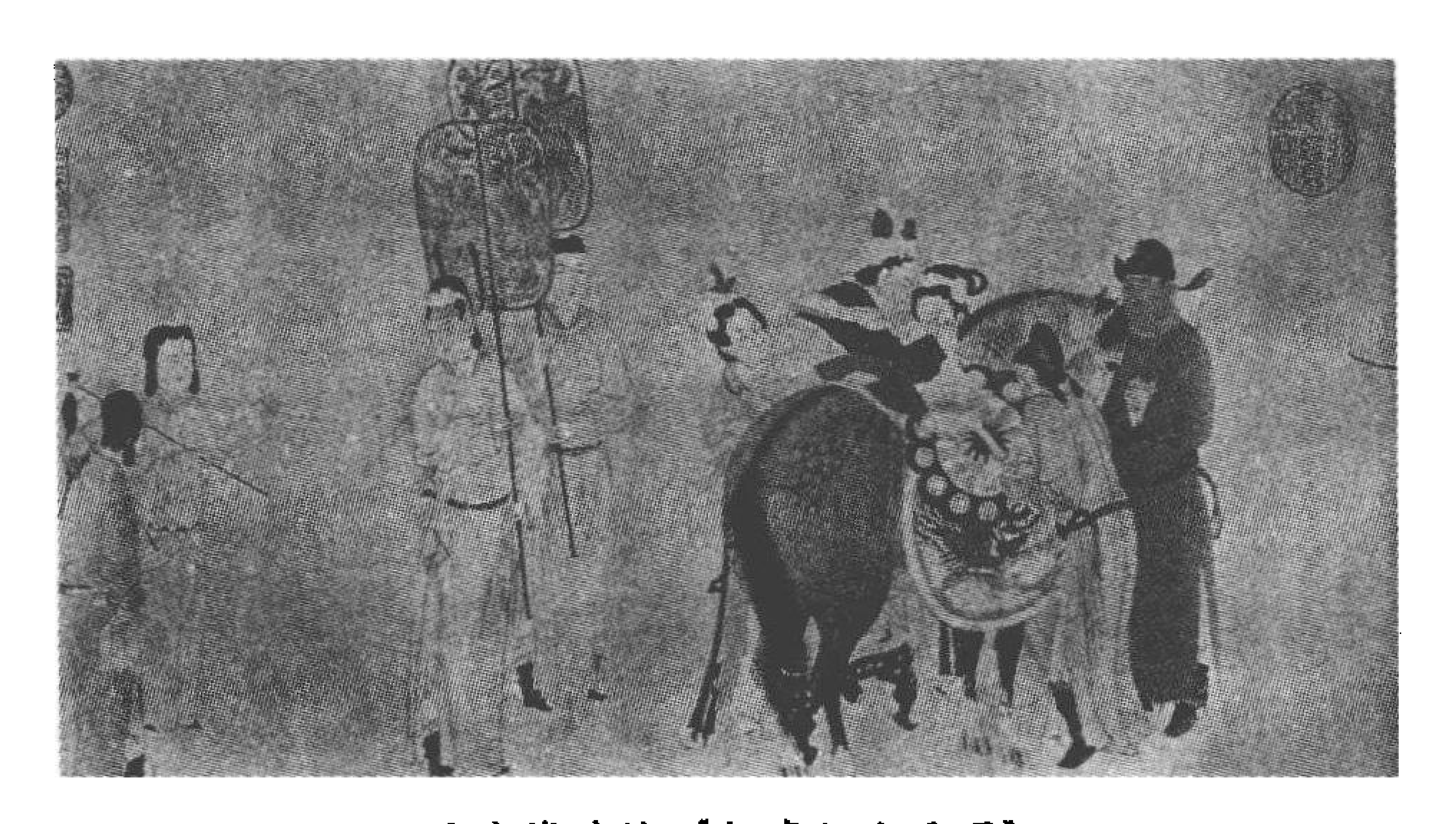
一、安史之乱的原因

开元末年，玄宗“在位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最突出的表现是不愿纳谏，不听忠言。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宰相张九龄、裴耀卿，因秋收未毕，建议改期。这个建议是对的。但李林甫等二相却逢迎玄宗说：“长安、洛阳不过

是陛下的东西宫罢了，随时可以往来行幸，何须选择时日？即使妨碍了农民收获，只要免去他们的租税就可以了。”认为可以即日西行，玄宗很高兴，就听从了（《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就在这年十二月，玄宗又听信李林甫的谗言，罢免了张九龄、裴耀卿，让李林甫当了宰相。这是唐朝政治衰败的标志。张九龄以忠直闻名，他被罢免以后，大臣们“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司马光说：“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他陷害功勋卓著的名将王忠嗣，杀戮揭发他的赵奉章，重信佞臣酷吏杨慎矜、王鉷、吉温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到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执政19年，是造成唐朝腐败政局的重要因素。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元代钱选绘《杨贵妃上马图》

李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当了宰相。杨国忠是纨袴无赖之子，和李林甫相似，也善于“迎合上意”，又善于搜刮民财，充实国库，因此取得玄宗信任。他执政以后，一身兼40余职，任

意处理事务，表示自己精明强干。对于正直有才能的人，百般诬陷。天宝十三载（754），他“恶京兆尹李岘不附己，以灾沴归咎于岘，九月，贬长沙太守。”国忠广收贿赂，积缣多至3 000万匹。这样的人执掌国政，更加速了祸乱的爆发。

政治腐败的另一表现是宦官干政。开元末年，宦官高力士不仅在宫中侍卫，而且外间进奏文表，须先经他审阅，小事他就直接处理。大臣宇文融、李林甫、安禄山、高仙芝、安思顺等人取得将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门。宦官成为玄宗权力的化身，太子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为阿翁，驸马呼为阿爷。高力士资产殷富，京城内外邸第田园，几乎一半为宦官所有。宦官干政加重了政治腐败和混乱。

在封建政治日益黑暗的情况下，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悲惨。天宝年间，租税十分繁重，贪官污吏肆意搜刮。“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五尺为丈者”（《通典》卷六《赋税典》下）。王鉷就是有名的搜刮能手。他任户口色役使期间，“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并征三十年者，民无所诉”（《通鉴》卷二百一十五）。

另一方面，天宝年间，唐军接连打败仗。安禄山败于契丹，高仙芝失利于怛尼斯，尤其是鲜于仲通和李宓两次败于南诏。天宝十载（751）“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有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通鉴》卷二百一十六）！由此可见，天宝年间的阶级矛盾已相当尖锐，一面是荒淫奢侈，挥金如土，另一方面是妻离子散，饥寒交迫。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深刻写照。

由于阶级矛盾的深刻化，统治集团的腐败，国力的虚耗，从而给安禄山起兵叛乱以可乘之机，这是安史之乱产生的基本原因。

其次，安史之乱是地方节度使反对唐朝中央政府的叛乱，而节度使这种封建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具有其历史因素。开元后期，

府兵制破坏，边将权势逐渐强大。在府兵制下，卫士轮番服役，将不得专兵。实施募兵制以后，当兵成为长期职业，他们和将领之间容易形成私人隶属关系，从而使军队逐渐变成个人武装。另一方面，府兵制破坏以后，边镇兵力扩大，首都周围军队减缩，唐初内重外轻之局转变成外重内轻，地方节镇势力强大。

至于天宝年间“蕃将”权势的扩大，主要是李林甫造成的。早在唐朝初期，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娄师德等。开元前期，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等，也由边帅入相。而“蕃将”，虽然忠勇双全（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也不能“专大将之任”。“蕃将”远征时，“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如阿史那社尔讨高昌，以侯君集为元帅；契苾何力讨高丽，李勣为元帅。朝廷这样做，不仅使边将不能久掌兵权，而且适当的约束“蕃将”，对于防止军阀割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李林甫掌权以后，“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皆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用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第三，在北边边区还存在着民族矛盾。从隋朝至唐初，有不少突厥人迁到幽州以北，在辽西又有不少奚和契丹人。他们仍保留着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他们生活上仍然是“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樊川集》卷九）。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都督赵文翙，虐待当地少数民族，“契丹饥不赈给，视酋长如奴仆”。当时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等十二州，杀了赵文翙，河北震动。这是营州民族矛盾的一次爆发。天宝以来，安禄山等对少数民族实行欺骗和高压政策，民族矛盾仍然相当尖锐。在天宝十四载以前，安禄山煽动并利用这种民族矛盾。据唐人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中记载：“禄山专制河朔以来七年余，蕴盖奸谋，潜行恩惠，东至靺鞨，北及匈奴，其

中契丹委任尤重。……前节度使招怀夷狄，皆重译告谕，夷聂之意，因而往往不传。禄山悉解九夷之语，躬自抚慰，曲宣威惠，夷人朝为俘囚，暮为战士，莫不乐输死节。”在起兵前，安禄山在契丹杂胡中选出八千精锐，号称“曳落河”，作为叛乱主力。天宝十三载，他为了收买人心，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升将军者500人，中郎将2 000余人。第二年，又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这样一来，安禄山叛军的骨干基本上是“蕃将”。不仅如此，而且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残酷屠杀汉人，唐军也进行报复。如张巡曾俘四百余人，对“胡兵”则“悉斩之”，对汉人则“散令归业”(《通鉴》卷二百一七)。可见安禄山叛乱不仅利用民族矛盾，而且激化了民族矛盾。

二、安史之乱的经过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坐着铁车，指挥10余万叛军，长驱南下。沿途唐郡县官员，或开城迎降，或弃城逃窜，或被叛军杀戮。唐政府狼狈不堪。

唐玄宗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最初不相信。叛军攻入河北，唐玄宗不得不仓促布防，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到洛阳募兵，10天之间得六万余人，并拆掉河阳桥（今河南孟县北)，防止叛军渡河；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三郡，防守黄河以南；在关中募兵11万，其中多为市井小贩和流氓，以皇子荣王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帅，宦官边令诚监军，统诸军屯驻陕州（今河南陕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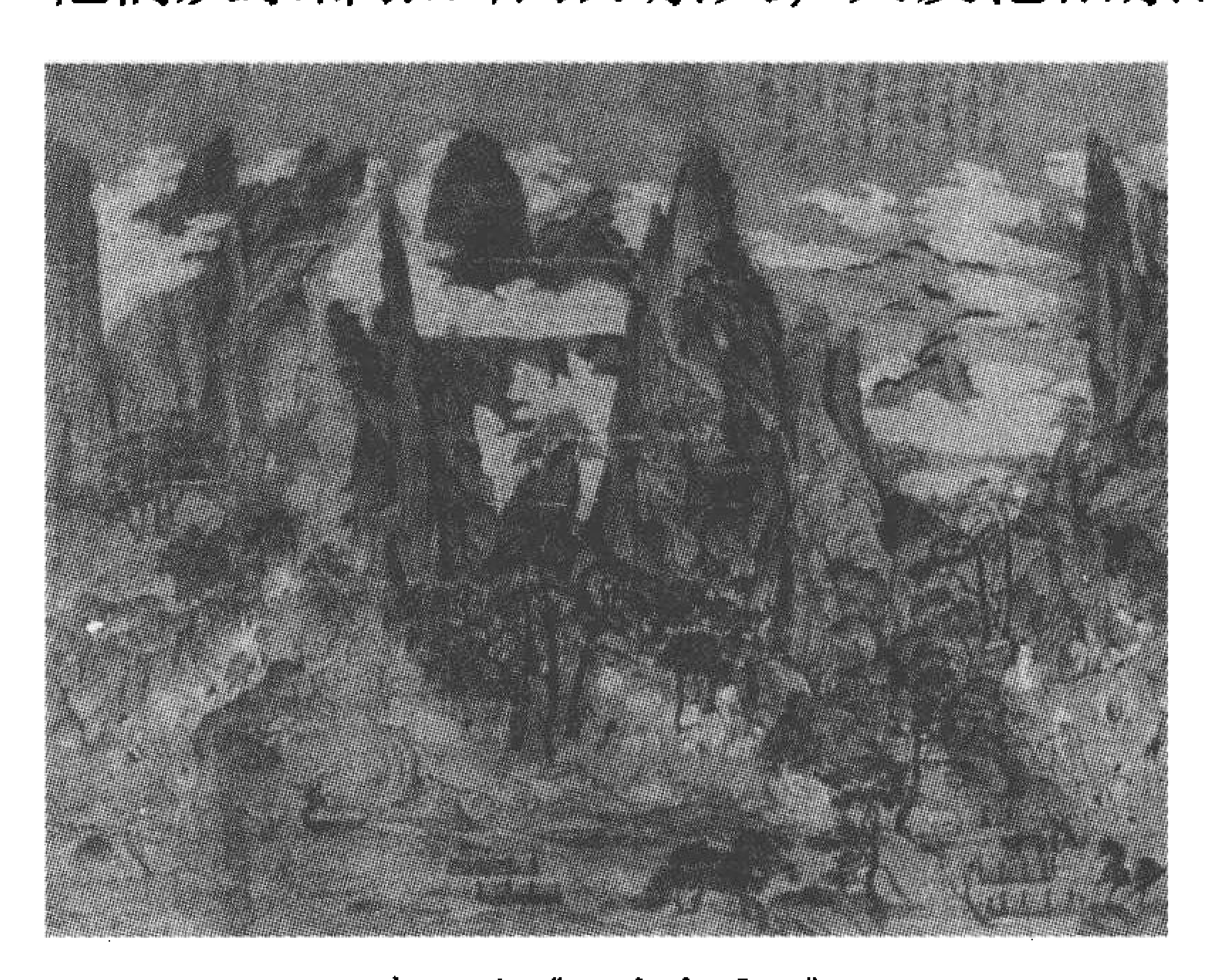
叛军既野蛮又残暴，他们“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为之负担，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戏杀之。”

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不久，攻陷长安。

二月，颜真卿领兵联合清河博平两郡兵，大破叛军，攻克魏郡（今河北大名)。河北唐军的声威，从此大振。同时，唐以李光弼

为河东节度使，率蕃汉兵1万余人和太原弩手3 000 人出井陉（今河北井陉），收复了常山，打败史思明，并夺回七县。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率兵出井陉，在常山和李光弼会师，共有蕃汉兵10余万人，迫使叛将史思明退守博陵（今河北定县）。河北人民为了保乡保家，自己组织起来，大者一二万人，小者数千人，各自抵抗叛军的侵扰。唐军在河北取得主动地位。

针对唐军在河北反攻的胜利，安禄山、史思明进行了新布置。他们从东都派出两万余人，又发范阳余部，合史思明军共五六万人，以保卫河南到范阳之间的后路。天宝十五载（756）五月，河北方面军攻势迅猛，郭子仪、李光弼大破史思明于恒阳城下，斩首四万余人。史思明坠马，扶断枪逃入营中，率残兵退守博陵。郭子仪进攻博陵，军威大震，河北十余郡纷纷杀叛军守将，归顺朝廷。唐军的胜利，使安禄山惶恐万分，把汉奸严庄、高尚召来骂道："你们叫我反唐，说是万无一失，现在起兵几个月了，连潼关尚未拿下。目前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受到四面围攻，万无一失，又在哪里？"



李昭道《明皇幸蜀图》

正当叛军准备离开东都的时候，唐玄宗又下了一道错误诏令，强迫哥舒翰打出潼关，进攻陕郡。哥舒翰预计这次出师难以取胜，因此捶胸痛哭，勉强引兵出关。唐军大败，哥舒翰被部下蕃将出卖，唐兵几乎全军覆没。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八日，叛军攻克潼关。唐玄宗狼狈出逃行至马嵬驿，随行将士杀了奸相杨国忠，又胁迫唐玄宗杀了杨贵妃。众怒平息，然后护送玄宗到达成都。

太子李亨被部下留在灵武主持军务，不久即皇帝位，这就是唐肃宗。

唐肃宗即位不久，郭子仪领精兵五万到达灵武。卓越的政治家

李泌来到灵武，支持肃宗平定叛乱。在李泌的建议下，以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率领唐军讨叛。

安史叛乱爆发以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或被叛军控制，或变成战场，人民流徙死亡。朝廷的经济来源，基本上依靠江淮以南供应。睢阳（今河南商丘）是江淮与关中间的交通枢纽，唐军控制睢阳，便可以防止叛军南下江淮。睢阳的战略地位极端重要。

至德二载（757）正月，安庆绪杀了安禄山，为了切断关中与江淮地区的经济联系，特派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率领檀、妫两州及同罗、奚兵13万奔袭睢阳。张巡从宁陵（今河南宁陵）率3 000劲卒支援睢阳，守军增至6 800余人。张巡督励将士昼夜苦战，一天冲杀20余回合，坚持了16天，结果活捉叛将60余人，杀敌2万余，士气倍增，迫使叛军暂时退却。

两个月以后，尹子奇又引兵进攻睢阳，张巡宰牛杀羊，激励将士，亲自扛着大旗，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叛军死伤3 000余人，奔逃数十里。过了几天，叛军又来围城，张巡率众反击，一昼夜间大战数十回合。尹子奇虽然受创，由于他在外线作战，兵粮随时得以补充，仍然坚持围城。一天夜间，张巡在城中鸣鼓。叛军听到城里鼓角之声，彻夜警备无法休息。天亮以后，张巡又把守军隐蔽起来，叛军不见城内有兵，便解甲休息。这时，张巡、许远、南霁云等十余名将领，各率五十骑，开城出击，杀叛军5 000余人。张巡打算射死尹子奇，只是找不到他，便削蒿为镞，射进叛军营内。叛军误认为唐军的箭支消耗已尽。尹子奇亲自出马督战。大将南霁云一箭射中了尹子奇的左眼，尹子奇疼痛难忍，伏鞍而逃。

七月，尹子奇又纠集几万叛军进攻睢阳，想报仇雪恨。当时城里粮食十分缺乏，将士每天只能吃一合米，杂以树皮茶纸充饥，士卒减员，只剩1 600余人，其中有些还是伤员，张巡加固城防工事，固守待援。叛军虽然用云梯钩车、木驴等进攻，都被破毁。尹子奇黔驴技穷，不得不停止进攻，在城外挖了三道壕，并设立木栅，准备长期围困睢阳。到了十月，城内连鼠雀都吃尽了。张巡的

妾愿杀身给将士果腹，张巡听其自刎。许远杀了自己的奴婢给士卒充饥。最后城内只剩400余人，饿病难支，睢阳终于陷落，张巡、许远慷慨就义。

睢阳战役前后延续十个月之久，以张巡、许远为首的唐军，仅仅以一万兵力，前后抵抗了二三十万叛军的反复围攻，大小战斗400多次，保卫了江淮财赋，赢得了时间，使唐军得以徐图反攻，对平定安史之乱做出了重大贡献。张巡、许远、南霁云等是唐王朝的忠臣，也是忠于人民的英雄。睢阳人民设立了双忠庙，悼念睢阳战役中死难的烈士。

安庆绪杀掉安禄山，自己称帝，史思明不服，叛乱头子内部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唐政府利用其矛盾，徐图反攻。

这年九月，郭子仪等率讨逆军在扶风等地集结，着手反攻。但是，唐肃宗缺乏依靠唐军取胜的信心，他派人勾结回纥怀仁可汗，对回纥说："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财帛子女皆归回纥。"这是多么卑鄙可耻的行径！

各路大军从四面八方集中长安以西，约十五六万，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在香积寺北与叛军决战，叛军大败，死伤有六七万人。当天深夜，叛军撤离长安。第二天，广平王率唐军进城，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

首都光复的消息传到凤翔府以后，唐肃宗非常高兴，文武百官前来祝贺。即日派宦官啖庭瑶到达成都，向太上皇报喜，敦请太上皇回銮。同时令广平王立即出关，收复东都。

这年十月，郭子仪引兵打出潼关，克服华阴（今陕西华阴）、弘农（今河南灵宝），迫使叛将张通儒退至陕郡。安庆绪发洛阳叛军，令严庄统帅，支援张通儒，企图阻止唐军东下。郭子仪大军在新店（在今陕县西）遇到叛军。郭子仪令回纥兵从山后绕到叛军侧面，自己麾军前进。叛军依仗人多士众，从高处下来，猛扑唐军。唐军前队多人受伤，逐步后退。忽然听到山口鼓响，千百支箭同时射向叛军。叛军发现回纥兵，知道后路被抄，吓得纷纷溃逃。

叛将严庄、张通儒等，落荒东走。郭子仪克服了陕郡。叛将严庄逃到东都。安庆绪非常惊恐，仓惶聚集党羽，星夜逃奔鄴城（今河南安阳市）而去。

唐军收复了东都，回纥兵进城肆行抢掠，弄得百姓妻离子散，家尽财空，骚扰了两天两夜，回纥犹不满足。郭子仪请示广平王，召集东都父老，募集罗锦一万匹，酬谢回纥，方算罢休。

宝应元年（762），唐肃宗病重，宫内斗争非常激烈。大宦官李辅国，勾结程元振，逼死唐肃宗，杀了张皇后和越王系，拥立李豫[①]为帝，即唐代宗。李辅国自命定策功臣，从此朝廷大权，尽入李辅国之手。

宝应元年（762）十月，以雍王李适为兵马大元帅，与仆固怀恩、郭英人等，会同回纥兵进行总反攻。各路大军云集东都以北，当时叛军十余万。仆固怀恩派骁骑与回纥兵绕道南山，和另路大军协同作战，在昭觉寺、石榴园一带，消灭叛军六万余人，俘虏两万余，最后史朝义只领数百轻骑东奔郑州。仆固怀恩收复东都，令其子仆固瑒率步骑万余人追击史朝义。

这时东都唐军不多，回纥进城后肆意杀掠，纵火十余日，这是东都人民八年来又一次被大劫。

宝应元年（762）十一月，由于形势所迫，叛将纷纷投降，黄河以北各地光复。广德元年（763）正月，范阳叛将李怀仙归降，唐政府派李抱忠接管范阳。史朝义想北投契丹，被李怀仙追击，他走投无路，缢死在森林里。历时八年的安史叛乱，就此结束。

三、安史之乱的影响

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① 李豫：初名俶，封广平郡王。至德二载九月，以广平郡王为天下兵马元帅。至德二载进封楚王。乾元元年三月，徙封成王。四月，立为皇太子。

首先，安史之乱破坏了北方经济。“（安）禄山步骑散漫，人莫知其数，所过残灭”（《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叛军的烧杀掠夺是北方经济破坏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回纥助唐平乱，进入洛阳后，“肆行杀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唐军也不例外，“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掳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通鉴》卷二百二十二）。乾元元年九节度使在邺城溃败时，“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在这样情况下，历史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几年间变得凋敝不堪，满目荒凉。最具体的表现是人口锐减。安史之乱前天宝十四载，全国户数为8 914 709，口数为 52 919 309。大乱以后只剩下1 933 134户，6 990 386口。此后虽有增加，但最多也来达到战前户口的一半。从此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对唐代户口影响之大，其中受破坏最大的主要是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具体是以下四个地区：即以洛阳为中心的汴、郑等地区、河北地区、长安周围各地和汴河沿岸。《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东至汴郑，达于徐方，北自覃怀，至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唐代宗《减京畿官员制》中指出：“今连岁戎旅，天下凋瘵，京师近甸，烦苦尤重，比屋流散……京畿户口减耗大半。”《减京兆尹已下俸钱制》载：“自顷艰难，且踰星纪，岁有事边之役，人多尽室之行，闾井萧然，百不存一。”唐代宗《缘汴河置防援诏》说汴河沿岸，“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全唐文》卷四十六）。

如果从唐代行政区来看，受战乱破坏最重的是河北道、关内道，其次是河南道、淮南道。

由于生产力的破坏，物资缺乏，物价高涨，斗米少则千钱，多者七千钱，比开元年间上涨 300 余倍。绢价涨到四千钱以上，比开元时提高 20 余倍。这就迫使人民“转死沟壑，离去乡闾”，在死亡线上挣扎。

其次，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广德元年(763)，史朝义兵败自杀，其部将纷纷投降。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唐军本应彻底消灭叛军残部。但当时讨伐军的统帅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故奏留（薛）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通鉴》卷二百二十二)。从此以后，河朔地区基本由安史降将占据。唐军在平叛过程中，一些将领的权力扩大，也独霸一方，不服朝廷。

第三，安史乱后边防空虚，中央政府的统治区缩小，少数民族奴隶主经常侵犯内地。天宝十四载以后，由于边防军主力到中原平定叛乱，留在边区者，多属老弱残兵，边防空虚。另一方面，在平叛过程中，边防军也损失惨重。如朔方军在中原作战，“东西南北，曾无宁岁，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边防军的消耗，更进一步削弱唐边防力量。代宗时，郭子仪指出：“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入近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臣所统将七，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

当唐朝边防力量日益破坏的情况之下，周围少数民族奴隶主，纷纷侵占边区。至德元载（756）十二月，吐蕃进犯威戎、神威军，强占石堡、百谷、雕窠三城。宝应元年（762)，吐蕃又占秦、渭、洮、临等州。第二年，吐蕃侵入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攻陷兰、廓、河、鄯、岷、成等州。至此，“西北数十州相继陷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后来长安经常受到侵扰。

吐蕃虽然占领河西陇右，并不满足，后又向西侵犯，大举进攻北庭、安西，虽有军民的反抗，到德宗贞元六年（790)，安西、北庭两都护府，终于失守。

在剑南道，有吐蕃和南诏先后的侵犯。至德元载（756）南诏攻陷了清溪关（今四川犍为县附近）。大历十四年（779），南诏又同吐蕃合谋，进攻茂州（今四川茂县），直达灌口（今四川灌县）被唐军击溃。到唐文宗时期，南诏甚至侵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宝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

第四，北方人口的南移。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北方部分人口南迁，迁移的地点最多是长江中下游，例如：

“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全唐文》卷五二九顾况《送宣歙李八郎使东都序》）。

“自艰难以来……不能自奋者，多栖于吴土，遂立延宾馆以待之”（《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四杜牧《崔公行状》）。在吴郡的人口中避难者占本地编户1/3。《全唐文》卷五百一十九梁肃《吴县令厅壁记》云：“自京口南被于浙河，望县数十，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原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

大乱以后，还有一部分人逃于汉水流域。李肇《国史补》云：“元结，天宝之乱，自汝墳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

在南迁的人当中，只有一部分是地主官僚，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对江南进一步开发起了一定作用。

四、反击吐蕃、回纥战争的胜利

唐政府虽然平定了安史叛乱，但是，以唐代宗为首的中央政府，不但没有从事变中吸取教训，改弦更张，恰恰相反，在宦官支配之下，当时的政治更加腐败。少数民族奴隶主集团，看到唐朝的虚弱，便得寸进尺，步步进逼。

早在安史叛乱的时候，安西北庭的部队调到中原平叛，西北边防空虚。唐肃宗时期，吐蕃奴隶主娑悉笼措赞派兵攻陷威戎河源军，并且占领廓、岷等州。唐代宗即位以后，吐蕃又攻陷临洮

（今甘肃岷县）。御史大夫李之芳奉令出使吐蕃，建议恢复睦邻关系，吐蕃奴隶主却非常嚣张，竟把唐朝使臣扣留。

广德元年（763）七月，吐蕃引兵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陇山东坡），接连又攻陷兰州（今甘肃兰州市）、廓州（今青海化隆）、鄯州（今青海西宁湟中一带）、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岷州、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渭州（甘肃陇西县）等地。边区官员向皇帝告急，大太监隐瞒不报，直到吐蕃攻入邠州（今陕西郴县），唐代宗才得知消息，仓促任命雍王适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帅，出镇咸阳（今陕西咸阳市）。雍王的名位虽高，但不懂军事。郭子仪闲居很久，他原有的部众早已离散，这次仓猝之间招募，只得骑兵数十名。郭子仪到达咸阳的时候，吐蕃兵已达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郭子仪派判官王延昌急赴首都，恳请皇帝增兵防守，宦官程元振又从中阻挠。只有渭北兵马使吕月将率领两千余众抵抗，结果失败，吐蕃兵直捣长安。唐代宗惊慌失措，携带嫔妃与雍王适出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

吐蕃进了长安，纵兵焚掠，城内萧然一空。郭子仪积极组织兵力，准备反击吐蕃。他到了御宿川，对王延昌说："你赶快去蓝田（今陕西蓝田县东南），用我的名义组织散兵游勇，然后从蓝田反攻长安，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把首都收复。"王延昌到达蓝田、商州以后，传达了郭子仪的命令。子仪在军中的威望一向很高，果然很多人欣然听命，跟随王延昌来到咸阳。郭子仪激励唐军，动员他们积极反击吐蕃，收复长安。这时，凤翔节度使高升和元帅都虞侯臧希让，各领兵数千人前来汇合，子仪的军威稍振。与此同时，鄜坊节度使段秀实和凤



郭子仪

翔节度使白孝德也发兵勤王。白孝德还率兵与河南道各路勤王兵汇合。各路军在郭子仪统帅下部署行动。子仪命令左羽林将军长孙全绪率数百骑出蓝田，同时又以数百人化装潜入长安，组织动员城内人民，从内部扰乱敌军，以便里应外合。郭子仪又调遣宝应军使张知节，率兵千余人，作为后援。长孙全绪到达韩公堆以后，白天击鼓，夜里点火，作为疑兵。长安城的吐蕃兵掠大量财帛以后正准备满载而归，长安城内纷纷传说郭子仪大军要从商州反击长安。吐蕃探马又报："韩公堆方面集结大量唐军，最近几天可能攻城。"同时，朱雀大街深夜常有鼓声大起，并有群众喧哗，似乎喊的是"郭令公"三个字。汉奸高晖听说郭令公要来，深夜逃出长安。吐蕃大将马重英，第二天也率众北逃。长安城内夜里的骚动，都是长孙全绪布置的。

吐蕃撤离长安以后，郭子仪立即向代宗报捷，并敦请代宗起驾回銮。

唐代宗听说长安光复，非常高兴，于是立即下诏，任郭子仪为西京留守，第五琦为京兆尹。子仪立即奉诏回京，令白孝德、高升分屯畿县。当时大太监程元振非常忌妒郭子仪，劝皇帝迁都洛阳。这个主张显然是错误的，终被唐代宗拒绝了。程元振多次隐瞒军情，贻误战机，各路将领都痛恨他。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弹劾程元振。唐代宗立刻下诏撤销程元振的职务，削职为民，"放归田里"。消息传出后，大快人心，振奋了将士们的斗志。

这年十二月，代宗回到长安，封赏靖难功臣，赐郭子仪铁券①，把他的画像悬挂在凌烟阁。长孙全绪白孝德等也被加官晋爵。同时也处罚一些人：广武王承宏，由于临敌潜逃，削爵为民；罢免苗晋卿、裴遵庆的宰相职务。

吐蕃离开长安以后，以代宗为首的最高统治者，认为赶走吐蕃

---

① 专赐给功臣者，其形如瓦，外面刻着功臣简历和功劳，里面刻着免罪减禄之数。在铁瓦上刻字，字嵌以金。各分左右，左给功臣，右藏内府，有事把左右合之以取信。

是佛光普照的结果，只要虔诚礼佛，万事可以逢凶化吉。有一次，唐代宗敕令文武百官到光顺门迎接活佛。这个活佛原来是宦官化装的，两旁有音乐卤簿护卫。队伍后边有两辆宝车，放着仁王经，从宫内领出，一直到西明寺。还令外国僧不空等坐在高处，讲经说法，文武百官穿着朝服听讲，其中包括宰相王缙、元载、杜鸿渐等，有时皇帝也出席。

永泰元年（765）九月，正在贵族官僚拜佛的时候，从奉天、同州（今陕西大荔）送来急报，说叛将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入寇，唐代宗还以为是谣言。这时，河中行军司马赵复送来郭子仪的告急书，说：叛将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分道入寇，其中吐蕃、回纥从北道趋奉天，党项从东道趋同州，吐谷浑从西道奔周至（今陕西周至），仆固怀恩率朔方兵给回纥作后卫，铁骑如飞，约数十万众。敌军来势很猛，要代宗速令凤翔、滑汴、邠宁、镇西、河南、淮西诸节度使，各出兵扼守要地，阻击回纥、吐蕃。

唐代宗立即令各道节度使火速派兵勤王。皇帝的诏令刚刚发出，又传来喜报，说叛将仆固怀恩途中患病，走到鸣沙，已经暴死。大宦官鱼朝恩、宰相元载等向皇帝致贺，并且说："佛法有灵，殛死叛贼！"代宗听了很高兴。隔了几天，风声又紧了。仆固怀恩虽然死了，但他的部将范志诚却领兵大举进攻泾阳（今陕西泾阳），吐蕃兵进逼奉天。在这种情况下，唐代宗不得不停止讲经求法活动，而考虑长安的防卫问题。他令郭子仪屯兵泾阳，抵抗范志诚；令大将白元光浑日进屯奉天；并调泽潞节度使李抱玉镇凤翔；渭北节度使李光进移守云阳（今陕西淳化）；镇西节度使马燧及河南节度使郝廷玉并驻便桥；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扼守东渭桥；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宪屯坊州（今陕西黄陵、宜君）；宦官骆风仙等屯周至。

唐代宗部署完毕，亲率六军，驻扎苑中，下诏亲征。

为了组织好这次反击战，不仅动员各镇支援首都，而且积极筹备作战物资，支援前线。大宦官鱼朝恩却乘势搜刮，勒索民间马

匹，并且令京城男人都着黑衣，冒充禁军，加强备战声势。当时城门开一塞二，全城大震，不少人吓得纷纷外逃。有一天，文武百官上朝，阁门很久不开。等开门以后，宦官鱼朝恩带领十几个禁军挺刃而出。他面对群臣说："目前回纥与吐蕃已达京郊，准备请皇帝陛下幸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各位大臣不知有何意见？"当时有的人没有主见，有的不敢表态。只有刘给事起来反驳说："你说这话是想背叛朝廷！现在各路大军云集关中，准备保卫首都。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你们不考虑怎样组织好力量反击敌人，反倒威胁陛下和你逃难，丢下宗庙社稷不管，这种行为不是背叛朝廷又是什么呢？"刘给事义正辞严的揭露批驳，使鱼朝恩张口结舌，不得已灰溜溜地走了。

由于战局吃紧，于是唐代宗召集群臣研究作战计划。正在热烈讨论的时候，忽然从奉天传来捷报：朔方兵马使浑瑊来援奉天，袭击吐蕃，斩首千余人，并俘虏一员大将。代宗听了非常高兴，立即遣使传令嘉奖。

吐蕃发现唐军陆续集中长安，就移兵进攻醴泉（今陕西礼泉），烧毁庐舍，蹂躏禾稼，掳男女数万口，准备逃窜。

永泰元年（765）十月，回纥奴隶主贵族也乘机进犯关中。他们在邠州和吐蕃相遇，就与吐蕃联合进攻泾阳。郭子仪正在这里驻防，他探知敌方人数很多，命令将士严加戒备，相持勿战。回纥、吐蕃见城守严紧，暂时退屯北原，第二天又兵临城下。郭子仪令牙将李光瓒赴回纥营，批评他们破坏和约，背信弃义，并且警告回纥大将药葛罗说："目前勾结你们的仆固怀恩已遭天殛，郭令公在此屯兵防守。如果你们愿意讲和，我们双方可以联合打击吐蕃；你们要想较量一番，现在就约定日期。"药葛罗未想到郭子仪还健在，惊讶地问道："郭令公既然在泾阳，可以让我们见一面吗？恐怕不在吧！"李光瓒说："我是郭令公派来的，怎么还说他不在这里呢？"药葛罗说："如果郭令公在此，请他出来面议吧。"李光瓒回来，把交涉情况报告了郭子仪。郭子仪说："现在敌众我寡，我们

很难以力制胜。我大唐王朝对回纥向来不薄，根据当前形势，我们只有加强攻心战。我亲自去见药葛罗，向他们陈明利害，希望他们退兵，争取不动干戈。”说完这几句话，郭子仪就准备出发。将领们主张选五百精骑随行，郭子仪说：“五百骑兵怎能抵挡十万人马？如果派五百人去，反倒给我惹祸。”郭子仪的三子郭晞急忙说：“大人身为国家元帅，不应轻易冒险。”郭子仪说：“目前回纥如果开战，我们父子都将牺牲，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现在我去向回纥说明和好的诚意，使双方和睦相处，不仅利国，而且也有益个人。假若药葛罗顽固不化，我为国捐躯，也问心无愧了。”郭子仪说到这里，拿起鞭子说：“去！”就立即走出门外，上马扬鞭，奔向回纥大帐。在距离回纥营帐不远地方，卫士前去通报：“郭令公来了。”大将药葛罗立即解下铠甲，上前迎接。郭子仪大义凛然，对药葛罗说：“回纥过去为大唐立功，朝廷待你们不薄，每年给你们送粮食和金帛。现在为什么自负盟约，深入我内地，杀我百姓，夺我财帛呢？你们目前这样做是弃前功，结后怨，背恩德，助叛逆。希望你们认真考虑，立即悬崖勒马，不要以为我们软弱可欺。”

药葛罗说：“我们上当了，唐将仆固怀恩对我们说：代宗皇帝已经宴驾，郭令公也不在世了。由于中国无主，因此我才敢冒犯。今天我们亲眼看到郭令公健在，才知道自己是受骗了。现在仆固怀恩已遭天诛，我们决不和令公作对。”郭子仪紧接着又对他说：“吐蕃背信弃义，利用中原内乱，不顾甥舅盟约，入寇京师，掠夺财帛，不可胜计，马牛杂畜，弥漫百里，这些财帛都是上天赐给你们的。现在我们双方业已和好，共同兴兵攻打吐蕃，夺其财帛，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千万不要错过。”药葛罗说：“我被唐将仆固怀恩所误，来到关中，实在对不起令公。现在我决心攻打吐蕃，以便赎罪。”说完以后，药葛罗立即召集他的将士，部署反击吐蕃的任务。这时，郭子仪派人取酒，与药葛罗共同宣誓。郭子仪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国将相万岁，今后我们如果负

约对回纥打仗，必死阵前，家族绝灭。”药葛罗也宣了誓言。郭子仪和药葛罗从容告别回城。

第二天，药葛罗派其部将石野那等，到京城拜谒唐代宗，表示双方和好的决心。

与此同时，唐政府派奉天守将白元光等和回纥共同追击吐蕃，在灵台西原打败吐蕃。白元光把夺回的财帛给了回纥，并抢回关中被俘男女四千余口，药葛罗也收兵回了自己的驻地。

五、藩镇割据局势的形成和“奉天之难”

藩镇割据是唐朝后期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之一。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开元十二年（724）以前实行府兵制度，当时多数军府分布在关内、河东、河南道，形成“居重驭轻”、“举关中以临四方”的“内重外轻”局面。后来均田制破坏，大批小农破产，府兵制度也随着瓦解。实施募兵制以后，节度使长期专兵，朝廷直接掌握的武装大大减缩，中央政府的实力显著衰弱，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形势。

藩镇节度使拥有经济实力割据一方。节度使在经济上有独立自主权，他们不仅掌握本镇数州的税收，而且天宝以来，节度使一般都兼营田使，管辖本镇的屯田营田事务。如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朝廷准备调他任淮西节度使，他上表说：“臣去秋种得麦，请待收麦毕，赴上。”借此理由拒绝朝廷的命令，可见山南东道肯定有屯田区。又如幽州节度使朱滔，使其部将刘怦“广垦田，节用度”。这些屯垦的土地收入都由节度使掌握。此外，节度使自己还有私田，如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多买田伊阙陆浑间，以舍山棚”[①]，而且利用“山棚”反对朝廷。魏博田承嗣、成德李宝臣、卢龙李怀仙、淄青李正己等，都是“户版不入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

① 山棚：指迁移无常，强悍善斗者。

他们本来都是安史的部将，后来又是朝廷直接任命的节度使，有不少人也控制本州的财权。如宣武节度使韩弘镇守汴州等地20余年，“四州征赋，皆为己有，未尝上供。”为了维护其集团的利益，他们拒绝中央政府的干预，甚至以武力反对中央政府。



清代砖雕《郭子仪上寿图》

藩镇所以能割据，还由于他们有一支强悍的武装，特别是他们都有“牙兵”。这些“牙兵”和节度使建立义父子的关系，待遇优厚，世代相袭，假借封建宗法关系，以维护主将的权势。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有“牙兵”两千人，又称“外宅男”。武宁节度使的“牙兵”叫“银刀、雕旗、门枪”等。

在平息安史之乱的过程中，由于仆固怀恩父子“私欲树党，以固兵权”（《旧唐书·李怀仙传》），代宗不察，根据仆固怀恩的表请，授给安史降将节度使职务。河北诸镇首先形成割据。在平息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的很多节度使的力量也大大加强，他们在内地各占一方，据地自专，不听从朝廷的调遣，也形成割据。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主要情况如下：

魏博镇：从田承嗣开始，占有魏、博（今山东聊城县）、贝（今河北清河县）、相、卫（今河南汲县）、磁（今河北滋县）、洺（今河北邯郸市东北）等州，镇治在魏州。

相卫镇：从薛嵩开始，传至其弟薛萼时，被田承嗣吞并。

镇冀镇：即成德镇，从李宝臣开始，割据恒（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县）、易（今河北易县）、深（今河北深县）、冀（今河北冀县）、赵（今河北赵县）等州，镇治在恒州。

卢龙镇：从李怀仙开始，割据幽、涿（今河北涿县）、莫（河北旧雄县）、瀛（今河北河间）、平（今河北卢龙）、蓟（今河北蓟县）、妫（今河北怀来）等州，镇治在幽州。

淄青镇：从侯希逸开始，割据淄（今山东淄川镇）、青（山东益都）等15州，包括今山东全境，传至李师道时，被朝廷平灭，分为三镇。

宣武镇：从李灵曜开始，所割据之地时有变动，大体在汴（今河南开封市）、宋（今河南商丘市）、亳（今安徽亳县）、颍（今安徽阜阳）等州。宪宗时其内部兵乱，朝廷另派节度使，归唐掌握。

淮西镇：从李希烈起，割据申（今河南信阳市）、光（今河南潢川）、蔡（今河南汝南）等州，后来到吴元济时，被朝廷平灭。

在割据的藩镇当中，节度使的官职，或父子相传，或由部将拥立，不接受朝廷指派。有一部分节度使不仅独霸一方，不受皇帝约束，而且有时联兵攻打朝廷。其中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奉天之难”和“四王之乱”，这里只以“奉天之难”为重点，说明藩镇反抗朝廷的情况。

建中四年（783）正月，李希烈陷汝州，遣别将取尉氏，围郑州。朱滔、王武俊等遣使拥护他叛唐称帝。唐德宗命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兵1万余人，讨伐李希烈，同时勅令东方各道出兵合击之。江西节度使曹王皋奉令占领蕲、黄二州。八月，李希烈率3万人围攻哥舒曜于襄城（今河南襄城），德宗调泾原兵解襄城之围。泾原兵过长安时，京兆尹王翃本应奉旨犒劳，但王翃毫不赏赐而且招待不周，将士特别气愤，说：“我们冒生命危险出征，到京城连顿好饭都吃不上，怎能到前线拼命呢？京城的琼林库装满金银财宝，何不自己动手去取呢？”节度使姚令言等部署泾原军披挂铠甲，扛起大旗，直奔京城。唐德宗立即派宦官出城，拿着锦缎，每人发给两匹。士兵更加愤怒，

说："我们进京不是为了两匹绢。"把宦官一箭射死，蜂拥冲进京城，直到宫城的丹凤门。德宗令禁军出来平乱，但没有想到京城招募使白志贞所募的禁军，多是吃空饷的，到了用兵之时，根本没人来，只好带着王贵妃、韦淑妃等人从宫城后门逃走。幸亏是王贵妃想着，把玉玺放在衣服里带出来。当时普王谊当先锋，太子殿后，郭曙、令狐建和大宦官窦文瑒、霍仙鸣率左右百余人随行，加上卫队共500余人，直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唐德宗出走以后，叛军打进宫城，进了含元殿，大掠府库。同时长安居民也乘势进宫，抢夺国库及皇室财物。叛军头子姚令言感到自己威信不高，把下台的大军阀朱泚弄出来作招牌，协助他夺取天下。这样一来，朱泚便当上叛军大头领。



唐德宗

唐德宗离开首都两天以后，文武百官才知道皇帝业已出走，于是也跟着来到奉天。金吾大将军珲瑊拜见皇帝反映京城情况，并向德宗建议说："朱泚当了叛军头子，后患无穷，不可不备。"德宗立即任命珲瑊为行营都虞侯兼京畿渭北节度使，同时向天下各道节度使告急，令全国各道勤王。宰相卢杞很不满意地说："朱泚忠贞不二，群臣莫及，为什么说他作乱呢？臣愿以百口之家保他不会谋反。"唐德宗最初也认为朱泚不会反唐，天天幻想朱泚迎自己回宫。不料朱泚已经阴谋篡位，光禄卿源休，还有李忠臣、张光晟、蒋镇、彭偃等，都支持朱泚当皇帝。在长安，只有司农卿段秀实不和他合作，与刘海宾、岐灵岳等合谋，准备诛杀朱泚。

不久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改年号"应天"，杀李唐宗室多人，并派使者告知朱滔说："三秦之地，指日可下，黄河以北，委托兄弟收复，最后我们兄弟二人会师于东都。"朱滔得到这个消息以

后，洋洋得意，并通知各道，借以炫耀自己。可见“奉天之难”是关中军阀与河北军阀互相勾结造成的。由于朱泚的叛变，不少割据的藩镇更加猖狂，襄城被攻陷，哥舒耀退保洛阳。

这时，也有些节度使支持德宗讨叛。龙武将军李观率卫兵千余人奔奉天勤王。唐德宗令他招兵，几天之间得5 000人，布列通衢，旗鼓严整，奉天城因而逐渐稳定。泾原兵马使冯河清等，听说唐德宗被逐，大骂姚令言，并召集将士，涕泣宣言：“誓死保卫皇室”。还筹备甲兵器械一百余车，运到奉天。当时奉天正缺乏各种兵器，得了这些支援，更提高了反击的信心和决心，唐德宗立即提升冯河清为泾原节度使。

为了防御朱泚的突然袭击，唐德宗令邠宁留后韩游环、庆州刺史论惟明、监军翟文秀，率兵3 000，把守奉天与长安间的要道——便桥。韩游环在途中探知叛将姚令言和张晟已经从京城出发准备围攻奉天，于是他引军归奉天，与珲瑊并肩战斗，保卫奉天城。

朱泚、姚令言的军队到达奉天城外，珲瑊与游环出战不利。珲瑊久经战阵，足智多谋，沉着应战。朱泚亲自督众攻城。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开城迎战，中箭身亡，将军高重捷战死。但朱泚攻城都未能得逞。

唐德宗为了增强奉天的防卫力量，曾派了不少使者带着敕旨到各地去，令各地节度使火速派兵护驾。当时大将李晟接到敕旨，立即率4 000人从定州（今河北定县）出发。十一月，李晟自蒲津（今陕西大荔县东）过河，到达东渭桥。李怀光带兵5万来援，到了蒲城（今陕西蒲城）。马燧派司马王权将兵5 000屯中渭桥（今陕西咸阳东）。朱泚党徒只占一座长安城，屡次作战，又多失败。朱泚很着急，就下令猛攻奉天。他们特制一架云梯，高广数丈，上容500人，云梯下架着巨轮，前来攻城。珲瑊急令士兵暗凿地道，通出城外，储薪蓄火。龙武将军韩澄看城东北角最宽广，足容云梯，就急令搬运膏油松脂等引火之物，储积城上。朱泚指挥叛军加

紧围攻城南。唐将韩游环认出这是声东击西的诡计，迅速加强了东北城角的防御力量。果然不出唐将所料，叛军的云梯正好搭在东北城角。唐军燃起火具，叛军不敢接近，暂时退走，等火灭以后，又来进攻，情况十分紧急。

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大将珲瑊请求皇帝发给空白告身（委任状），组织敢死队。珲瑊也表示：万一奉天失守，就以死报国。凑巧，叛军云梯辗着地道，轮子陷在地里。地道里放出火来，一声巨响，浓烟冲天，叛军云梯化成灰烬。珲瑊立即向皇帝报告。唐德宗派太子督战，分兵成三队，从三个门出发追赶叛军，叛军大败。朱泚听说唐军来援，派兵阻击失败，就收兵赶回长安，奉天才算解围。

朱泚回到长安，并不认输，又和李怀光勾结，阴谋重新组织力量夺取奉天。兴元元年（784）二月，李怀光反，李怀仙派赵升鸾潜入奉天策反。由于形势的紧急，唐德宗令戴休颜等守奉天，他带领朝臣逃亡梁州（今陕西汉中）。

这年五月，唐军开始大反攻，珲瑊与李晟东西并进。珲瑊、韩游环、戴休颜等进攻咸阳（今陕西咸阳市），李晟与骆元光、尚可孤等，东略长安。有的将领主张先攻外城，李晟认为外城坊市狭隘，行动不便，叛军如果出伏兵格杀，扰害居民，不如先取宫城，腹心一溃，叛军就心灰意冷了。众将都认为这是上策。大将李晟引兵到光泰门外，督众筑垒。堡垒尚未修完，叛将李希倩、张庭芝率众来战。兵马使吴锐等出阵迎敌，双方鏖战，各不相让。大将李晟亲自率众前进，把叛军冲散，一直追进光泰门，因天色已晚，才不再追赶。第二天，李晟又出兵攻城。有人主张等待友军前来一同夹攻叛军，李晟很严肃地说道："目前叛军大势已去，如果等友军到达以后再打，实际就等于给叛军以喘息的机会，将来进攻就更困难了。"这天晚间，尚可孤、骆元光率众到达，李晟叫他们休息一夜。第二天，李晟组织大反击，终于把叛军打出了长安。

另一路唐军，在浑瑊率领下，克复了咸阳。

朱泚从长安败走以后，奔往泾州（今甘肃泾川），沿途部众尽散，只剩骑兵数百人。当他走到彭原（今甘肃庆阳）时，被部下刺死。

兴元元年（784）七月，流亡十个月的唐德宗又回到长安。

六、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两税法

早在唐朝以前，就存在地主田庄。在唐初均田制盛行时期，土地集中的程度还不十分严重。后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田庄越来越多，终于取代了均田制度。因此，地主田庄发展的过程，也是均田制破坏的过程。

均田制度的破坏有三个原因：一是官员的增多和人口的自然增殖，使分受永业田的人越来越多。早在唐初，九品以上官员的数额还是比较少的，高宗时，九品以上官员已达1.3万余名，武周以后更多，而九品以上的官员又都有权取得永业田。因此，均田制度推行百年以后，大量可耕官田或荒地必然以分受永业田的名义转变为私田。官田和可耕荒田日益减缩，以致使均田制度无法推行下去。

均田制度破坏的另一原因，是地主对土地的兼并。高宗武后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官僚、贵族、地主、商人都疯狂兼并土地。7世纪末叶以来，伴随科举制度的发展，巩固了新官僚地主在政治上的势力，他们兼并土地的气焰也日益嚣张。这批人多数出身于中小地主或是商人，原来就善于经营财富和巧取豪夺。这些官僚贵族和新起的暴发户对均田制的破坏也很严重。

贵族官僚商人兼并土地的事实很多，如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田园遍于近甸膏腴”，并且兼营工商业。宰相李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碾，利尽上腴。”吏部尚书卢从愿占地数百顷。大官僚李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

口，别业相望。”至于商人豪强兼并土地的事更多，如高宗时大富商邹风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河南道的屈突仲任，“家僮数十人，资数百万，庄第甚众”。天宝时期相州王叟，“富于财，积粟至万斛……庄宅尤广，客二百户”。

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早在永徽年间，唐高宗曾下诏禁止非法买卖口分田，“诏买者还地而罚之”。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亲自下诏，严禁非法兼并口分永业田，“若有违犯，科违敕罪”。这次禁令虽然比过去更加严厉，但因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禁令虽严，收效甚微。到了天宝年间，土地兼并的势头更是有加无已。

农民的逃亡和户籍的紊乱，是均田制度破坏的另一因素。高宗、武周以来，战争频仍，兵役徭役征发频数。府兵衣粮既属自备，战争频数，必然迫使农民倾家荡产。宰相狄仁杰说：“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到了武周中宗时期，“天下户口，逃亡过半”（《旧唐书·韦思谦传附韦嗣立传》）。

均田农民破产逃亡以后，多数人变成地主的庄客或其他封建依附者。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严重破坏，广大农民或死或逃。同时唐朝的统治机构陷于半瘫痪状态，户籍紊乱不堪，均田制度便全面崩溃。

均田制破坏以后，唐朝虽然存在着官田，但为数不多，地主田庄遍布全国各地。

田庄在唐朝有很多名称，如庄、庄田、庄宅、庄院、别业、墅、庄墅、田园，也有少数叫庄园的。这种田庄就是统治阶级田产经营组织（有时包括房舍碾硙等）的通称，“庄”早在南北朝就出现了，到隋唐极为普遍。如唐高祖李渊的庄在关中的鄠县，他在太原起兵时，平阳公主曾利用这个庄组织地方武装，支持李渊争夺天

下。唐太宗的宰相于志宁，在关中有祖传的田庄，他甘愿把皇帝赐他的土地让给张行成。

高宗时期的王方翼，早年跟他母亲住在风泉别业，王方翼督庄客力耕，数年之间，垦田几十顷。他还大兴土木，建筑楼阁，栽植花木，成了大富翁。

宋之问在蓝田（今陕西蓝田）有田庄，称辋川别业。

汾阳王郭子仪，前后受赐的良田名园甚多，又兼并不少田庄，成为唐朝的大地主。据孙樵的《兴元新路记》说，从黄蜂岭到河池关，中间百余里，都是郭家私田。

唐德宗贞元年间，沈聿有别业在城邑西郊。常州录事参军李哲，家在丹阳（今江苏南京市）东郭，五里以外有庄。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毗陵（今江苏常州市）。叶县人梁仲朋，家在汝州（今河南临汝县）西城，渠西有小庄。元和年间，天水人赵平原在汉南有别墅。唐文宗开成年间，卢涵的家在洛下，有庄在万安山阴。

唐宪宗的宰相裴度，在洛阳有午桥庄，种花木万株，筑凉台和避暑馆，庄内播种谷物。

武宗的宰相李德裕，在洛阳置平泉庄，周围10余里，台榭百余所，有奇花异草，禾黍繁茂。

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在职期间，吞并境内涂山甫等庄宅122所。

侍郎司空图在中条山王官谷有大田庄，周围10余里，北岩有瀑泉流入谷中，灌良田数十顷。

唐末宰相韦宙的江陵别业，是全国有数的大田庄，生产规模很大，他积谷七千堆，号称“多谷翁”。

下台的县令严部，有良田万顷，桑柘成荫，禾苗遍地。

也有一些田庄规模甚小，只有一二顷地，或数十亩地，庄主必须搞点副业方可维持生活。

除了官僚地主和商人地主以外，还有不少寺院庄田。例如：少林寺的柏谷庄，有田 40 顷，水碾 1 具。大象寺有田庄 7 所，土地 53 顷 6 亩。长白山醴泉寺，有田庄 15 所。

田庄内部以农业生产为主，如相州王叟，有庄客 200 余户，积粟万斛。农业以外，庄客还经营家内纺织业，产品主要是为了自用或交税。长江以南的某些田庄，还经营茶园。

有一些田庄的土地比较集中，能够连成大片；也有些田庄的土地比较零散，分成很多块。从全局看，唐朝多数庄田并不是完整的具备多种生产部门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但也有一小部分田庄坐落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地主住在庄里，直接指挥生产，他们在庄内"树之谷，艺之蔴，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柳宗元集》卷二十四《送弟谋归江陵序》）。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至于田庄的经营管理方式，贵族官僚一般都以庄吏或家仆收租，也有些地主自己经营，亲自监督生产，如王方翼、陆龟蒙等。

田庄的直接生产者是庄客，唐人有时把庄客也叫客户、庄户或私属等。庄客的经济状况不同，他们的身份地位也有区别。唐朝的庄客大体有两种：第一种庄客，除了土地以外，具有部分生产资料如耕牛、农具等，这是他们争取人身自由的物质条件，地主对他们的人身控制比较松弛，具有较多的人身自由。这种庄客除了给地主交纳地租以外，不服劳役或者少服劳役。例如颜真卿的田庄在郑州，他"从雍州遣家仆往郑州征庄租"（《太平广记》卷三十二）。刘晏的判官李邈，田庄在高陵，"庄客悬欠积五六年，邈因罢官归庄，方欲勘责"（《酉阳杂俎》卷十三）。又如泾州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给与农，约熟归其半"。由此可见，颜真卿、李邈、焦令谌等，都不是经营地主，他们自己不监督生产，同时也不派庄吏管理生产。有的只派家仆收租，有的佃农甚至拖欠多年地租。这类佃农，主佃之间显然没有严格隶属关系。

当时一亩地的地租大约是五斗至一石。庄客租种土地，通常是

订立契约，根据契约的规定交租。如果租粮的数量和质量不合契约中规定的要求，庄主要增加地租或夺佃。

唐朝还有一种庄客，是严格隶属关系下的佃农，社会身份很低。唐德宗的宰相陆贽说："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

从这段话可以了解，这一部分庄客不仅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而且也没有生活资料，他们不得不使用地主的耕牛和种子，甚至住地主的茅舍，利用地主的土地埋葬父母。由于这种庄客一无所有，从而他们的人身自由也被剥夺，变成地主的"私属"，就是一种近于奴婢的庄客，一种依附性很强的劳动者。

总之，在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均田制度彻底破坏，大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因此，建基于均田制度基础之上的租庸调也无法维持。适应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便产生了两税法。

两税法的产生，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早在唐代宗时期，即开始改变税制。广德二年（764），征收青苗钱，每亩十五文，补充"百官课料"。青苗钱是一种新税，一直征收到建中元年。

税制的另一变化是地税大幅度增加，唐朝前期，地税亩收二升。永泰元年（765），京兆尹第五琦利用京畿麦熟之机，下令征收什一税，即十分取一。后来取消什一税之名，改征夏秋税。大历四年十二月以后，在短短四个月里，两次下诏解决地税问题。第一次是在十二月，内容是把土地划分两等收税，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五升，荒田新开佃的，每亩税二升。到了大历五年三月，又进行调整，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七）。

从史料上看，夏秋税是在京兆府征收的，估计其他地区也相似。大历年间地税的演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地税数量大大增加，每亩从二升提高到一斗以上；二是地税从此分夏秋两次征收，

分期交税的制度，和后来的两税法具有密切关系。

唐代宗时期税制另一重大变化是户税，《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大历四年条写道："天下及王公已下，自今以后，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馀品并准依此户等税。……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纳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

这个诏令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户税的数量显著增加，例如八等户，天宝年间只收 450 文，现在上升到 700 文。过去九等户收 220 文，大历四年增至 500 文，增长的幅度大约一倍左右。

第二，在天宝以前，工商业者的税比较重，一般是"加本户二等"。大历四年，取消了加重纳税制度，只按实际财产纳税。唐政府之所以减轻工商者的负担，主要是因为唐朝后期社会经济遭到破坏，百废待兴，减轻他们的负担，以提高其发展工商业的积极性。

第三，扩大了各级官员纳税的范围，诏令规定："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从而使每个官员，都成了一个"户税"的单位。唐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扩大税源。

第四，寄庄和寄住过去是达官贵人的特权，他们如果离开本乡在外地购置田产，过去是不纳税的。到了大历四年（769），寄庄户和寄住户一律加等纳税。这种规定当时算是一件大事，据唐代著名理财家杜佑说，这个决定"近于晋宋的土断"。当时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中原经八年大乱以后，人口流徙甚多，其中有些人到江

南侨居，购置田产，作久居的准备。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使流动人口就地注籍纳税，对朝廷是有利的。

第五，适应军事的需要，对于各级军职人员予以优待，减轻他们一些负担，以便缩短战争时间，恢复残破的农村。

大历四年调整户税的诏令虽然对朝廷有利，但并没有认真执行。例如大历八年，舒州刺史独孤及说：舒州百姓和浮寄户共33 000户，而实际纳税者仅3 500户，还有29 500户，“不持一钱以助王赋”。

总之，唐代宗时期，除了租庸调以外，增加了地税户税税额，并创立青苗地头钱等新税目，以致税制非常紊乱。到了唐德宗时期，政府为了稳定税源，简化纳税手续，积极整顿税制，实施了两税法。

所谓“两税”，就是“夏秋两税”，并不是户税和地税两种税，它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两税的数量是建中以前各种税的总和。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时，无论全国和各州县，都有一个定额。这个定额是怎样产生的？据中书省建中元年二月起请条说：“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徵税数，及人户主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什么叫“旧徵税数”？德宗的宰相陆贽说：“乃搜摘郡邑，刻验簿书，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从这两段史料看来，建中元年两税的税额，就是大历年间某年各种税的总和。这里面既有残余的租庸调，又包括户税、地税、青苗地头钱及其他苛杂。在实行两税法的时候，就是把全国各地不同的“旧征税数”，以各道州府为基础，重新摊配一下。除了夏秋两次征税原则普遍适用以外，两税仅仅是开创了随地摊派的精神，从此全国失掉了统一的税率。

两税税额的具体数字，从全国看，概如下表：

全国两税总额
- 钱 3 000 余万贯
  - 供外费 2 050 余万贯
  - 供朝廷 900 余万贯
- 米麦 600 余万石
  - 供外费 400 余万石
  - 供朝廷 200 余万石

第二，两税法另一特点是“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这就是说，两税定额无论州县和个人，都是用钱计算的，实际交纳时，则是钱物都收。由于多数纳税者没有现金，所以多以绢绫或粮食折交两税。这样一来，物价的变动，对纳税者的负担有很大影响。如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以后，由于市场的货币流通量不足，从而使物价下降，但纳税者只有实物没有现金，他们只能以绢绫或粮食交税。因此，物价下降以后，由于税钱不变，从而纳税者的负担必然加重，甚至交不了税。在这样情况之下，唐政府为了使税户都能交税，在折价时采取一个“虚估”的办法。所谓“虚估”，就是用高于市场的实际价格，来折算纳税人所提交的实物，使纳税人减少一点损失。问题是“虚估”的标准怎样掌握，“虚估”和市场价格的差距怎样定？各地须要有一个接近一致的标准。因此，在唐穆宗时期，宰相裴垍以尚书省的名义，定出一个“虚估”的标准，称为“省估”，令全国按“省估”标准收税。中央政府虽然制定了“省估”，但有些节度使或刺史，为了增加收入，并未认真执行，自己仍按“实估”征税，残酷剥削人民。

以上就是两税法的特点，现在看看中央政府实收两税的数量和执行情况。

在安史之乱以后，河西陇右被吐蕃占领，河北四镇长期割据，这些地方自然不上交两税。为了防御吐蕃、回纥的进攻，在长安西北的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武、天德等镇，驻兵 30 余万，朝廷批准这些地方的两税“不上供”，只供驻军粮饷。因此，经常向中央政府上交两税的，只有浙东、浙西、福建、宣

歙、淮南、江西、鄂岳、湖南、剑南东西道。两税每年收入的总数如下：

时　间	朝廷所管户数	每年税入	史料来源
建中元年	3 100 000 户	30 000 000 贯石	《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七
元和二年	2 440 254 户	35 251 228 贯石	《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元和二年
开成二年		35 000 000 贯石	《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七

从这个表看来，唐中央政府两税、盐利的收入，每年约 3 500 万贯石，如果扣除 700 万贯盐酒专卖钱，还有 2 800 万贯石。

从形式上看，征收两税是“以资产为宗，不以人丁为本”。实际上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时，并没有进行资产普查，而是根据大历年间各地的旧税总数，改变税名，变成两税税额的，人民的实际负担很不合理，因此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元和六年（811），刺史吕温说：衡州旧有人户 18 407 户，除赤贫死绝老幼以外，交税者只有 8 257 户，其中因种种原因隐漏者 1 万余户。京兆府的同州，也存在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两税是以钱计税，各户都有自己固定钱数，但交税之时，又多用实物折钱。两税法实施后，因市场的货币流通量减少，物价下降，虽然每户税钱未变，但负担却加重了。例如，建中元年（780）初定两税时一匹绢值钱 3 200 文，到贞元十年（794），降到1 600文。这样一来，建中元年纳一万钱的税户，只交三匹多绢就够了，但在十四年以后，必须提交六匹绢。到唐穆宗时期，绢价继续下降，等于建中元年的 1/3，因此农民的负担比过去要增加三倍左右。

不仅如此，而且在两税法实施以后第三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私自加税 20%。从此，各地节度使如法炮制，普遍加征两税。由此可见，两税法实施以后，人民负担普遍加重。大诗人白居易

写道：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七、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战争连年，民不聊生。因此，一部分有远见的政治家为了挽救唐王朝，着手进行政治改革。

大历十四年（779），唐代宗死，李适即位，这就是唐德宗。德宗猜忌心很强，而且性情急躁，是一个轻举妄动、刚愎自用的皇帝。

德宗即位不久，就免去名将郭子仪的一切职务，任用臭名昭彰的卢杞担任宰相，使朝政更加腐败。陆贽是唐朝卓越的政治家，他为人正直，德宗有问，他总是剀切陈词。德宗有错误，陆贽也能竭诚谏诤。但是，陆贽的许多正确意见总是不能被德宗采纳，贞元十年（794）终于被免职。第二年，被逐出首都，贬为忠州司马，一直到死。

唐德宗猜忌文武大臣，却信任宦官。兴元元年（784），任命大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监左右神策军。贞元七年（791），左神策军大将军柏良器招募精壮代替挂名军籍的商贩。监军窦文场认为可疑，唐德宗便撤销了柏良器的职务。4 年以后，德宗任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中尉，从此宦官掌握了 15 万禁军的领导权，他

们的势力空前地强大起来，给唐朝后期宦官利用军队把持废立大权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唐德宗在“奉天之难”中备受穷困，他回到长安以后，便专心致志地搜刮百姓。很多节度使也以进奉的名义来逢迎皇帝，名目有所谓“内外方园”、“用度羡余”等。节度使额外剥削人民的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皇帝只占十分之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甚至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实际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首都，德宗令宦官当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夺民间货物。所谓宫市，实际就是皇帝当窝主，天天派人给宫廷抢夺生活用品。这是唐建国200多年从来没有的贪暴行为，的确令人发指。当然负担最重的是农民。唐朝诗人写了不少反映农民苦难生活的诗章。李绅的一首《古风》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粒子。四海无闲田，农民犹饿死！”白居易的《杜陵叟》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反映农民因横征暴敛失掉土地而衣食无着的状况。特别是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实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优人成辅端作歌谣说：“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人民这样廉价出卖田舍，目的是交纳两税，可见当时的阶级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永贞元年（805）正月二十四日，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这就是唐顺宗，改元永贞。李诵在东宫二十多年，经常关心朝政，比较了解民间疾苦。翰林待诏王叔文、王伾，一个善棋，一个善书，都是太子老师，和太子朝夕相处。王叔文明治国之道，深得太子的信任。唐顺宗患中风不语症，常居宫中，不接触外界。皇后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经常服侍顺宗；百官奏事，总是通过李忠言、牛昭容再转达皇帝。

这一年二月十一日，顺宗任韦执谊为宰相，过了十余天，又任

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伾为翰林待诏。二王等决心改革内政。王叔文推荐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陆质、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凌準、程异等，协助二王进行政治改革。改革的内容如下：



柳宗元

第一，惩办大贪污犯大贵族李实，撤销其京兆尹的职务，贬为通州长史。李实是皇族，封为道王，过去在担任节度使时期，由于克扣军饷引起兵变而下台，后来又当上京兆尹。贞元时期，有一年关中大旱，唐德宗准备减税。李实却讨好皇帝，虚报轻灾，迫使农民典桑卖地交税，从而弄得京畿不少农民破产流亡，对李实恨之入骨。王叔文等掌权以后，首先惩办了大贵族李实，真是大快人心。

第二，罢宫市。宫市是一种虐政，到德宗晚年更甚。白居易的《卖炭翁》写道："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持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这首诗真实反映一个卖炭老人的一车炭被宦官夺去。这种害民的虐政，在永贞元年（805）罢除。

第三，罢五坊小儿。所谓五坊就是鹏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在五坊服务的差役。五坊小儿在长安内外各处张网捕雀，有时把网盖在门口或井上，不叫人们出入打水，只有给了钱，才许可打水。他们到饭店吃饭时，吃饱了饭不给钱，有时还留下一筐蛇，叫店主好好饲养，说蛇是用以捉鸟雀进奉给皇帝的，主人赔钱赔礼，才把蛇筐带走。奉使出外的宦官，常在路上抢马，搞得穷富不安，惊惧怨恨，远近喧腾，商旅将绝。因此在顺宗时，罢除了这五坊小儿。

第四，准备剥夺宦官的兵权。这年五月，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同时更以度支郎中韩泰

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范希朝是素负重望的老将，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并佐以韩泰，目的是剥夺宦官兵权。但是，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懂得这是王叔文等要夺他们的兵权，密令神策军将拒不接受他们的命令。因此范希朝到了奉天，诸将不受调遣。

第五，裁抑藩镇。永贞年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节度副使刘阏到达长安，求见王叔文，要求兼领三川。王叔文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义正辞严地拒绝了韦皋的无理要求，还通知宰相韦执谊，准备杀掉刘阏。

第六，罢盐铁使月进钱。食盐、铁专卖是唐朝后期政府的重要收入，设盐铁使经营。后来巧立名目，出现所谓盐铁月进钱，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羡余钱，以供皇帝私用。这项弊政不仅苛敛百姓，而且影响国库的正常收入，到永贞时期罢除。

第七，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900余人，允许亲属在九仙门迎接，百姓团聚，欢呼万岁！唐朝后宫两三千人，有许多宫人白了头发见不到皇帝一面。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诗写道："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使者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这就是咏叹宫女悲惨生活的诗。永贞时放出宫女和女乐900人，使许多怨女与家人团聚。

从上列举的几件事看来，王叔文、王伾等人确实关心民间疾苦，他们在短短几个月里，革除了很多虐政，办了不少好事。从这些改革里，可以看出王叔文等人有一套政治纲领，并且相当大胆，敢于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特别是打击宦官和裁抑藩镇，这两件改革如果成功，唐朝后期历史的发展将会大大改观。因为唐朝后期政治衰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永贞改革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大众的要求。

永贞革新是在唐顺宗支持下的政治改革，正因为改革的目的是要推翻宦官专政和消灭割据势力，因此反对革新最坚决的，就是以俱文珍、刘光琦为首的宦官集团和韦皋，刘阏等军阀。这个

集团权势最大，他们不仅直接掌握15万神策军，而且在地方军中也担任监军，具有很大权势，不少节度使的后台就是大宦官。这时的宫廷内部包括皇帝在内，完全在宦官控制之下。正因为唐顺宗是永贞革新的后台，所以他们破坏永贞革新，首先要从唐顺宗开刀。

唐顺宗是具有政治远见的人，宦官搞宫市、五坊小儿骚扰百姓的事，顺宗当太子时，已深知其害。因为顺宗讨厌宦官，宦官感到顺宗不好支配，曾打算取消顺宗的继承权。德宗死，他们严守秘密，仓促之间把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召到宫内，起草遗诏。当时大宦官说："宫内正在研究皇帝继承人问题，现在尚未决定。"在场的几位大臣不敢表态。翰林学士卫次公说："太子虽然玉体欠安，但他是先帝长子，德高望重，被朝野所拥护，太子是皇帝合法的继承人。万不得已时，也应拥立广陵王（顺宗子）。否则，会大乱。"大臣郑絪出来应和，才决定太子李诵即皇帝位。从这件事便可以了解，德宗死时宦官就打算剥夺顺宗的继承权。

唐顺宗即位以后，果然不出宦官所料，王叔文、王伾得到信任。他们进行政治改革，并想夺宦官的大权。于是，俱文珍等立即组织力量打击改革派，推翻唐顺宗。

首先，宦官看中了广陵王李纯，极力拉拢他。永贞元年（805）三月末，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李程等入宫，起草立太子册文，正式立李纯为太子，以便取代唐顺宗。

同时，俱文珍伪造敕书，撤了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实际即取消其宰相职务），调任户部侍郎。当时王叔文业已发觉大势已去，前途岌岌可危。在那些日子里，为了发泄自己的忧闷情怀，他经常吟诵杜甫的一首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这年四月廿日，王叔文被迫离职。八月初，宦官拥立太子李纯为皇帝，这就是宪宗。顺宗被迫退位。

第二天，大宦官俱文珍便对革新派下了毒手，贬王叔文为渝州司

户，王伾为开州司马①。不久，王伾死于开州。第二年，赐王叔文死。

九月中旬，贬神策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礼部郎中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十一月，贬宰相韦执谊为崖州司马。俱文珍认为以前对革新派处理太轻，于是再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

改革派虽然被宦官一网打尽，但是他们的后台——唐顺宗还在人间。大宦官绝不甘心，公元806年正月，在宫里毒死了唐顺宗。

八、国家专卖制度和社会矛盾

安史之乱以后，中原人民遭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人口损失2/3以上。很多地区土地荒芜，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另一方面，大乱以后，河西陇右被吐蕃占领，黄河以北多数地区变成封建军阀割据的区域。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只剩下一部分州县。统治区的缩小和百姓的死亡流移，使中央政府税收锐减。唐政府为了扩大财源，一面增加新税——青苗地头钱、除陌钱等，扩大户税地税税额，但这仍然无济于事。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全国内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央政府为了解决军费问题，盐铁转运使第五琦试行食盐专卖制度。其具体办法是，在产盐区设立管理食盐生产的机构，同时组织食盐生产者“亭户”，拼命生产食盐。这些“亭户”直接由盐铁使管理，免去一般徭役。“亭户”生产的食盐，只能交给政府设立的监院，严禁私自出售，违反这条禁令，要受刑事处分。唐政府将这些食盐提价10倍批发给富商大贾，取得高额利润。盐商领到贩盐许可证及食盐以后，再转运各地，高价零售。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刘晏担任盐铁使，他整顿盐法，进一步加强对食盐的控制，建立一套严密的专卖制度，其具体内容是：

---

① 司马：州设司马一名，从六品上，协助管兵。职位在长史、别驾以下。

第一，明确划分食盐专卖管理范围，规定海盐一律由盐铁使管辖。凡是唐州、蔡州以东的居民，都用海盐。池盐、井盐划归户部，住在许、汝、郑、邓州以西的人，都用池盐。

第二，加强食盐保管储备工作，中央政府在湖州、杭州、越州、涟水设立四场，于嘉兴、海陵、盐城、临平、侯官、兰亭、永嘉、太昌、富都等地设立十监，并在四场十监地区建立数千盐廪，收储食盐。

第三，针对人民反对食盐专卖的斗争，唐政府积极开展食盐的缉私活动。他们在交通要冲的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兖郓、郑滑、岭南设立 13 个巡院。每个巡院配备大量武装人员，专门缉捕私贩盐者。

第四，凡是江岭交通不便之处，由于商人罕至，唐政府设法把食盐运到这类地方储藏，以适当价格出售，叫做“常平盐”。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由于两税加成征收，从而食盐专卖价格猛涨。斗盐加价 200 文，合计 370 文，每斗盐价比唐初增加了 37 倍。食盐价格的任意增长，给广大劳动群众造成极大的痛苦。

唐历朝食盐专卖收入表

年　代	实　估	虚　估	资料来源
大历年间	600 000 贯		《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三
大历末年	6 000 000 贯	7 530 100 贯	〃
贞元二年	—	111 280 000 贯	〃
元和元年	—	13 057 300 贯	〃
元和三年	7 278 160 贯	17 815 807 贯	〃
元和四年	—	18 053 600 贯	〃
元和五年	6 985 500 贯	17 463 700 贯	〃
元和六年	8 859 100 贯	17 127 100 贯	〃
元和七年	6 784 400 贯	12 170 090 贯	〃

历朝食盐专卖收入和两税比较表

年　　代	两税（朝廷收入）	食盐专卖收入	盐利占两税百分比
大历末年	12 000 000 贯	6 000 000 贯	50%
贞元末年	13 056 070 贯	7 530 000 贯	51%
大中八年	9 250 000 贯	2 780 000 贯	30%

唐政府为什么极端重视食盐专卖呢？食盐专卖在国家财政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呢？

以上两表就说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食盐专卖收入，每年平均实价 600 余万贯，有时甚至达到 700 万贯以上。

第二，食盐专卖的收入，在代宗、德宗时，相当国家正税的 50% 左右，它是中央政府主要收入之一，在国家财政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食盐专卖增加了中央政府收入。由于国家掌握的食盐是通过盐商转卖给消费者，因此，实施食盐专卖制度以后，不少商人从中渔利，发了横财，变成暴发户。

但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食盐专卖制度，却是一大灾难。直接制造食盐的“亭户”，受各级盐官的剥削和压迫，不仅单纯再生产难以维持，而且生活也惶恐不安。因此，“亭户”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与此同时，由于盐价暴涨，广大群众无力购买食盐，以致“淡食”（《新唐书·食货志》）。在这种情况之下，“亭户”为了反抗政府的繁重剥削，他们经常和小商人合作，大搞食盐走私，这种贩卖私盐的商人当时被称为“盐枭”。他们从“亭户”那里用低于专卖的价格买到食盐，然后出售给消费者。由于私盐价格较低，所以很受下层人民的欢迎。元和年间，唐政府发觉食盐走私以后，一面派“巡捕之卒，遍于州县”，加强监督。同时制定严刑峻法，残酷镇压盐贩。从元和以后，“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一斗以上杖脊，没其车驴。能捕斗盐者，赏千钱。节度观察

使以判官，州以司録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盗刮鹻土一斗，比盐一升。州县团保相察，比于贞元加酷矣”（《新唐书·食货志》）。

唐宪宗虽然以严刑峻法镇压“亭户”和“盐枭”，但是，人民群众反对食盐专卖的斗争越来越激烈，食盐走私的范围日益扩大。



唐宪宗

唐文宗时期，政府继续加强控制，不仅严禁食盐买卖，而且柴灰鹻土也不许百姓动用，凡盗采柴灰12斤者，按盗1斤食盐论罪，盗鹻土者判处死刑（《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四）。

由于带有武器的“盐枭”把廉价食盐偷偷卖给贫苦农民，解除群众“淡食”的痛苦，从此他们和农民建立了密切关系。当农民起来反抗封建政府的时候，“盐枭”也积极参加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而且由于他们具有和官府斗争的经验，成了农民起义中的骨干力量。例如，黄巢是曹州冤句人，“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弁给、喜养亡命”。王仙芝是濮州人，出身“盐枭”，由于他经常与农民共同反抗唐政府，被称为“濮名贼”。他的部下尚君长、柴存、毕师铎、曹师雄、柳彦章等，也是贩卖私盐的人。

正因为黄巢、王仙芝是“盐枭”，所以在唐末农民战争中，充分反映这些人的作风，他们愿意流动作战，奔向大城市。

唐朝前期的酒类，由民间自由产销。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发生财政危机，在唐代宗时期，唐政府直接控制了酒的产销。具体办法是政府指定酒店酿酒卖酒，然后按月征收酒税，严禁私人自由酿酒。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唐政府为了榨取更多利润，于是又取消民酿法，实行官酿。除了首都以外，在各大城市，政府自己组织酒坊酿酒，每斛售价 3 000 文，严禁私人酿造。

贞元二年（786），关中发生内战，长安也实行官酿法。

在唐武宗以后，扬州等地实行麴专卖法，而浙东、浙西等地，则推行酒专卖。对于那些未实行酒专卖的地方，由政府征收“榷酒钱”。“榷酒钱”开征大约是在元和年间，最初只在未行专卖州县征收，后来变成了正常税收，在专卖以外，同时又加征“榷酒钱”。

全国酒专卖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的地位怎样呢？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大中七年十二月条说：“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万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

由此可见，酒专卖收入每年 82 万缗左右，相当于正税 15% 左右，是国家重要收入之一。

九、“元和中兴”（上）

——政治经济改革

唐德宗在位时期，是藩镇最猖狂的年代。这是因为：在经济方面，强藩控制运河要道，江南财物不能送到关中。尤其严重的是：两税法实施几年以后，钱重货轻，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纷纷破产逃亡，社会矛盾尖锐化。另外，和唐德宗的政治态度及作风也有密切关系。德宗刚愎自用，怀疑朝臣，拒谏饰非。对藩镇则处处将就姑息。他信赖的只有宦官，任意扩大他们的权势，朝政日益腐败。

唐宪宗登基以后，吸取了德宗的教训，在某种程度上改革了内政。

首先，注意纳谏任用贤才。元和元年（806），左拾遗[①]元稹上

① 左拾遗：掌供奉讽谏，左右拾遗各一员，从八品上。

书，恳请宪宗恢复太宗时期谏官随宰相议事的制度，以便“开直言，广视听”。唐宪宗立即召见他，听取他对朝政的意见。翌年十二月，白居易作新乐府百余篇，这些诗多是反映人民疾苦，讽喻时政的。诗篇传到宫里，唐宪宗看了很受启发，他立即提升白居易为翰林学士[①]，作皇帝侍从和顾问。大宦官吐突承璀是宪宗最宠信的人。元和五年，翰林学士李绛揭露这个宦官专横跋扈，目无大臣，唐宪宗认为李绛说得太过分了。李绛痛哭流涕，慷慨陈词，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股肱，不能负陛下之托，见问题不讲。宪宗听了这些话，当面称赞李绛是忠臣。唐宪宗终因他事惩办了宦官吐突承璀，并且提拔李绛为中书舍人[②]，仍兼翰林学士。

唐宪宗不仅比较注意纳谏，而且能任用贤才。永贞元年（805）八月，他刚即位，荆南献毛龟。唐宪宗宣称：“朕所宝唯贤”（《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敕令日后不许献奇兽异禽。因此宪宗任用的宰相，有不少是当时贤才。例如杜黄裳，德宗时只能担任管理国家祭祀礼乐的太常卿。宪宗登基以后，杜黄裳很快被擢为宰相。平定西蜀，恢复两河（河南、河北），宪宗朝出现中兴局面，都从杜黄裳开始。杜黄裳虽然只当了一年多宰相，但他在元和初年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继杜黄裳后任相的，有武元衡和李吉甫。李吉甫任相时期，积极支持宪宗削藩，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他请中书舍人裴垍推荐贤才，然后用于朝廷，当时“天下翕然称得人”（《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裴垍传》）。李吉甫以后，裴垍执政，他为人器局峻整，执法严肃，刚正不阿。过去“谏官言得失，大抵执政多忌之，惟（裴）垍奖励使尽言”。他所提拔的如裴度、韦贯之、李夷简，皆“为辅相，号名臣，自它选士，罔不精明，人无异言”（《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裴垍传》）。李绛和裴度，分别在元和六年（811）和十年为相。李绛勇于直谏，对于平

---

① 翰林学士：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承命撰拟有关任免将相、册封太子等文告，号“内相”，唐后期常以翰林学士升宰相。

② 中书舍人：掌起草诏诰之事，正五品官。

藩多所建树。而裴度则是公认的贤相。

第二，改革两税。前面已经谈到，两税法是以钱计税，而百姓纳税时，主要是用粮和绢。这里便出现一个以绢折钱的标准问题，假若价格标准定得合理，纳税者便不会吃亏，不然，必然会加重负担。在建中元年初定两税时，匹绢 3 200 文，十年以后，绢价下跌至 1 600 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裴垍执政以后，针对上述问题，对两税法进行两项改革：一是调整了纳税物折价标准。尚书省为了适当减轻纳税者的负担，制定一个低于市场实际价格的折价标准，这个标准谓之“省估”，即尚书省所定的“虚估”（低于市场实价的折价数）。具体实施办法是全国州县征收两税绢粮折价时，一律按“省估”计算，不许以当地市场的实价来折收百姓税物。二是改革了两税钱物上贡、送使、留州的比例。元和三年（808）以前，两税钱物分配比例不合理，送节度使的部分较大，助长了他们的割据实力。从元和三年开始，改为节度使只许留用其直属州上交的税物，假若不够用，再报请朝廷分收余州少数税物。这样一来，减轻了人民一定的负担，也限制了节度使的财源。因此“江淮以南，少息肩矣”（《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裴垍传》）。

第三，整顿改善漕运。南北朝以来，长江以南逐渐开发。安史之乱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开始转到江南，当时唐政府的经费基本上依靠江南八道。因此，扬州和长安之间的漕运，便成为朝廷的生命线了。在代宗时期，著名理财家刘晏任转运使后，对漕运做了不少改进，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而且节省了运费，每年从江淮运到关中的粮食百余万石。这个数字比开元年间的运输量相差甚多，主要原因是由于跋扈的节度使对漕运的干扰破坏。德宗初年，漕运一度中断。兴元元年（784），朝廷夺回汴州，运河又恢复航运，当时韩晃主持把江南粮食送到陕州。从贞元元年（785）开始，朝廷设法控制运河，沿运河要地派重兵把守，但镇守运河的悍将骄兵从贞元八年（792）至十五年，在汴州一带曾五次劫夺漕运物资，漕运

仍然不断被破坏。

唐宪宗登基以后，针对上述问题，设法改进漕运。首先，削平了运河沿岸的藩镇割据势力。其次，于元和四年（809），在原通济渠的要冲，新建立一州——宿州（今安徽宿县），以加强运河险要地段的管理。宿州是由原徐州的符离县和泗州的虹县合并而成的。第三，派干练官员出任转运使，如李巽、卢坦、李鄘、柳公绰都曾主持过这一事务，督运江淮物资以供关中。其中以李巽的成绩最显著，他任转运使时期，运河的漕运粮数超过刘晏时期两三倍。

元和年间整顿漕运以后，使江淮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关中。这样一来，使经济重心和首都联系更加密切，从而巩固了唐王朝的经济基础。唐宪宗削藩的胜利和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经济改革的另一表现是改善蠲复方法。唐朝有一个惯例，每逢灾年或皇帝即位大典时，朝廷都要发布“德音”，大赦天下，减免赋税。当时有权势者便利用这种机会因循观望，拒不纳税，一旦赦文下达，便免交赋税。不仅当权的官员如此，地方豪猾也不按时交税。至于贫穷安分守己的百姓，由于不堪里胥的追索逼迫，一天不敢违误，等到“德音”下达，赋税早已完纳。因此，长期以来，历年“德音”下达以后，不仅百姓未得实利，而且助长豪猾拖欠国赋之弊，这是赋税征收制度中的严重问题。元和十年（815）三月，唐宪宗批转了京兆府的奏疏，决定从元和十年开始，凡皇帝“德音”下达后，假若百姓已经完纳当年的赋税，可依据“德音”规定免交第二年应纳之税。

第四，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唐朝后期，逃户甚多，户籍紊乱。有些州县户口虽少，仍然保持原来的机构，官员甚多，人浮于事，浪费国家资财。李吉甫任宰相时，设法解决上述问题，裁减内外官808名，同时还裁汰诸流外官1 769名，大大节省了开支。

第五，改善财政管理，建立收支计簿制度。德宗时期，财政管理非常混乱，甚至户部也向皇帝进奉羡余。裴延令管户部时，此风更加恶化。他还在正库以外设置别贮库，实际就是将国库财物转移

到别贮库，以便单独献给皇帝，争取皇帝的恩宠。宪宗刚登基不久，经度支使的奏请，下诏取消别贮库，并入正库。元和六年，宰相李绛兼管户部事，下令取消户部进奉羡余的制度。元和十三年(818)，唐宪宗批转了中书门下省的报告，正式规定户部、度支使、盐铁使三个机构，于每年十二月，把一年当中各项收支的具体数字报告朝廷。如果那些部门尚有剩余钱物或赤字，也须一一上报。这样做以后，一面使朝廷了解国家财政的实际情况，以便及时提出处理办法，同时也可以减少弄虚作假和营私舞弊问题。

第六，积极兴修水利，改善生产条件。元和年间，李吉甫在高邮修筑堤塘，灌田数千顷（《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李吉甫传》）；常州刺史孟简，在武进修治孟渎，“长四十里，得沃壤四千余顷”（《唐会要》卷八十九）；宣州南陵县有大农陂，系宁国县令范氏所修复，溉田千顷（《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洪州刺史韦丹，在南昌设有很多陂塘水门节制江水，溉田一万二千顷（《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韦丹传》）。以上这些灌溉工程，对江南农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漕运的改善和江南农业的发展，使东南地区的财物源源不断从江南运到中原和长安，这些物资由朝廷支配以后，保证了削藩战争的胜利。

十、“元和中兴”（下）

——蔡州大捷和全国重新统一

元和元年（806），剑南西川节度使刘阚叛变，唐宪宗准备讨伐，宰相杜黄裳、翰林学士李吉甫献计献策，平定了刘阚之乱。后来镇海李锜反叛，也被朝廷平定。

元和八年（813），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夫人元氏擅立其11岁幼子田怀谏为节度副大使，军政事务由家僮蒋士则主持，部众不

服，拥田兴为帅。田兴一向拥护朝廷。从此以后，独立了50年的魏博镇，暂时归顺朝廷。这些事件鼓舞了宪宗削藩的信心和决心。从元和十年开始，他在李绛、武元衡、裴度几位宰相的赞助下，讨伐吴元济。

吴元济的父亲吴少阳，曾任彰义军（淮西）节度使，长期割据淮西。元和九年（814）九月，少阳死，子吴元济自立，与朝廷为敌。“屠舞阳，焚叶县，攻掠鲁山、襄城、汝州、许州及阳翟”，“关东大恐”。十月，唐宪宗以李光颜为忠武节度使，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第二年正月，又任韩弘为淮西行营都统，宦官崔潭峻监军，讨伐吴元济。但韩弘和严绶都不认真作战，只有李光颜的战功最多。

讨伐吴元济的战役开始以后，河北割据军阀非常恐慌。与吴元济狼狈为奸的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开始请求朝廷赦免吴元济，看宪宗不允，就放火烧掉了讨伐军的军需基地——河阴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石”。这个转运站是唐政府接送江淮税物的最大转运站，讨伐军受到很大打击。

河阴事件以后，朝廷内部议论纷纷。唐宪宗派御史中丞裴度到达淮西，抚慰将士。裴度从前线归来以后，用李光颜多次局部胜利的事实进行宣传，坚定了唐宪宗平定淮西叛乱的决心。

当时，宰相武元衡主持削藩之事。李师道烧毁军需品的罪恶活动，并没有制止平叛战争，于是他又采取暗杀手段。元和十年（815）六月一天的黎明，宰相武元衡上早朝，在长安靖安坊的东门被刺身死，另一位主战派裴度，也受了重伤。这是唐建国200年来从来未有的严重事件。

暗杀事件并没有吓倒主战派，元和十一年（816）十二月，宪宗任李愬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吴元济。

这次战争吸取了前两年挫折的教训，为了解决好淮西前线的粮食问题，中央政府专门设立一个军运机构，叫淮颍转运使，把扬州转运院的粮食，从淮阴装船，逆淮河进入颍水，经颍水到项城溵

水，再经溵水把粮食送到郾城前线。

元和十二年（817）正月，大将李愬到达唐州（今河南唐河）。为了麻痹吴元济，他既不整顿队伍，也不构筑工事，而是深入基层作好士兵的工作，特别注意照顾好伤员病号。有人怀疑这样做是不是显得我们的军队太懦弱了，李愬说："吴元济过去藐视我们这支队伍，现在我军调来新将领，他可能加强防御，我现在这样做，是想麻痹敌人，叫他丧失警惕。"

吴元济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陈（今河南淮阳）、许（今许昌市）一线，矛头指向东都。他在西南方面的军队只对唐军起牵制和骚扰作用。经常出动的捉生虞侯丁士良，元和十二年（817）二月，被李愬俘获。战士们认为这个人是吴元济的勇将，常在东边为患，主张杀掉。李愬决定争取他，给他松了绑。丁士良很受感动，表示要以死报效。李愬任命他为捉生将，叫他给朝廷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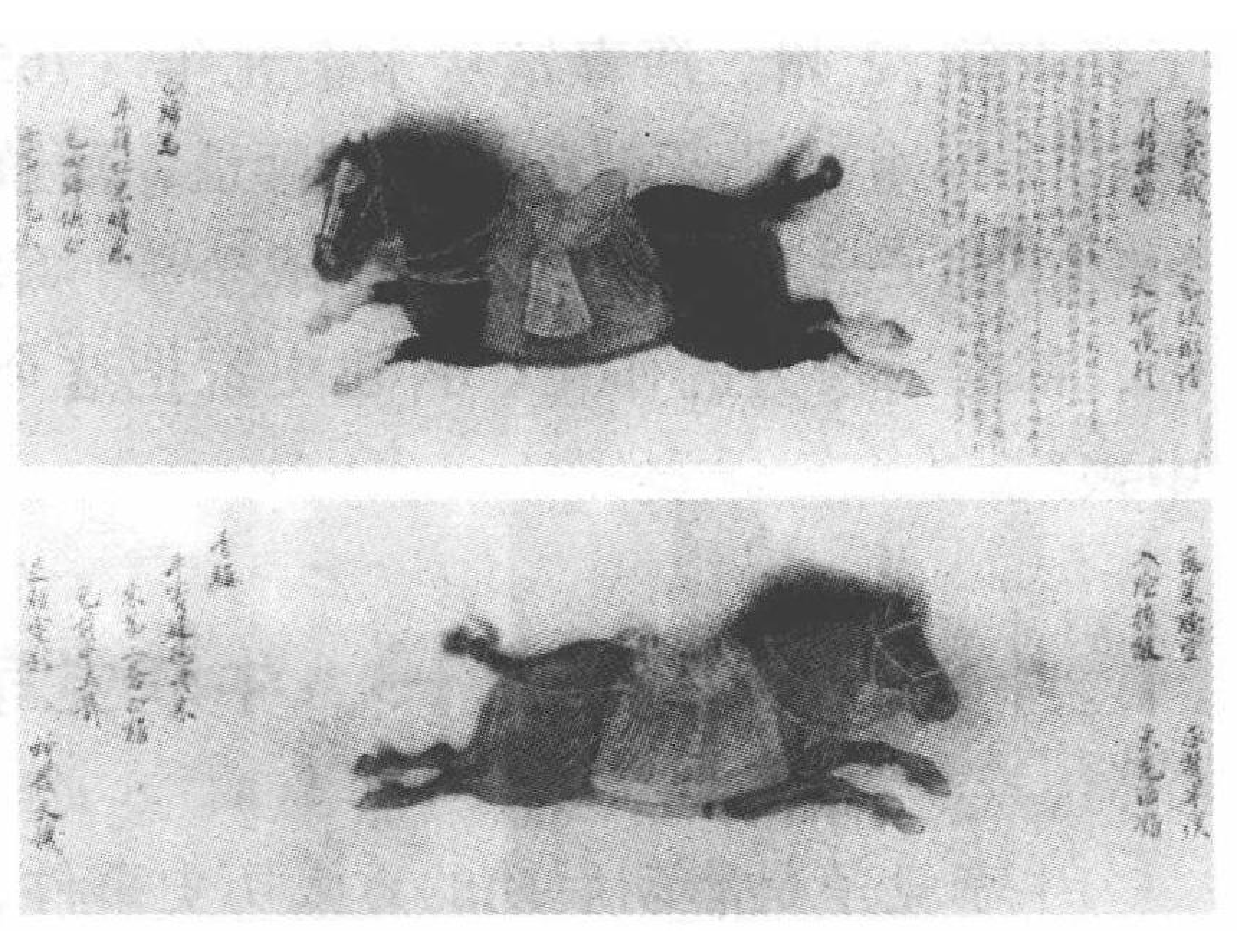
丁士良给李愬出谋划策说："吴秀琳是吴元济一员干将，他所以能长期盘踞文城栅（今河南遂平县西南），是因为他手下有个陈光洽给他出谋划策。陈光洽有弱点，此人勇敢但很轻率，喜欢独自出战。只要把他抓来，吴秀琳失去谋主，可能反正。"李愬同意丁士良的计谋。不久，丁士良果然把陈光洽抓来了。三月，李愬从唐州进军宜阳栅（今河南桐柏），吴秀琳果然率 3 000 人投降。李愬把降将的家属都搬到唐州，作为人质，投降的叛军将士都安心给讨伐军效力。四月，讨伐军便克服了郾城。

李愬是卓越的军事家，善于做瓦解敌人的工作。对于投降的将领，李愬亲自找他们交谈。通过谈话，一面借机侦察敌情，一面解除降将的顾虑，叫他们忠心为朝廷服务，发挥他们的作用。过去有一条禁令，严禁留宿吴元济官兵，违者杀头。李愬不仅取消禁令，而且鼓励百姓留宿吴元济的人员，并要留宿人家优待他们。这样，吴元济的情报人员，不少变成李愬的义务谍报员。

元和十二年（817）五月，李愬又争取到淮西将李佑归降，并任命他为散兵马使，共同制定夺取蔡州的作战方案。

九月二十八日，李愬亲自带兵进攻吴房（今河南遂平）。将士们认为这天是往亡日①，犯忌，怕出兵不利。李愬说："我们的兵力不多，敌人认为这个日子我们不会出师，现在发起攻击，正是攻其不备。"于是立即出兵，一举攻进吴房外城，杀敌1 000余名。敌人退守内城。

十月初，李祐建议说："吴元济的精锐部队目前在洄曲（今河南商水）一带防守边境，而蔡州驻军多是老弱病残，现在应及时夺取蔡州。"李愬认为，战机业已成熟，于是立即派人请示宰相裴度，裴度批准了他们进攻蔡州的作战方案。于是，围攻蔡州的战役开始了。



昭陵六骏图

十月十五日夜间，大举围攻蔡州（今河南汝南）。李愬派李祐、李忠义带3 000突击队为先锋，自己带3 000人为中军，另一将领史进城领3 000人为后军，又分出部分队伍留守文城栅。大军直奔张柴村，一举攻克了这个战略要地。李愬令战士稍事休息，然后派遣500人，专门破坏蔡州通往各方面的交通要道，同时指挥大军继续东进。

这天夜里，起初是阴云密布，后来是雨雪交加，寒风凛冽。到了半夜，下起了鹅毛大雪。

淮西从吴元济父子割据以后，朝廷的官兵已经30多年没有到蔡州了。十六日唐军兵临城下时，城里还无人知晓。李祐、李忠义亲自带头登城，守门的士兵在酣睡中当了俘虏。讨伐军攻人内城，

① 阴阳家把每月都定一天叫"往亡日"，这天忌讳行军征讨、上任、拜官等活动。

吴元济还在梦中。等他仓猝爬上节度使衙门的围墙，企图组织抵抗时，已无济于事，只得束手就擒。从此，淮西三州归唐。

朝廷收复了淮西三州以后，其他藩镇非常恐惧。元和十三年(818)，横海镇程权自请离镇去当朝官，于是朝廷收复了沧、景二州。幽州镇刘总也上表归顺。成德镇王承宗上表请求自新，献出德、棣二州，所管诸州录事以下各级官员，请朝廷任命。唐宪宗又令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把李师道正法，收复了淄青等 12 州。淄青镇从永泰元年（765）李正己开始割据，到现在已 54 年。平灭了淄青的李师道，藩镇割据的局面基本上结束，暂时实现了全国统一。在统一战争中，宰相裴度和唐宪宗、李愬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封建史家把这个统一局面，叫做“元和中兴”。

十一、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唐宪宗直到唐宣宗时期，前后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牛李两党为什么发生这样长期的斗争？双方的主要分歧究竟是什么？过去有的学者说：牛党重进士科，代表中小地主利益，而李党重门第，反对进士科，代表士族地主；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对进士科的态度；发生分歧的原因就是由于牛李两党出身于不同的阶层。事实并不是这样。首先，牛李两党任何一方都不是由单一的阶层组成的。例如李党，除了几个人出身于士族地主以外，其中陈夷行、李让夷、李商隐、王茂元、刘轲等，都是庶族地主，根本不是士族出身。牛僧儒集团中，虽然有几个庶族地主，但也包括很多士族地主在内。例如李宗闵、李珏、杨嗣复、杨汉公、杨虞卿、杜悰、杜牧等都是士族地主出身。可见，牛李任何一党，都是由士族与庶族混合组成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无论牛、李哪个集团成员中，都有一些人是进士及第。

从上述情况看来，牛李两党分歧的根源，并不是由于士庶两个阶层间的对立，他们斗争的焦点，也不是赞成或反对进士科的问题，实际是两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存在严重分歧。

安史之乱以后，除了阶级矛盾以外，政治上的主要矛盾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斗争，也就是藩镇割据问题。这关系着唐朝每一个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各种人都会有自己的态度，牛李两党当然不会例外。首先，牛僧儒等人对待割据的藩镇，向来持姑息养奸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李党却一贯主张坚决平定叛乱，争取国家重新统一。

唐武宗时期，李德裕执政，坚决打击割据的刘稹，终于消灭了他，收复了五州三十县。

牛僧儒、李宗闵和李党相反，他们反对朝廷平叛。元和三年，宰相李吉甫积极平叛时，牛僧儒、李宗闵利用制科考试之机，攻击李吉甫"炽于武功"（《樊川文集》卷七《牛公墓志并序》），实际就是反对朝廷打击割据的节度使。元和十二年，裴度积极组织讨伐淮西叛乱，牛党李逢吉"虑其成功，密沮之"。另一牛党成员令狐楚，也反对讨伐吴元济。至于牛僧儒，更是统一战争的反对派。如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幽州杨志诚逐其帅李载义，皇帝问计于宰相牛僧儒，他回答说："范阳从安史以来，就不属朝廷所有，穆宗时平定刘总，朝廷耗费八十多万缗，实际没得尺帛斗粟的好处。现在杨志诚夺了李载义的权，和当年李载义当节度使的情况相似，朝廷不必干涉，承认其合法，利用他抵抗契丹，何必劳师动众去讨伐呢？"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牛僧儒是坚决反对朝廷讨伐反叛藩镇的。

其次，李党重视政治改革，牛僧儒主张维持现状。元和年间，李吉甫认为，从秦到隋共十三朝，而设官最多者莫过于唐。因此他建议省并州县，裁汰冗员。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元和六年（811），精简京官 1 769 名，外官 808 名。武宗会昌年间，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执政时，也精减冗官 1 000 千余名。事实非常明显，精

减机构，节省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当然是一项进步措施。对于这一措施，牛党却坚决反对，大中年间牛党成员白敏中执政，立即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复增三百八十三员”。

第三，李党反对佛教，会昌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灭佛运动，收效甚大。而牛党相反，大中元年（847），废除对佛教的禁令，结果“僧尼之弊皆复其旧”（《通鉴》卷二百四十八）。

第四，李党坚决维护边区安全，反对吐蕃奴隶主的侵扰，而牛党却苟且偷安，胆小如鼠，执行民族投降主义政策。

以上是牛李两党的政治分歧所在。两党斗争从宪宗朝开始。第一次斗争是在元和三年（808），当时李吉甫（李德裕之父）执政。在制科考试当中，牛僧儒、李宗闵、皇甫湜在文中批评时政，涉及平藩、限制宦官等问题。这年担任考官的是杨于陵、韦贯之，考试揭晓后，牛僧儒、李宗闵被擢为上第。宰相李吉甫“恶其直言，哭诉于上”，唐宪宗支持李吉甫，下诏贬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韦贯之为果州刺史，牛僧儒、李宗闵长期“不调”。

牛党的白敏中执政以来，对过去被李党贬谪的牛党人员，则积极设法营救，或改善其待遇，或复其官职。会昌六年（846）八月，首先提拔循州司马牛僧儒为衡州长史，第二年，调僧儒回东都，任太子少师。其次，撤销李宗闵流刑处分，暂调任郴州（今湖南永兴）司马，未到任便死于封州。大中元年（847），调潮州长史杨嗣复为吏部尚书。第二年，调李珏为户部尚书。这样看来，从大中年间白敏中执政以后，李党及其支持者都被逐出首都，或贬到边州，或遭流放，几乎无一幸免。而牛党人员不仅得到升迁，而且当了中央高级官员。

牛党上台以后，不仅打击李党，而且从根本上改变李党的政策。司马光写道：“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会昌四年所减州县官复增三百八十三员”（《通鉴》卷二百四十八）。由此可见，牛李两党不仅互相倾轧，而且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

十二、宦官专权与“甘露之变”

宦官专政有一个历史过程。早在唐初，不许宦官参与政事。唐中宗时期，宦者人数增至千人，大宦官开始干政。开元末期，宦官人数达3 000余名，其中五品以上者有1 000余人，有些人并取得三品将军的职位，其中高力士和杨思勖最受重用。杨思勖多次奉命出征南方少数民族，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封虢国公，打破了唐初以来宦官不得登三品的惯例。高力士亲侍皇帝，更受宠信。开元末年凡大臣奏疏，须经高力士过目，朝中小事皆由高力士处理，只有大事才奏请玄宗。李林甫、安禄山、高仙芝等人取得将相地位，都是高力士的引拔。除了高力士以外，另有一些宦官还担任监军，他们的权力很大，所到之处，任意勒索。所有宦官都听高力士的指挥。高力士就是唐玄宗权力的化身，太子称他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他为“阿翁”，驸马呼他“阿爷”。高力士资产殷富，甚至超过王侯。京城内外良田甲第，几乎有一半是宦官所有。

至德元载（756），李亨即皇帝位，即唐肃宗。他更加信任宦官，这就使宦官权势进一步扩大。当九节度使讨伐安庆绪时，朝廷不设置统帅，而以大宦官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使，九个节度使受他节制，结果打了大败仗。唐肃宗是李辅国拥立的。这个大宦官内掌玉玺符命，外管禁军，朝廷所有制敕，须经他押署，然后实行。宰相和各部尚书有事陈请，定要先告李辅国，然后才能上报皇帝。李辅国骄横专恣，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他。宰相李麟、苗晋卿，都因为不能逢迎李辅国，相继去职。李岘、李揆当宰相时，见到李辅国时行弟子礼，尊李辅国为五父。李岘弹劾李辅国专权乱政须加裁抑，肃宗疑信参半，他只下令制敕归中书掌管。李岘因为得罪了李辅国，只当了一个月宰相，就被李辅国诬陷，贬为蜀州刺史。

李辅国不仅废立宰相，还逼死皇帝，杀戮皇后。宝应元年（762），李辅国趁肃宗病重杀了张皇后和越王系。李辅国杀了皇后和亲王以后，和宦官程元振同入飞龙殿，请太子素服，出九仙山，

与宰相见面，说明肃宗宴驾。第二天，在两仪殿给肃宗行葬礼。几天以后，太子临朝听政，这就是唐代宗。李辅国自命为定策功臣，从此越发专横。李辅国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处分。"代宗听了，心里也不舒服。但是，由于李辅国手握兵权，不便指斥，只得表面上尊礼，称他为"尚父"，事无大小，都须经过李辅国；甚至朝臣出入，必须先到李辅国处取得谅解。李辅国狂妄自大，忘乎所以，后来担任中书令，加司空衔。

由于李辅国极端猖狂，直接威胁唐代宗的安全，于是代宗利用另一大宦官程元振杀了李辅国。程元振任骠骑大将军（从一品），宦官仍然独揽大权。

到唐德宗时期，由于德宗刚愎自用，猜忌大臣、宿将。特别是经过"奉天之难"以后，更加相信自己的家奴。任命大宦官霍仙鸣、窦文场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从此十余万禁军由宦官指挥，他们的权力更加强大，为唐后期宦官挟兵权把持废立大权的局面开了方便之门。德宗以后，顺宗、宪宗和敬宗，都是死于宦官之手。

唐文宗时期，大宦官王守澄掌权，他目无天子，为所欲为。文宗利用杨训、舒元舆等设计毒杀了王守澄。唐文宗认为李训有功，任命他和舒元舆、王涯为宰相。

李训、舒元舆等取得胜利以后，拟定一个彻底消灭宦官的计划。太和九年（835），任命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璠为河东节度使，部署他们大量招兵，壮大自己的力量。又任命刑部侍郎李孝本为御史中丞，以太府卿韩约为金吾大将军，直接掌握首都及宫廷防卫权力。这些人都是李训的亲信，分别安置在要害部门和地区，为内外夹击，一举消灭宦官集团做好准备工作。

这年十一月的一天，唐文宗在紫宸殿上朝，百官鱼贯入宫，依班序而立。金吾大将军韩约匆匆人奏说："在左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这是天降吉祥的征兆。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感动上天，不能得见甘露。"说完以后，韩约手舞足蹈给皇帝叩头。宰相李训、舒元舆也率百官拜贺，并且请皇帝立即亲自观赏。文宗欣然同意，于是坐上龙辇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先叫李训去看看，他很

长时间才回来。李训说："甘露已经看不清了，但暂时不必宣扬出去。"唐文宗说："有这样的事吗?"他示意叫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率领宦官前去探视。李训召集郭行余、王璠等，入殿受诏。王璠吓得全身哆嗦，不敢前去。只有郭行余受命招募的亲兵数百人，携带武器等候在丹阳门外。李训召集这些亲兵，部署杀宦官的计划。河东兵陆续进京，唯独邠宁军却观望不前。仇士良等进入金吾厅，正好遇见韩约，并发现韩约神情紧张。仇士良惊讶地问道："将军为什么这样紧张?"话还没有说完，忽然看见金吾厅里风吹幕起，里面藏着甲兵，于是仇士良慌忙往回跑，进了含元殿，他气喘吁吁对皇帝说："宫里要发生暴乱了!"李训等看到仇士良向含元殿方向跑去，急忙招呼金吾卫士，对他们说："赶快到含元殿保卫皇帝陛下，进去以后，每人赏钱一百缗。"金吾卫士刚要登含元殿，大宦官仇士良眼明手快，急忙令宦官抬着皇帝从殿后出去。李训上前拦住轿子，对文宗说："臣奏事未毕，请陛下暂时留步。"仇士良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在宫里布置武装，要谋反吗?"文宗说："这不可能。"仇士良根本不听，抢步向前来打李训，被李训推倒。随后李训从靴子里拔出匕首，要刺杀仇士良，被宦官拦住。仇士良被抢走。这时，罗立言率京兆逻卒300余名从东面赶到。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200余名从西面赶来，并会同金吾卫士，登殿杀宦官10余人。仇士良令宦官在外面抵挡，自己引文宗走向宣政门。李训在后面追赶，宦官郗至荣截住，把李训打倒。宦官把文宗抬到宣政门。等李训挣扎着站起来，宣政门已紧闭。李训知道镇压宦官的计划已经失败，急忙换上从吏的绿衫，化装出宫。郭行余、罗立言，王璠也各自寻找藏身之处。

宰相王涯、贾悚并没有参加李训消灭宦官的计划。他们看到殿中发生变乱，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仓猝之间回中书省，听候消息。宰相舒元舆也赶到中书省，假装不了解情况。他对王涯说："究竟是什么人叛乱，目前不清楚，我想皇帝陛下总要开延英会议，召集我们研究的。"停了一会儿，快午饭了，忽然有人进来报告说：

"左神策军副使刘泰伦等，带着一千多禁军从閤门杀出来。"舒元舆因参与密谋，闻报先逃，王涯、贾竦也跟着走出中书省。中书门下省的金吾卫吏卒千余人，也都向外跑。此时禁军赶到，被砍死六七百人。大宦官仇士良，又分兵掩闭宫门，横加屠戮。所有诸司吏卒，及附近商贩，都惨死在宦官刀下，尸体狼藉，遍地朱紫。同时，大宦官又派骑兵千余人，追捕逃人。宰相舒元舆、王涯都被禁军捕获，各加镣拷，施以酷刑。

禁军大兴打伐之际，坊中地痞流氓伪托禁军，乘势骚扰，杀人越货，互相攻劫，扰乱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百官上朝，日出以后才打开建福门。宫城内外戒备森严，禁军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朝官只许带一名随从。文武百官屏住呼吸慢慢前进，走到宣政门，只见大门禁闭。等到开了宣政门，进了大殿，唐文宗坐在紫宸殿。唐文宗见没有一个宰相上朝，便对宦官说："宰相王涯等为什么不上朝?"宦官仇士良说："王涯等谋反，已逮捕下狱。"说到这里，把控告王涯谋反的状子及有关"罪证"呈上。文宗接过来略看一下，敕令郑覃、令狐楚等上殿，把仇士良诬告王涯的状子给他们看，并且流着眼泪说道："这是王涯的手笔吗？他如果真要谋反，定要正法。"于是敕令令狐楚、郑覃为代理宰相，并且叫他们起草诏令，宣告李训等罪状，但用语模棱两可，仇士良看了，很不满意。

仇士良讨厌令狐楚，于是提拔李石任宰相，和郑覃共同辅政。当时中央各部门主要官员已安排就绪，但是长安城内的秩序仍然混乱，流氓打手夜间继续劫掠。神策军将杨镇等各率500人，分屯通衢，打鼓警众，严禁抢劫，并杀戮首犯10余人，从而使首都社会秩序暂时安定下来。

过了几天，仇士良令禁军300余人，挑起李训的人头，押着舒元舆、王涯、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游街示众，然后把他们推到独柳树下，全部斩首。他们的亲属，无论远近，也一律处斩。

这就是"甘露之变"。从此以后，大宦官仇士良等气焰益盛。上挟天子，下凌宰相，唐朝政治更加腐败。

十三、李德裕和武宗朝局

穆宗、文宗时期，牛僧儒、李逢吉等相继担任宰相。统治者苟且偷安，政治腐败，各地节度使更加嚣张。但是，武宗登基以后，李德裕任宰相，他支持唐武宗重振朝纲，会昌年间一度出现崭新的政治局面。

李德裕最初是一个关心民瘼的地方官。长庆二年（822），他担任浙西观察使，曾请求朝廷减轻浙西农民部分负担，并拆毁寺院淫祠2 500余处，浙西各地“人乐其政”。文宗太和三年（829）八月，征为兵部侍郎，因受李宗闵的排挤，于第二年十月，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到达成都，最关心的是西川边防的安全问题。他刚一到任，便对西川的防务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不仅深入战士中间，而且和少数民族接触，具体调查西川至南诏、吐蕃之间的山川、城邑、关梁、道路险易、广狭远近等。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对西川周围的形势了若指掌，然后依据实地调查的结果，绘制两种地图：一是南部边防形势图，二是西部边防形势图，作为加强西川防务的依据。

其次，整训部队，裁汰老弱残兵4 000余人，招收新兵1 000余人，合计边防军共三四万人。与此同时，每200户中，抽出一丁当雄边军（民兵），给以严格训练。这些人平时务农，战时当兵，既加强战备，又不加重人民负担。接着，李德裕特聘请安定人制甲，河中人作弓，浙西人造弩，把西川部队用全国最精锐的武器装备起来。

另一方面，李德裕根据西川的边防形势，筑了杖义城，以防青溪关方面南诏的侵扰。在西川、南诏、吐蕃的三角地带，建御侮城，扼守两大防区的交界地带。在西部设立柔远城，以防吐蕃的进犯。

经过李德裕一年多的惨淡经营，西川的形势显著好转，不仅社会经济逐渐发展，而且边防十分巩固。太和五年（831）五月，李

德裕与南诏当局交涉，使之放还西川工匠、僧道等四千余人。另一方面，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主动投降，使沦陷42年的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重新收复。维州是西川通往吐蕃的咽喉，收复维州对防御吐蕃奴隶主入侵，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是，由于当时宰相牛僧儒对李德裕怀有成见，忌妒他声望高，因此竟下令放弃维州，并将悉怛谋交给吐蕃，被吐蕃杀害。

以上是李德裕任地方官时的主要政绩。会昌元年（841）以后，李德裕在唐武宗朝当了6年宰相，掌握全国军政大权。他针对唐朝后期政治积弊，进行重大改革，使武宗时期出现了新局面。

首先，平定刘稹叛乱，巩固国家统一，扭转了长期内弱外强之局。

会昌四年（844）四月，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死。他的侄儿刘稹密不发丧，准备自为“留后”。当时唐武宗召集延英殿会议，研究刘稹问题。参加会议的大臣，多数人主张默认刘稹独立，只有李德裕坚决主张维护国家的统一，打击刘稹的分裂割据活动。他认为昭义镇所管五州，邻近首都，假若任其割据，他随时要威胁朝廷。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昭义一直属于朝廷，如果听之任之，将来势必影响全国。

唐武宗问他：用什么方式制服刘稹？如果打起仗来，朝廷是否有胜利的把握？李德裕说：刘稹胆敢对抗朝廷，他是想依靠河朔三镇的支援，假若河朔三镇不和他合作，刘稹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李德裕提出打击刘稹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先派专使亲临河朔，对成德王元逵和魏博何弘敬明确说明，河朔三镇从代宗以来便世代担任节度使，迄今已近百年之久。目前朝廷仍然承认这种局面，不加干涉。昭义镇与河朔情况不同，它历来属于朝廷，决不允许刘稹分裂出去。其次，朝廷专使对三镇节度使应提出明确要求，在平定刘稹的战役中要和朝廷分工合作。因为邢州、磁州、洺州与河朔毗邻，委托王元逵、何弘敬代替朝廷收复，贼平之后，必有重赏。至于泽、潞二州，由朝廷派兵直接攻取。第二步，组织好各地武装力量，从四面八方同时下手，围歼刘稹。

李德裕的破贼策略得到唐武宗的支持，武宗表示全力消灭刘稹叛乱，不论何人不许阻挠消灭刘稹的作战计划。

这年七月初，讨伐刘稹的四路大军开赴前线。北路王元逵军进攻尧山旗开得胜后，八月攻克邢州，唐武宗传令嘉奖。接着，李德裕派王宰协助魏博何弘敬军，进攻磁州（今河北省磁县）。李德裕发现负责攻取潞州的李彦佐作战不力，立即调石雄为晋绛节度使，接替了李彦佐。石雄军进入阵地以后，引兵越乌岭，接着破丘寨，进展迅速。这年十二月，太原发生了杨弁叛乱，使平定刘稹的战役暂时受挫。会昌四年春节以后，河东军消灭了杨弁的叛军，收复了太原，又集中兵力对付刘稹。当时刘稹的部将搜刮民财，内部“恟恟不安”，而其部分地区又被朝廷的讨伐军占领，处境非常困难，刘稹的败局已定。邢州（今河北邢台）守将裴问杀城中骁将四人，投降了王元逵。洺州守将王钊向何弘敬投诚。磁州守将安玉听说洺、邢二州已被讨伐军占领，也放下了武器。



唐代宫乐图

这年八月，泽潞守敌闻北方三州已全部投降，刘稹的大将郭谊、王协等杀了他们的主子，迎接讨伐军入城。到这时为止，历时13个月的刘稹之乱，终被平定。

由于朝廷讨伐军的胜利，收复了5州31县，从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防止分裂局面的扩大。

这次平叛战争中，李德裕取消了宦官指挥军队之权，使前线指挥官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不受牵制；又有一个正确的作战方案，随时掌握几个战场双方的作战情况，及时调整作战部署；赏罚严明，及时鼓励立功人员，因而战争得了胜利。

其次，组织反击回鹘的战争，取得了胜利，保卫了边区的安全。

回鹘位于娑陵河流域（今色楞格河），8世纪以来日渐强大。安史之乱时期，唐政府曾联合回鹘贵族，协助平定内乱。

安史之乱以后，回鹘虽然退兵，但是他们强迫唐政府进行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实行不等价交换：一匹马换40匹绢，动至数以万匹，而且换来的多老羸瘦马。唐政府国库因而空虚，数十年还不清马价。此外，唐政府每年还须送回鹘两万匹绢，作为助唐收复两京的报酬。

唐武宗在位时期，回鹘被黠戛斯击溃，这个民族分裂为几部分，其中有的投奔吐蕃，有的向唐朝投诚（如嗢默斯），还有一部分活动于天德、振武（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北部）一带，窥视唐朝边区，以求一逞。

会昌二年（842）七月，乌介可汗公然提出无理要求，向唐政府索取大批牛羊粮食。宰相李德裕作了义正辞严的答复："我们用牛耕田，向来不准宰杀，羊的数量也很少，无法供给。如果须要粮食，可以提供三千石，必须用马交换。"乌介可汗看了唐朝政府的答复，不仅没有改变态度，反倒变本加厉，向唐朝方面提出领土要求，声称要借用边防前哨天德城，而天德城是唐朝北方门户，战略要地。乌介可汗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唐政府的拒绝。会昌二年八月，乌介可汗令回鹘军悍然越过把头峰，突入大同川（今山西御河），兵临云州（今山西大同市），掠河东牛马数万匹。

宰相李德裕针对当时边区形势，当即作了反击回鹘的具体部署。首先，立即调陈、许、徐、汝、襄阳兵，开赴太原、天德，准备反击。其次，九月，李德裕任命刘沔为招抚回鹘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李思忠为河西都将招抚回鹘使，各路大军经太原北进，并令刘沔屯兵雁门关，加强了防卫力量。

会昌三年八月，回鹘大举侵入振武。唐将刘沔派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3 000骑兵为前锋，刘沔领大军殿后。石雄军掘地道偷袭可汗牙帐，发动了猛攻，大败回鹘于杀胡山。乌介可

汗被唐军射伤，带数百骑逃窜，回鹘兵失掉了统帅，全军陷于混乱状态。唐军乘机大举反攻，结果斩敌首万余级，收降两万余人，取得反击战的彻底胜利。这次战争是安史之乱后边区防御战的最大胜利，它不仅保卫了北方的安全，而且壮大了唐军的声威，大大鼓舞了士气。

其三，打击寺院地主，巩固中央集权。周武帝时，佛教势力曾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是隋文帝以来，统治者又极力恢复发展佛教。唐初继续利用佛教，武则天掌权后，佛教势力迅速发展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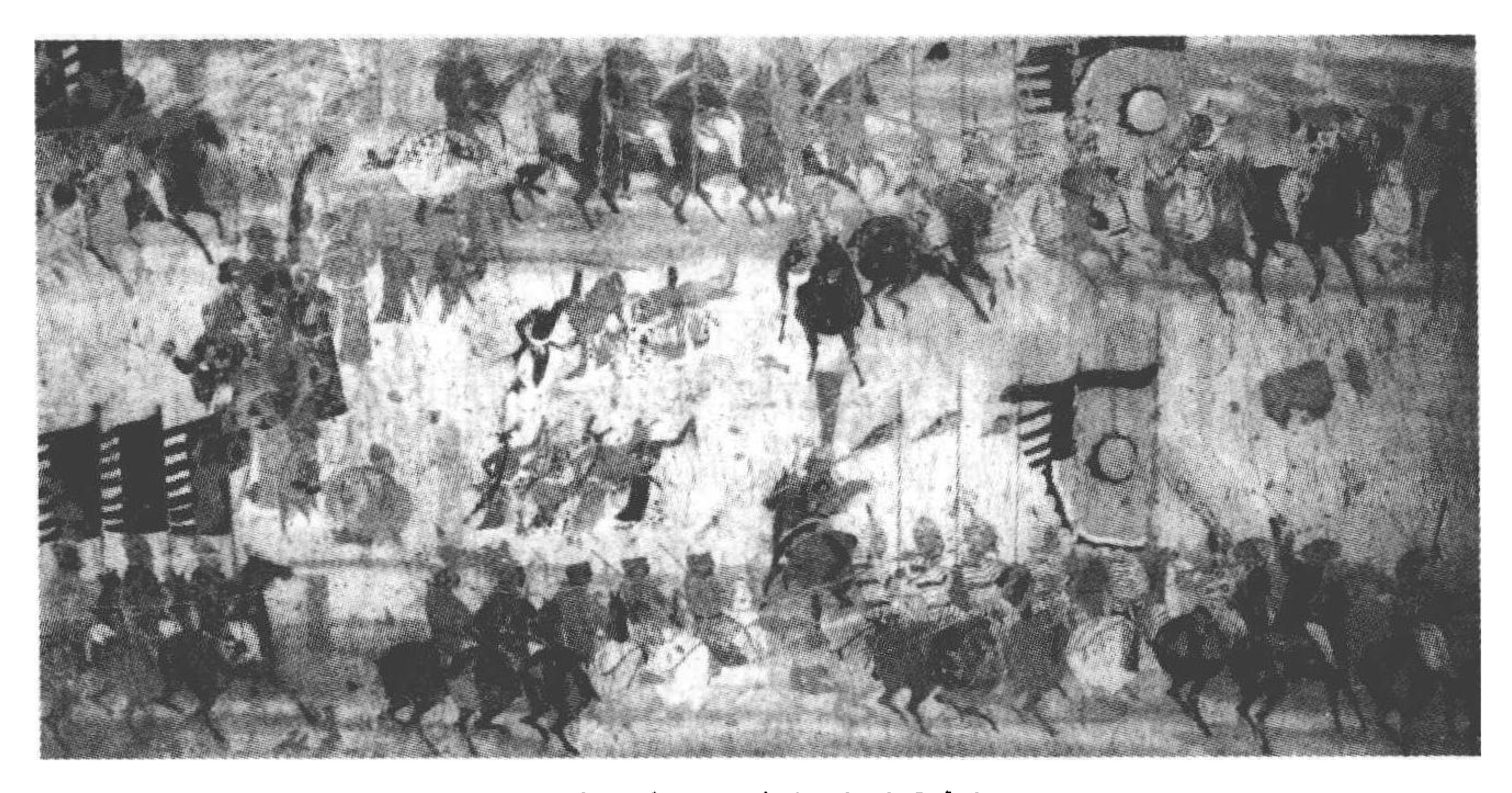
佛教势力的膨胀，一方面浪费民间资财，同时由于寺院土地的扩大和僧侣的增多，必然减少国家税源。因此，从李唐建国以来，凡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多数人都反对佛教，其中著名的人物有付奕、狄仁杰、辛替否、姚崇、李叔明、彭偃、韩愈等。但是，在唐武宗以前对佛教只是从理论上反驳，没有多大实际效果。到了唐武宗时期，反佛斗争发展到了新阶段。这是因为：安史之乱以后，佛教势力继续扩大，寺院地主控制大量土地和劳动力，严重破坏国家税收和徭役来源。加之武宗时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战役，前后近两年之久，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使国家财政发生很大困难。为了解决上述困难，有必要销毁寺院，解放劳动力，没收寺院资财。在这方面李德裕是具有实践经验的：他在浙西曾拆毁寺观 1 400 余所；在西川任节度使期间，毁寺观兰若千处，把寺院土地分给农民。会昌五年（845），李德裕将浙西毁佛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唐武宗坚决支持李德裕的毁佛主张，派御史分道督察，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全国拆毁寺院、招提、兰若 44 600 余所，还俗僧尼 260 500 人，奴婢 150 000 人，没收土地数十万顷。

大量肥田卖钱归户部，中下等地分给还俗的僧尼及奴婢，每人 10 亩，种田者变成两税户。

会昌年间的毁佛，实际是唐政府和寺院地主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的斗争。由于这次毁佛的胜利，从而扩大了唐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会昌末年，全国税户共 4 955 151 户，比“元和中兴”时期增加了两倍多，比穆宗时期增加 1/3，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

十四、“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张议潮光复河西走廊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局部）

“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这句诗是唐朝河西人民对张议潮英雄业绩的颂扬。张议潮是怎样收复河西的呢？

所谓河西，指的是现在甘肃省黄河以西地区，又称河西走廊，这个地方是中原和西域之间的交通要冲。河西走廊西端的沙州（今敦煌），是从西域进入中原的咽喉，地位极其重要。当时从西域到沙州有三条道路：一是从沙州往北达伊吾（今新疆哈密）；二是从沙州往北达高昌（今吐鲁番一带）；三是从沙州往西南到于阗（今新疆和田）。从西汉以来，长安到西域的交通就是以这条道路为主。

从军事方面看，河西走廊是唐政府经营西域的基地。早在武德二年（619）李世民打败薛仁杲以后，便在秦州（今甘肃秦安）设置总管府，辖秦、渭（今甘肃平凉）、岷（今甘肃岷县）、洮（今甘肃临潭县西）、兰（今兰州市）等 13 州。贞观元年（627）在这

个地区建立陇右道，把管辖范围扩大到瓜州以西。河西走廊周围是民族杂居之地，它的北面最初是突厥，后来又是回纥。这些游牧民族经常驰骋在今甘肃和宁夏的沙碛地带。河西走廊的南面，是吐蕃活动区域，他们盘踞在青海西藏高原。这南北两大势力，都垂涎于狭窄的河西走廊，经常骚扰这一地区。他们骚扰河西走廊的原因，就是因为祁连山麓农业发达，牧业繁盛。不仅如此，而且这个地区位于中原和西域贸易的中枢地点，城乡殷实，因此变成吐蕃和回纥掠夺的目标。唐政府也总设法保住河西走廊，以便维持东西方的贸易和交通。

安史之乱以后，河西陇右的军队调到内地平叛。吐蕃奴主乘机蚕食陇右河西，妄图攫为己有。广德二年（764），他们攻陷了凉州（今甘肃武威），河西节度使逃往沙州，在沙州设立节度使府。当时沙州附近各州，都被吐蕃占领，只有沙州军民仍然英勇抵抗，不肯投降。后来吐蕃奴隶主尚奇心儿包围了沙州，沙州刺史周鼎求援于回纥，援兵不至，周鼎打算焚城东逃，部众不从。都知兵马使阎朝杀周鼎代之，坚持守城 11 年，终因粮尽，自己和沙州同陷于吐蕃。沙州沦陷的时间是在唐德宗建中年间，最晚也不能晚于贞元初年。

吐蕃对占领区人民极端残暴，凡是吐蕃军队所到之处，焚烧庐舍，蹂躏禾稼，驱掠人畜，无恶不作。同时因为吐蕃“重壮贱老”，唐人被他们俘掳以后，老弱全部杀光，少壮充当奴隶。据《旧唐书·吐蕃传》说：“用刑严峻，小罪剜眼或皮鞭鞭之，但随喜怒而无常科。囚人于地牢，深数丈，二三年方出之。”

不仅如此，而且吐蕃奴隶主还严禁唐人穿汉族服装，只许他们每年元旦着自己衣服祭祀祖先，祭完便收藏起来。每逢到了这一天，唐人无不向东方遥拜，痛哭流涕，怀念久别的家乡。

德宗时期，唐朝使臣韦伦从吐蕃回长安途中经过河陇，一路上看到被俘的唐人都是毛裘蓬头。这些人在墙缝里偷看唐使，有些人

搥胸流涕，并向东方拜舞，盼望唐军早日收复失地。后来张议潮起义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公元9世纪40年代，河西一带的回纥四散，吐蕃也日渐衰弱。武宗会昌二年（842），达磨赞普死，由于他没有后人，于是王后綝氏立内侄乞离为赞普（国王）。大相结都那因反对立异姓为赞普，被后党杀害。另一派大臣又立老赞普的支属俄松为赞普，从此吐蕃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裂，两个赞普互相争夺王位。吐蕃吐门川讨击使论恐热，起兵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大相尚思罗战败，西逃松州（今四川松潘）。论恐热追至松州，杀了尚思罗，他自称大相，后来又出兵20万攻打鄯州（今青海乐都）节度使尚婢婢，所过之处掠夺以外，逢人便杀，积尸狼藉。鄯、廓、瓜、肃、伊、西等州都遭兵燹。唐政府利用吐蕃内乱，策划收复失地。宣宗大中三年（849），首先光复了秦、原（今宁夏固原县）、威（今甘肃中卫）三州，以及石门木峡七关，但这些地区都在河西走廊的东部。

河西走廊西部的收复，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大中二年（848）。这年三月，沙州张议潮领导人民起义，大举进攻沙州城。城里唐人响应，协助张议潮赶走了吐蕃的镇将，光复了沙州。不久，又夺回瓜州（今甘肃疏勒河以东安县）。在沙、瓜两州光复以后，张议潮立即派人到长安报告唐宣宗。张议潮唯恐表文送不到长安，他分遣10队使者，带着同样的表文，分10队出发，其中一队顺利到达天德军（今包头市西）。第二年二月，天德军的报告送到长安，并得到中央政府的回信。于是张议潮的使者带着唐宣宗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的敕令返回了沙州。

第二阶段是在大中四五年间。张议潮率领着河西人民扩大战果，又收复了伊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今甘肃张掖）、鄯州、岷州、廓州、兰州等地。大中五年（851），张议潮又派其兄张议潭携带河西十州地图和户籍到达首都。十一月，唐政府决定，在沙州恢复河西节度使，号称

“归义军”，并任命张议潮为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归义军节度使和十一州营田处置观察使。

河西道虽然被张议潮收复，吐蕃军暂时撤退，但河西走廊并不安宁。因为吐蕃奴隶主贵族时刻想卷土重来，不断侵犯瓜、沙。而回纥当时又正向甘州及安西迁移，时刻威胁着河西走廊的安全，这使张议潮面临严峻的考验。大中十二年（858）八月，吐蕃组织反攻，在沙碛地带被张议潮军打退。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张议潮率领汉蕃兵 7 000 余人，克服凉州（今甘肃武威）。咸通七年（866），又光复了西州（今吐鲁番）。

从上述情况可知，张议潮不仅光复河西 11 州，而且向西域进军，收复安西部分州县。为了保持和巩固这些地方，前后断续进行 19 年的斗争。他的英雄业绩，赢得河西人民的衷心爱戴。在《张议潮变文》中写道：

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除了《张议潮变文》以外，在敦煌遗书里，还发现了《张氏勋记》等，内容是颂扬张议潮全家功绩的。

张议潮光复河西走廊以后，接着要做的，是巩固胜利成果和建设河西的问题。

当时河西陇右的经济，主要是农牧业。但是这些地区雨量不足，必须靠人工灌溉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张议潮当了河西节度使以后，积极开发河西陇右的水利事业。他除了兴工开渠以外，并且专门设置“渠人”这一官职，几个“渠人”以一条渠为中心组织起来，专门监督管理渠道事务。由于水利事业的兴修，所以河西走廊的农业也得到发展，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逐渐繁荣，沙州成为东西贸易和交通的中枢。当时于阗的玉、回纥的马、高昌的棉布、龟兹的硇，都是经沙州运到中原。同时内地的茶叶、陶瓷、丝织品

等，也是通过沙州运往亚欧各地。唐朝后期的沙州城，国内外商旅川流不息，贸易十分繁盛。我们从鸣沙山石窟的艺术品，以及佛教发展的盛况便可以了解，河西走廊社会的繁荣，决不仅是依靠沙州、瓜州农牧业的微薄收获所支持的，当主要依靠国内外贸易。

另一方面，中原文化在光复以后的河西陇右也大放异彩，沙州人民特别喜爱中原文化上的新成就。例如在敦煌发现的文献中，有一页背面写着两首词：一首的调是《望江南》，另一首调是《菩萨蛮》，后面标的年代是咸通十年（869）。《望江南》是唐文宗时期李德裕镇浙西时所创的调，《菩萨蛮》是唐宣宗自制的谱调。在一般情况之下，创调以后须要较长时间才能流行。然而上面两个调创作以后不过一二十年，就流行于沙州，并且沙州还有人用这两个调填词，可见河西走廊吸收中原文化的迅速，以及河西和中原文化关系的密切。

总之，张议潮领导的沙州起义，是在沙州沦陷六十年以后出现的。通过这次起义，一方面使河西十余州人民脱离奴隶生活，同时也促进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沙州人民永远怀念着民族英雄张议潮。

十五、庞勋起义

唐朝末年，不仅中原各地社会矛盾尖锐，而且边区问题也很严重。唐懿宗初年，南诏奴隶主贵族骚扰边境，“一破黔州，四盗西川”。唐军屡次失败，朝廷无计可施。

咸通三年（862），唐政府在徐州召募3 000人镇守安南，并800人戍守桂林（今广西柳州南），最初约定三年为期限。但是，桂林戍卒已驻守六年，徐州刺史仍然不许他们回乡。咸通九年（868）七月，牙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等率领桂林戍卒起义，杀都将王仲甫。又推举粮料官庞勋，带领戍卒，经江南西道，沿长江东下，过浙江白沙，又沿浊河进入淮南，然后北上，返回徐州。

咸通四、五年以后，徐泗地方连年灾荒，赋役繁重，因此徐泗百姓“人人思乱”。当庞勋起义的队伍经过这里的时候，流民纷纷参加起义。

咸通九年（868）十月，这支农民军进驻符离（今安徽宿县北），大败唐军乔翔于濉水。十月三十日，农民军占领了宿州（今安徽宿县）。

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以都虞侯元密为将，带领3 000人包围宿州，准备一举消灭庞勋起义。这时农民军连夜撤离宿州，元密跟踪追击，途中遭了伏击，唐将元密被射死，士卒死者1 000余人。剩下残兵数百，全部投降。庞勋乘胜率众北度濉水，攻陷彭城，观察使崔彦曾被俘，其部将尹勘、杜璋、徐行俭等都被农民军枭首示众。当天，彭城内外参加起义者就有1万余人。

庞勋取得徐州以后，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以许佶为都虞侯，赵可立为游奕使，原桂林戍卒都当了各级头领。庞勋乘胜向周围地区扩大阵地，分派副将刘行及领1 000余人进攻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李圆率2 000人进攻泗州，梁丕领千余人围攻宿州。这年十一月末，唐军接连败北。于是金乡（今山东金乡）、砀山（今江苏砀山）、鱼台（今山东济宁）等十余县农民，“斩官吏，出金帛”，纷纷参加起义。

十二月，农民军又大败唐将李湘，占领了都梁城（今安徽盱眙县南）。接着便南下舒（今安徽庐江）、庐（今合肥市），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县），连破下蔡（今安徽凤台）、巢县（今安徽省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等地，斩刺史高锡望。同时又西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占领滕（今山东滕县）、丰（今山东丰县）等十余城。到了咸通九年（868），长江以北，汴州以东，纵横千里之处，都在庞勋义军控制之下。

由于农民军所控制的区域正是江淮漕运的中心，也就是朝廷的生命线，因此庞勋起义的胜利，使首都大震，举朝惶恐。唐懿宗急忙调兵遣将，组成三路大军。当时任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军

节度使，令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以羽林将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率领各镇及沙陀、吐蕃兵共20余万，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围剿农民军，但三路唐军都被农民军击败。

农民军打垮了20万唐军以后，威震朝廷。从此江淮漕运断绝，“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在这大好时机下，假若庞勋能指挥几十万农民军挺进中原直捣长安，唐朝的腐败统治者是可能被推翻的。可惜庞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无敌于天下”，于是息兵卸甲，只等待朝廷加官晋爵。为此，农民军将领周重批评庞勋说：“骄满安逸，断难成事。得亦必失，成亦必败，况未得未成。”但庞勋拒不接受正确意见。唐政府利用这个机会，“收散卒，修守备”，准备新的围剿。

咸通十年（869）正月，唐政府撤了王晏权的职，任命右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调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招讨使，敕令河北各镇节度使，派兵协助康承训，共同镇压庞勋起义。当时魏博节度使何全皞派部将薛尤领1.3万余人进驻丰、萧一带（今江苏萧县），以便配合曹翔的部队互为犄角。主帅康承训召集各道兵马共7万余人，从宋州出柳子镇（今安徽宿县西），连营30余里。

当时农民军分驻淮北各地，大本营所在地徐州只剩几千人防守。庞勋发现唐军进逼徐州，感到形势不利，急忙在当地募民当兵，但百姓不愿应募，很多人藏入地窖。这种情况使庞勋非常焦急，不得已把外地农民军调到徐州一部分，以护卫徐州。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削弱其他地方的防务，而且影响了外地农民军的斗志。

正在这个时候，唐军却利用农民军调动之机，发起攻击。在徐州以北，魏博镇军抢占了丰县，赶走农民军领袖孟敬文。同时，寿州方面的农民军，也被袭击。

咸通十年二月，义军大将王弘立引兵渡濉水，夜袭鹿塘寨，被大队沙陀骑兵突击，不幸3万义军几乎全军覆没，大将王弘立仅以

身免。

这年六月，康承训进攻柳子镇，一月之间与农民军姚周大小数十战。后来姚周支持不住，弃寨逃走。

至于徐州方面，从庞勋占领这个战略要地以后，一直把原来徐泗观察使控制在自己手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上述一连串事件表明，唐政府已决心消灭庞勋起义，妥协是不可能的。直到此时，庞勋才清醒过来，于是下令杀了崔彦曾、温庭皓等，并截断唐将李湘、郭厚本的手足，送给康承训，表示与唐军血战到底的决心。

处理完战俘以后，令全城男丁在球场集合，如有隐藏逃脱，罪至灭族。当时城里百姓被迫齐集球场，庞勋从中选壮丁 3 万余名，编入农民军。

扩军以后，庞勋自称天册将军，授他父亲庞举直为大司马，和许佶共同防守徐州。

由于唐军一再围攻丰县（今江苏丰县），庞勋亲自引兵乘夜前往，潜入城里。唐魏博镇兵在丰县城外分为五寨，其中离城较近的有几千人。庞勋首先围攻部分敌军，并且伏兵要路打援。结果，唐军的援兵果然遭到伏击，消灭两千余人，其余纷纷溃逃。其他各寨听说庞勋亲临前线，也都败走。

这次局部胜利并不能扭转整个战局，农民军在以后的战斗中，遭到一系列挫败。

庞勋留丰县数日，准备西击康承训。这时有人建议："现在天气炎热，蚕麦将熟，不如暂时休兵积粮，秋后大举。"也有人建议："将军出师仅有几天，就打败魏博 7 万兵，使康承训大为震恐，如果乘胜出击，一定能获全胜。"庞勋的父亲也来劝他出击，于是决定夺回战略要地柳子镇。五月二十九日，开始进军。不料，这时混入农民军里的淮南败兵到康承训那里去告密了。唐军得知情况后，抓紧时间秣马整军，设伏待战。襄城农民军首先发现伏兵，立即退走。等庞勋引兵到达前线，农民军的先锋业已败退，唐军正在

追击。结果农民军死伤数万，最后只有3 000人还徐州。

庞勋刚到徐州，围攻泗州的吴迥也归来了，报告农民军战败和王弘立牺牲的消息。

六月，唐政府一方面向前线增兵，一方面对农民军开展政治攻势，加紧了诱降活动。这时，不少地方农民军动摇，出现了瓦解现象。特别是那些后期参加起义的人，战斗力薄弱，革命意志不坚，一碰到唐军，不是“自溃”便是投降，这其中就有郑镒、李衮、朱玖、李金裕等人。

七月初，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锺离（今安徽凤阳）等地，接连失守。七月末，康承训督众包围宿州。宿州农民军首领原来是唐降官张玄稔，他的部将张实、张儒分遣数万农民军出城列寨，倚水自固。当时张实派人给庞勋送信说：“目前唐军集中兵力进攻宿州，淮西空虚，建议天册将军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出兵宋、亳，猛攻敌军后方，届时敌军必能从宿州外围撤退，支援淮西。这时将军便可以设伏于要冲，给敌人迎头痛击。到那时候，我们也能出城追击，前后夹攻，定可破敌。”庞勋看到张实的建议以后，便依计进攻宋、亳，同时给张实回信，要他也出兵西进。

这时宿州方面的唐军正加紧攻城，他们放火烧寨，张实无法抵抗，退保外城。唐军前线主帅康承训督军猛扑，但城上箭如飞蝗，射死唐军数千人，迫使他们退却。经过反复较量，康承训认识到，单纯靠武力很难攻克宿州。于是他又使用诱降之计，但张实毫不动摇。宿州主将张玄稔却现了原形，他召集亲党数十人，密谋叛变。于是派其心腹张皋秘密与康承训勾结，约期杀掉张实、张儒，愿为内应。康承训大喜，厚待了张皋，并令他返报如约。张玄稔夜间派人杀了张实和张儒，带3万余人投降。不仅如此，张玄稔还给唐军出谋划策，骗进符离，进围徐州。徐州城内的旧官吏路审中偷开城门，唐军蜂拥而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年九月，庞勋攻下宋州南城，北城垂手可得。但是由于张玄

稔的叛变，使康承训得以抽身支援宋州。这时庞勋为了避免和唐军主力接触，被迫引兵东走徐州。刚走到蕲水，叛徒李衮把桥拆断，拒绝庞勋进城。后面，康承训率大军赶到。农民军人饥马乏，疲惫不堪，处境非常困难。虽然如此，英勇的农民军仍与超过自己三倍的敌人奋力死战，终因寡不敌众，死伤二万余人，最后，庞勋壮烈牺牲。

庞勋牺牲后，吴迥仍然坚守濠州，不肯投降，敌将马举屡攻不下。从夏到秋，城中食尽，吴迥等被迫突围，与数十倍的敌兵搏斗，结果也都英勇牺牲。庞勋领导的起义，至此失败。

裘甫、庞勋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为黄巢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揭开了序幕。

十六、黄巢起义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腐败，水利失修，唐末自然灾害更加严重。乾符元年（874），黄河以北发生旱灾，小麦只收成一半。秋季作物颗粒不收，人们只能用草籽树叶充饥，无数百姓饿死。农民被迫揭竿而起，其中最著名的是王仙芝、黄巢领导的起义军。

王仙芝，濮州（今河南范县）人，以贩私盐为业。乾符元年（874）十一月，率众数千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县）起义，并且传檄诸道，揭露批判唐政府“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他建号“天补平均大将军海内诸豪都统”。这不仅是个称号，而且是一面斗争的旗帜。“平均”二字由农民起义领袖提出，实际是一个革命纲领，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政治要求。

黄巢，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世代贩盐，好击剑骑射，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多次参加进士科考试，都被抑而不得及第。黄巢了解唐政府的腐败，同情人民疾苦，因此当群众起而造反时，便毅然投入起义洪流。

乾符二年五月，王仙芝领导的农民军攻克濮州，达一万余人。

六月，克曹州。部将尚君长、曹师雄等在曹州附近扩大起义势力。黄巢与黄揆、黄思邺等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这年六七月间，北方蝗灾，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饿殍载途。十一月间，各地居民纷纷起义，少者数百人，多者千余人，成群结伙，纷纷加入王仙芝、黄巢的起义队伍。

唐政府急忙调中原和江淮等地武装集结于曹濮一带，以平卢节度使宋威任诸道行营招讨使，统一指挥各路兵马，镇压王仙芝黄巢起义。

乾符三年（876）秋七月，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城下，农民军被宋威打败。王仙芝、黄巢部众化整为零，转移到河南淮北一带。宋威找不到农民军，误认为黄巢、王仙芝已被消灭。他向朝廷谎报黄巢、王仙芝已阵亡，就回青州去了。

王仙芝、黄巢利用宋威遣散各路唐军的有利时机，于这年八月挥军西进，顺利克服了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不到十天时间，占领了八个县城。当时农民军的目的是在夺取东都，以便占领中原，直捣长安。

农民军主力在王仙芝领导下，袭击唐邓地区。而黄巢则带领另一支义军，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县西）为据点，钳制宋威和曾元裕两翼的唐军，等待时机，夺取中原。根据这一分兵计划，农民军的主力经由伏牛山区向唐、邓二州疾进，乾符四年（877）二月占领鄂州（今湖北锺祥县）、复州（今湖北天门县西北），然后进攻申州（今河南信阳）、光州（今河南潢川），并围攻寿州（今安徽寿县）、舒州（今安徽潜山）等地。

乾符四年（877）二月，黄巢率领农民军北上攻克郓州（今山东东平）、沂州，杀天平节度使薛崇，威名大震。黄巢为了围攻东都，又回兵中原。七月末，农民军和唐忠武、平卢、宣武三镇兵在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展开大战，宋威被打得非常狼狈，不得不挂出免战牌。后来，唐僖宗派张自勉领 7 000 人增援，才解了宋州之围。宋州战役以后，黄巢又攻克郏城（今河南郏县），活捉了

县令陆存。

另一方面，黄巢与王仙芝分裂以后，当时王仙芝从蕲州向外出击，攻克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正，接着奔向江陵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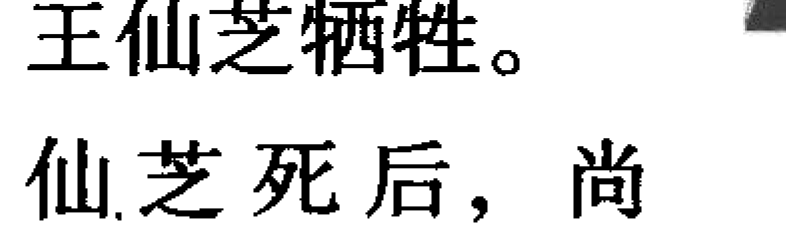
同时，农民军另一支部队在柳彦章领导下，克服了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俘刺史陶祥，并在江州建立水军，拥有战船一百余只。

当黄巢、王仙芝驰骋南北战场的时候，唐政府又来招降。招讨都监杨复光派判官吴彦宏潜入农民军内部，策动王仙芝投降。王仙芝派尚君长等与唐政府接洽投降的事，途中被招讨使宋威拘留，宋威立即向朝廷报功，并说在战斗中俘获了尚君长等。杨复光揭露说，尚君长是主动来投降的，并不是在作战中被俘的。宋威不管这些，很快杀了尚君长。王仙芝得知此事，怒不可遏，立即猛攻郢州，于乾符五年（878）初，攻破其罗城。当时坐镇子城的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急忙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救。李福连夜率全部兵马，并以沙陀骑将刘迁为先锋，支援江陵。这支唐军在荆门打败了农民军，王仙芝被迫向申州转移。

这时，驻扎在蕲黄一带的招讨使曾元裕乘机袭击王仙芝，农民军再次受挫，死伤两万余人。王仙芝被迫退至大别山区，南下黄梅。乾符五年（878）二月，农民军又被曾元裕军围攻，伤亡5万余众，王仙芝牺牲。



黄巢雕像



仙芝死后，尚让率余众北上，到亳州（今安徽亳县）会合黄巢。南北两支农民军会师以后，黄巢成了农民军的最高统帅，于这年二月，重新成立

政府，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设立各种官职。建元之举和“冲天”的名号，表示黄巢要彻底打倒唐朝的决心。从此，广大农民在黄巢的旗帜下，把农民起义推向新高潮。

南北合兵以后，黄巢挥师北上，再克沂州、淅州，准备在北方积蓄力量，然后大举，但屡遭挫折。三月间再趋宋汴，转向叶县阳翟等地。当时唐政府怕黄巢进攻东都，于是他们急忙调河南、昭义、宣武镇兵增援东都。又在东都募兵2 000，加强防卫。由于唐军云集，黄巢再次引兵南下，作远距离的游动。四月，黄巢组织农民军从舒州（今安徽潜山）过江，到达江州以后，与原来的江南农民军会师，接着进攻宣州（今安徽宣城）等地。

七月以后，农民军转入两浙。八月攻克杭州，再下浙东首府越州（今浙江绍兴），浙东观察使投降黄巢。农民军又从衢州（今浙江衢县）开凿七百里山路到达福建。在福建境内，大致分两路进军：一路从现在的浦城、崇安、建瓯、南平攻入福州；另一路从现在浦城以东经政和、福安、霞浦，再南攻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会师。黄巢在福州镇压了一批地主顽固分子，对于知识分子，则采取“优容”的政策。

农民军在福建休整一段时间后，沿海向南进军，经过泉州（今福建泉州市）和漳州（今福建省漳浦县）进入广东，后来经过现在潮、循一带，到广东东北部。岭南节度使李迢，在大军压境的紧急形势下，又唱起招降的老调，声言给黄巢以岭南节度使的官位，企图以此缓和阶级矛盾。但是，黄巢和王仙芝不同，他做好了准备后，开始大举进攻广州。

乾符六年九月，农民军经过几个月休整以后，一举攻克了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广州。黄巢进城以后，给贪官和富商大贾以沉重打击。接着，他们向广西进军，攻克了桂州（今桂林市）等地。不久，五岭以南广大区域，都在农民军控制之下了。

农民军在两广休整了几个月以后，补充了口粮和装备。

乾符六年（879）十月，黄巢令全军在桂州（今桂林市）结

集，利用湘江涨水的机会，乘数千木筏顺流而下，经永州（今湖南零陵）到达衡州（今湖南衡阳），农民军在衡州研究部署作战方案。

十一月中旬，农民军攻克江陵府，接着大军进逼襄阳。这时，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督率沙陀骑兵，驻守在江陵通向襄阳要路的团林铺（今湖北荆门南40里），而以曹全晸把守荆门关。荆门关地形险要，刘巨容选择了有利地形，做好伏击的准备。乾符六年（879）十一月末，农民军进至团林铺。曹全晸率沙陀兵迎战，刚一交锋，便佯败而走。农民军拼命追赶，遭敌人伏击，这次死伤17万人。

荆门之战失利以后，黄巢不得不放弃从襄阳进攻两京的计划。这年十二月初，黄巢撤离江陵，率大军顺江东下，沿途克服了饶（今江西省鄱阳）、信（今江西上饶）、池（今安徽贵池）、歙（今安徽歙县）、衢（今浙江衢县）、婺（今浙江金华）、睦（今浙江建德）等十五州。在作战过程中，各地贫苦农民纷纷参加起义，黄巢领导下的农民军发展到20余万。

广明元年（880）七月，黄巢引兵北上，占领了宣州（今安徽宣城县）。接着，农民军便从采石矶（今安徽当涂县西北）渡过长江，即克服和州（今安徽和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大军屯于天长、六合之间，距高骈驻地不到50里，使高骈坐立不安。他一面死守扬州，一面向朝廷告急。唐僖宗闻讯后，除了下诏指责高骈外，又调河南各镇兵进驻溵水（即沙河）；任命泰宁军（原驻山东兖州）节度使齐克让为汝郑把截制置使，率兵守郑汝一带；调曹全晸任天平节度使兼东面招讨都统，部署指挥洛阳以东的防务。

农民军在天长（今安徽盱眙东南）一带休整了40余日，然后耀武扬威，击溃了曹全晸军，攻占泗州（今盱眙对岸）。这年十月，黄巢指挥大军浩浩荡荡渡过淮河，沿途克服颍州（今安徽阜阳）、宋州、申州（今河南信阳）等地。这支义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一路上百姓参加起义者纷至沓来，使农民军迅速扩大到60

余万。这时黄巢又发表檄文警告各地官员说："我军过去陈兵淮南，饮马颍川，逐高骈如同赶老鼠，不久将打进东都，直捣长安，吊民伐罪。你们要各安其地，不许乱动，否则严惩不贷。"这里黄巢明确提出打进首都，惩办皇帝，吓得节度使胆战心惊。

十一月中旬，农民军开到东都外围，唐东都留守刘允章见大势已去，率部下出城迎降，黄巢胜利地进了东都。大军入城以后，不动群众一针一线，"闾里晏然"。

唐僖宗听说东都失守，立即召集宰相豆卢瑑和大宦官田令孜等商讨对策。田令孜保荐神策军马军将军张承范任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步骑将军王师会任制置粮料使，率神策军驰援潼关。

广明元年（880）十二月初，农民军的先锋到达潼关，他们的旗帜一眼望不到边。农民军大将尚让和林言亲率义军，从潼关南面的"禁阬"绕到潼关侧后，从两面夹击潼关。唐将齐克让虽然掌握万余武装，只勉强抵抗一下，就连夜焚营溃逃，黄巢攻克了潼关。

唐僖宗闻黄巢打进潼关，立即携带妃嫔、亲王等，离开长安逃往成都。

农民军占领潼关后，留大将乔钤率兵镇守。黄巢令尚让为平唐大将军，在盖洪、费全古的协助下，指挥数十万农民军奔向长安。广明元年（880）十二月八日，大将柴存率先锋攻进长安，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领文武百官到灞上迎降。黄巢入长安城时，农民军盔甲耀眼，旌旗蔽天，英姿飒爽，威武雄壮。满载粮秣的车马络绎不绝，车马隆隆，人马欢腾。长安市民聚集在街头，夹道欢迎义军入城。平唐大将军对欢迎的人群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像李家皇帝害了你们。从今以后，你们只管安居乐业了。"农民军都把自己的物品分给穷苦百姓。

广明元年十二月中旬，黄巢在长安宫城的含元殿，正式当了皇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黄巢即位以后，立即组织农民政府。黄巢任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为侍中，崔璆、杨希古为同平章

事，孟楷、盖洪任左右仆射兼军容使，费传古为枢密使，郑汉章为御史中丞，黄谔、李俦、尚儒任尚书，方特任谏议大夫，皮日休、裴偓任翰林学士，张直方检校左仆射，王璠任京兆尹，朱温、许建、张全、李逵任游奕使。这些人除了张直方、崔璆、皮日休、赵璋等人以外，都是农民军的骨干。当时的政权，完全由农民军掌握。

农民政府建立以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第一，没收大贵族、大官僚的土地和浮财，救济贫民。第二，宣布唐朝三品以上官员，全部撤职。第三，镇压顽固分子。当时大官僚豆卢瑑、于琮、刘邺、裴谂、赵蒙、李溥、李汤等，由于抗拒大齐政府的命令，私匿民间，立即正法。第四，整顿纪律，建立革命秩序。严禁农民军任意杀人。如要杀人，必须经过法律程序，经上级审批后方可执行。第五，刀、剑、戟、弓矢，一律上交国库，民间不许私藏兵器。第六，四品及四品以下官员，可以留用。

以上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大齐政权的农民革命色彩，和地主政权有显著区别。

黄巢虽然建立了政权，但其统治基础不很巩固。因为数十万农民军进了长安以后，没有继续向周围地区发展革命势力，过去的占领区，大部分放弃。大齐政权的势力，西到龙尾坡，东至潼关，东北抵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南控制商、邓。因此，首都长安实际在唐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粮食来源非常困难。

唐僖宗到达成都以后，又重新组织中央政府。四川本来是“天府之国”，加上农民军放弃江淮，那里的粮食绢绫源源不断输送到成都等地，于是，唐僖宗又有了卷土重来的本钱。而投降黄巢的凤翔节度使郑畋是两面派，他表面“归顺”农民军，暗地又挖战壕、筑工事，训练士卒，准备反扑。

广明二年（881）四月，唐僖宗任命郑畋为诸道行营都统，纠集各镇节度使，围剿农民政权。当时泾原镇兵据渭北、河中镇兵占据沙苑（今大荔县南）、易定镇兵据渭桥（今西安市西北）、鄜延

镇兵据武功（今陕西武功县）。四月，唐军发起进攻。黄巢发现敌军众多，势力强大，主动率部队撤出长安，把主力军布置在长安郊外。唐将程宗楚、唐弘夫、王处存等突入长安，他们纵兵出入民宅，大抢大杀，奸污妇女，长安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黄巢探知城里唐军缺乏后援，于是立即组织反攻。在大将孟楷率领下，起义军二次攻入长安，与唐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唐军缺乏统一指挥，大部被消灭，程宗楚、唐弘夫阵亡，只有王处存带少数残兵脱身。农民军虽然打了胜仗，但兵源和粮食的补充却遇到极大困难。虽然如此，他们在困境之中仍然坚持斗争。当时尚让西出长安，打败了邠宁凤翔军，收复了兴平。同州的农民军打败了王重荣。正在这关键时刻，驻守同州的朱温，于中和二年（882）九月叛变投敌。这样一来，长安东北门户被敞开，形势更加险恶。

当时唐政府为了增强进攻力量，又勾结沙陀人李克用。中和三年年初，李克用率领4万大军到达同州，会合唐将王处存和王重荣，在梁田陂与农民军展开激战。农民军被打败，伤亡数万人，迫使黄揆和王璠从华州撤退。四月八日，李克用打进长安，当天夜里，黄巢领15万农民军离开长安，退入河南。五月，孟楷率领农民军一举攻克蔡州（今河南汝南），接着，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唐军在陈州实行坚壁清野，顽强抵抗。当一支农民军进至项城（今河南项城）时，被陈州的唐军打败，牺牲1万余人。

从这年六月开始，农民军攻陈州300多天，发动大小战役数百次，始终没有取胜。黄巢长期围困陈州，是战略上的重大错误：一则农民军伤亡惨重，劳而无功：二则唐政府利用黄巢集中力量围攻陈州之机，拼凑大量部队，准备全面大反攻。中和四年（884）三月，李克用率兵5万从太原出发，会合汴州、徐州等路唐军奔赴陈州。于四月间攻陷太康（陈州附近），农民军伤亡万人。不久，屯驻西华（今河南西华县）的黄邺也被唐军打败，投奔陈州。这时，黄巢不得不从陈州撤兵，把大军引向汴州。李克用与忠武都监使田从异率兵北追，在王满渡（今河南中牟县北）乘农民军渡河之机

大举进攻，黄巢部众又伤亡万余人。尚让在这关键时刻投降了时溥。与此同时，农民军另一批将领葛从周、张归霸等，则投降了叛徒朱温。

王满渡战役后，黄巢经封丘（今河南封丘）到了兖州（今山东兖州）。这年七月，在山东莱芜以北的瑕丘，与唐将时溥打了最后一仗，农民军大部牺牲。黄巢至死不屈，最后在莱芜东南的狼虎谷，壮烈自杀。这次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最后失败了。

黄巢起义为什么失败呢？主要原因是搞"流寇主义"。在十年战争中，始终是流动作战，未能建立比较稳定的根据地，没有可以依靠的物质基础。他们往往是前面攻取一地，随后又放弃了。最后，几十万农民军进了长安，好像钻进口袋，减少了人民的支持，断绝了粮源和兵源。

另一方面，黄巢对消灭旧政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没有及时消灭在逃的唐僖宗，而忙于自己称帝。农民军进了长安，停止军事进攻，使唐政府得到喘息之机。唐政府从四面八方纠集兵力，对农民军反扑，从而使农民军在庞大的反动武装围攻下失败了。

黄巢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作用。这支起义军转战万余里，镇压了很多贵族、官僚和豪强。旧士族的残余，经过十年大扫荡以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黄巢起义是300年来农民反抗的总爆发。"黄王起兵，本为百姓。"农民军"广侵田宅，滥渎货财"，用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物，而对穷苦人民，争相施遗。这些活动正是"平等"、"平均"要求的朴素实施。黄巢的"平均"口号，对封建社会里后来的农民起义具有深远的影响。北宋时李顺、王小波更明确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就是在唐末农民要求"平均"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

黄巢起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远征。它经历了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苏、陕西12省，往返一万五六千里。这样的远征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农

民军中某个领袖主观决定的，而是唐朝所特有的社会条件促成的。首先是流民问题，早在安史之乱后，农民逃亡就很严重，唐代宗的《安抚流亡诏》里反映，当时很多农业生产者“荡为浮人，乡居地着者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这些失业破产的流民，“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倚豪族”，还有“结聚攻陷城邑者”。黄巢起义时吸收了大量流民。

其次是兵变问题。从8世纪中叶到黄巢起义时的一百多年间，全国有军乱、反叛、逐帅事件126起之多，兵变已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历史内容。这些兵变，有的是藩镇大小头目的斗争，也有一部分是士兵反对压迫的斗争。后一种兵变就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庞勋起义就是其具体表现。在黄巢领导的农民军中，有“庞勋余党”。所以《唐鉴》说：“黄巢之寇，本徐方之余”。

再次是“盐枭”问题。唐朝后期政府直接控制食盐产销，高价卖盐，从中牟取暴利，人民怨苦，甚至淡食，从而煮私盐、贩私盐的“盐枭”便活跃起来。武装贩盐的“盐枭”，把低价食盐卖给农民，解除农民淡食之苦，这便与农民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当农民起来反抗封建政权时，“盐枭”也可能参加，并且常常因为他们具有和政府斗争的经验和斗争能力，而成为农民战争的骨干。这样，便可以理解贩运私盐的黄巢、王仙芝领导农民起义的原因。

由此可见，流民、叛兵、“盐枭”都是唐朝社会孕育出来的，并且在农民起义中结为一体。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战斗过程中，充分表现了这些人的思想倾向：愿意流动作战，奔向大城市。唐朝交通比过去便利，“盐枭”在各地贩盐，士兵远戍边疆，他们走过很多地方，又熟悉山川关隘，就是流民的眼界也比一般农民广阔多了，这就为农民创造了远征的条件。因此，当他们遇到强大的军事压力时，便可能向有利的地方进军，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斗争情况，运用他们的战略策略，在这方面也表现出了黄巢等人卓越的才能。

第四章　隋唐的文化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伴随着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当时在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也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

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两项是在唐朝出现的，这就是火药和雕版印刷术。此外，孙思邈的医药学和张遂（一行）的天文历算学，也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唐朝诗坛，绚丽多彩，产生了千古不朽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散文仅次于诗歌，中唐以后，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成绩很大。小说一天比一天的兴盛，出现一批优秀传奇，奠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基础。

为了总结封建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唐朝特别重视历史学，确立了官修史书的制度，产生了第一部史学史的专著——《史通》。

艺术园地琳琅满目，五彩缤纷。著名音乐家万宝常、祖孝孙、唐玄宗，创造出很多名曲。隋朝的展子虔、盛唐的吴道子、中唐的张萱等，都是著名画家。敦煌石窟艺术宝库中有大量雕塑和丰富多彩的壁画。这些壁画不仅反映作者艺术水平很高，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唐朝皇帝有的宣扬佛教，有的推崇道教，同时西方几种宗教也传入内地。这些宗教的流传，虽然为统治者服务，但在客观上，双方高僧的往来，却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

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唐朝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文化发达的巩固基础，科学技术取得

了伟大成就，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就是其中之一。

雕版印刷术的形成，具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始祖应该说是图章，也就是印信或戳子。但印上的字不管是铸的或者刻的，都是反文，印出的才是正文。最初不论是阳文阴文，多印在泥土上，称为“封泥”。汉朝流行佩带大印，利用这种印驱除恶鬼。印长三寸，宽一寸，长方形，刻印的材料或者用金或者用铜，或者用桃木。在印上刻的是“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共34个字。这种印比一般汉印的字数已经多几倍了。

到了晋朝，有些道士以枣木心刻印，用以驱赶猛兽或水怪，所以古人进山时都佩带“黄神越章之印”。这种印比较汉印要大一些，长宽各四寸，共刻120个字。晋朝虽然已经用纸，但是这些木印，仍然是印在泥上。

在北魏时期，正史上曾提到用朱印印在纸簿或骑缝上。北齐河清年间，有一种“督摄万机”印。这种印很大，长一尺二寸，宽二寸五分，背上有一个鼻纽，钮长九寸，厚一寸，宽九分，这颗印是用木头刻的。北齐的印，比较晋朝的“黄神越章印”长大很多。后来人们称为“条印”或“关防”的，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有的，专用它来印“骑缝”。这种印当然是印在纸上，这就是雕版印刷术的萌芽。

印刷术第二个来源是石刻，石刻的历史也像印章，源远流长。我国现存最古的石刻是石鼓。春秋的石鼓是唐朝在关内道凤翔府发现的，在地下埋了很久，出土后又久经剥蚀，有一个已经一个字也看不清了。其他几个四面刻字，每个鼓上刻着一首诗。此外，秦始皇东巡时曾刻石七次，散布在峰山、瑯琊、会稽、之罘等地。

到了汉朝，石刻的范围逐渐扩大，除了石鼓、立石以外，又有了刻碑、刻经、摩崖、建筑石刻及砖瓦石刻等，其中刻碑和刻经与印刷术的发明有直接关系。汉朝凡是记事文字需要久传的，都用石碑刊刻，这种风气十分盛行。汉昭帝以后，儒家经典特别受到重

视。当时读书人互相传抄，以讹传讹，谬误百出。东汉熹平四年（175），汉灵帝应蔡邕的要求，把《周易》、《尚书》、《仪礼》、《鲁诗》、《公羊传》、《论语》、《春秋》等都刻在石碑上，作为大家校正的统一标准。后来人们嫌抄写费事，于是把纸铺到石碑上刷墨、捶打。碑上的字是凹下去的，因此把纸从碑上揭下来，就出现了黑地白字的碑文，一张张碑文合成了《春秋》、《尚书》等。石刻就是这样为雕版印刷创造了经验。

石刻十分费力，而木刻却比较简便。到了唐朝，由于封建经济文化的发达，于是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从上面所谈的情况看来，印章和石刻给雕版印刷铺平了道路，雕版印刷就是印章和石刻的产物，它是两者取长补短的结果。印章刻的是阳文，印刷便利，其缺点是面积太小。石刻刻的是阴文，不便印刷，但是面积很大。最后人们探索出新方法，就是雕刻大面积的阳文木板，用木板印刷历书。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间，过去有七种说法，最早的有人说是在汉朝，晚的有人说是在北宋，比较可靠的说法还是在唐初。明朝史学家邵经邦在《弘简录》第四十六卷中这样说：

> “太宗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官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

“梓行”两字，就是雕版印行，意义十分清楚。按长孙皇后死于贞观十年（636）六月，这本书的印行，应在这年或稍后，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内府刻本。当时民间可能有印本书出现，所以唐太宗才想到把它出版。问题在于邵经邦是16世纪的史学家，两《唐书》、《通鉴》虽然提到《女则》，但没有“令梓行之”一句，邵经邦所说根据什么，就不清楚了。《弘简录》是一部正式历史著作，是邵经邦花了15年工夫，换了四次草稿才写成的，可见他的谨慎不苟。这本书是比较可信的。

关于唐初发明雕版印刷术的事，从唐朝冯贽所写的《云仙杂记》又名《云仙散录》里可以找到旁证。这本书注明是“宋开禧元年（1205）刊”。宋朝有不少人引用它，估计最晚到13世纪初就有了这部书。《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

玄奘是贞观元年（627）从长安出发的，19年回国，麟德元年（664）逝世，所以玄奘印像应在麟德元年以前。可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应在贞观年间。[①]

玄奘印刷普贤像的数量很多，共有5驮，可惜没有直接流传下来。但是在敦煌发现的五代印刷品中，却有普贤像，约一尺多长，七八寸宽，可能和玄奘印的相似。此外，有人曾得到木刻佛像半卷，背面写着“天宝十二载”字样，这半卷佛像应是在玄宗或玄宗以前印的。

正因为唐初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所以到唐德宗时期，市场上便出现了一种印刷品，名叫“印纸”，作为商人交易的凭据。唐穆宗时期，扬州、越州一带曾印刷过两位诗人的作品。唐文宗时，有了冯宿关于禁印私历的确切记载。

到了唐末，全国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印刷中心主要分布在成都、淮南、洛阳等地。全国有名的印书铺有西川过家，专印《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成都樊家专印历书；龙池坊卞家专印陀罗尼经。有一张陀罗尼经印的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大约一尺见方，大部分都是古代梵文，中间和四周有小佛像，和宋朝刻的《大随术陀罗尼》很相似。唐咸通九年（868）王玠印造的《金刚经》，是现存世界最古的印本书，全卷长16尺，高1尺。下页右图是这本书卷首的扉画，可见其精美；左图是这本书的卷末刊语。除了佛经以外，成都各书铺印刷品中还有历书、《唐韵》、《玉篇》等。

---

①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60—64页。



《金刚经》

成都是唐代全国著名都市，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由于剑南西川经济繁荣，人文荟萃，作过两次行都，同时又生产有名的"益州麻纸"，就地取材，印书比较方便，于是就促成成都成了全国著名的印刷业中心。

唐朝发明的印刷术，后来流传国外，推动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

朝鲜是我国近邻，山水相连，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首先传入这个国家。大约在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当时高丽贵族王煦说："显宗则雕五千轴之秘藏，文宗乃镂十万颂之契经。"可见在11世纪高丽曾刊印了《大藏经》，前后70年才完成。到了11世纪末，他们除了印完《大藏经》以外，还刻了很多医书。成宗时期，高丽曾派使臣到宋朝，求得《九经》刊本，开始刊印。靖宗八年，崔颢等奉诏新刊《汉书》和《唐书》，献给靖宗。几年以后，又新刊《礼记正义》和《毛诗正义》，这是高丽最早的刊印本。

唐末五代，雕版印刷也传入日本。宽治二年（1088），日本刊印了《唯成识论》，这是日本最早的印刷品。随着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到了13世纪中叶，除了佛经以外，还印刷儒经、医书、韵书以及文学作品。除了日本人自己刻版印书以外，在元明两朝，我

国印刷工人还去日本直接印书。他们刊刻的书主要是《李善注文选》、《白云诗集》、《宗镜录》、《杜工部诗集》等。

越南和中国的文化关系也很密切，公元15世纪，越南的黎元老说："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义，以跻寿域"（《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九）。随着各种书籍的传入，唐朝发明的雕版印刷术也传到越南。但是越南人学会印刷术是在陈朝元丰年间（1251—1258），到了黎朝绍平二年（1435），刊印了《四书大全》。在18世纪，又印了《五经》、《四书》。

由于越南的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入的，所以他们所印的书籍，也仿中国印书惯例，在书里题某堂某斋或某地某家藏版。河内是越南全国的印刷业中心，印书的书坊有会文堂、广盛堂、盛文堂、福文堂、乐善堂等。

欧洲人最初看到中国的印刷品是纸币和纸牌。元朝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和鲁勃罗等，在自己的著作里都谈到元朝的纸币，以及纸币的质料、形状、币值、文字、玺印、流通情况等。通过这些旅行家的介绍，欧洲人了解了中国的印刷术。

欧洲最古的印刷品，是1423年印刷的圣克利斯道像，后来也印刷书籍。当时欧洲人印书时，先要用一只手在阳文木板字面上蘸上墨，另一手铺上纸，再用刷子来刷。所用的墨是烟炱和胶水溶成，印刷时只印纸的一面。这些方法和中国印书法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英国著名蒙古史学家亨利·霍华斯说："我自己毫不怀疑，……印刷术、航海罗盘针、火器以及社会生活上很多东西，都不是欧洲人发明，而是经过蒙古的影响，由最远的东方传入的。"法国东方学家莱麦撒认为，"中国人发明的航海罗盘针、火药、钞币、纸牌、算盘，都是经蒙古输入欧洲，活字印刷术同时也由远东而输入欧洲。"①

众所周知，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其重要性尽人皆知。

---

①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183—184页。

唐朝人发明的雕版印刷术，不仅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

二、火药的发明

唐朝科学技术上有很多发明创造，雕版印刷以外，还有火药。

火药由“火”和“药”构成，这不是偶然的。原来火药里的两种主要成分——硫磺和硝石都是药品，汉朝的《神农本草经》把药分成三品，硫磺和硝石分别列入“上品”和“中品”。在火药发明以后，药物学家仍然把它列入药类。例如明朝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就把火药收在他的《本草纲目》里，并指出火药能“治疮癣、杀虫、辟湿气、瘟疫”。可见火药最初是一种药品。

火药的发明和方士炼丹药有密切关系，它的产生，也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远在战国秦汉时期，历代帝王总想长生，于是就有一些人投其所好，自称能炼出长生不老的药来。这些炼丹家在崇山峻岭采花草，探金石，在深山古洞里炼黄金，制造长生药。由于这些人的大胆探索和辛勤劳动，往往发明和发现了新物质。

从战国到汉初，盛行神仙之学。当时有人认为，要想成仙，首先须要吃仙药，然后才能得到神仙的启示。所谓仙药就是“灵芝”、“巨枣”之类，吃了不会发生什么坏作用。最古传说中的神仙是在海外，秦始皇花化了很多钱，派了不少人到海外求仙，都没有成功。汉武帝晚年也积极求仙。据说有个叫李少君的对他说：“要想长生，先要虔诚地祭祀灶神，其次是用丹砂炼成黄金，再用黄金制成食具，用这种食具吃饭就可以成仙，长生不老。”这就是我国炼丹术产生的历史背景。

到了东汉末年，有一个魏伯阳，写了一本炼丹书，他还炼了不少“仙丹”。他最先把仙丹给狗吃了，狗吃以后死了，他自己吃后也死了。但是炼丹家并未因为吃药死人而灰心。东晋初期，葛洪著

《抱朴子》。在书中，他旁征博引，援古证今，宣扬金丹的神妙作用，这种思想在当时并未发生什么作用。但是到了隋唐时期，炼丹的事又兴旺起来。唐太宗、高宗和玄宗，都找过炼丹家，为他们炼黄金、造仙丹。宪宗、穆宗、敬宗、武宗据说都是吃丹药而死的。

炼丹家所制的仙药虽然药死人，但炼丹术并未失传。因为炼丹术分为两类：一类是炼仙药，另一类是炼金银。

火药也是炼丹中的副产品之一。它可能是在两种情况下产生的：或者，直接用类似火药的药料制造某种药时，这种药发生了火药的作用，从而发明了火药；或者，间接用类似火药的药料变化某种药时，这种药意外地发生了火药的作用，因此发明了火药。

第一次把火药的配方记录下来的是唐初的炼丹家和药物学家孙思邈。他写了一部《丹经》，书中谈到硫磺的“伏火”方法。为了叫硫磺“伏火”，他把硫磺、硝石各二两，研成粉末，放进砂锅里，掘一个坑，把锅放在坑里，使锅顶和地面平齐，然后用土把锅的四周填实。再把三个皂角烧红成炭，一个一个放入锅里，不小心就会起火。这件事说明孙思邈已经掌握了硝石、硫磺、木炭放到一起会起火的知识。

到了唐朝后期，有一本炼丹书叫《真元妙道要略》。书里谈到硝石“伏火”的时候，有时发生焰火。同时这本书还记载，把硫磺、雄黄、硝石放在一起，密闭加热，会起火烧了手脸和房屋。很显然，这就是原始的火药。

另一方面，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清虚子在《铅汞甲辰至宝集成》里，又提到“伏火矾法”。当时利用的药料是硫磺二两、硝石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前两种药料和孙思邈的“伏硫磺法”所用的药料是相同的，最后一种是植物，这三种药料合起来正是火药的成分。但是由于硫磺、硝石是天然的，而且由马兜铃产生的二氧化碳太弱，所以不能爆炸。

总而言之，唐朝实际已经发明了火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把硫

磺和硝石混合起来能发火焰，把硝石和木炭混合也产生类似火药的作用。过去所以未能发生较大的爆炸力，是因为药料不纯和几种药料不够标准的缘故。

火药是怎样用于军事呢？我国古代军事和方术有密切关系，兵书里记载方术，方士书也记载军事。在唐朝炼丹家和药物学家孙思邈的著作里，也有军事问题。唐朝后期李筌的《神敌太白阴经》的前半部是兵书，后半部就是方士的言论。

唐朝皇帝自己宣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因此特别尊礼老子和道教教徒，把道士、女冠，划归宗正寺管辖。当时不少方士借道家的名义奔走于帝王将相之门，干求利禄。从太宗、高宗下至玄宗，有的炼黄金，有的合丹药。唐朝中叶以后，有些方士在长安及各州活动，给朝廷和军阀出谋划策，参与军事机密。例如李希烈和唐军作战时，他用方士的计策烧了刘洽的战棚和防御工事，他们用的可能就是火药（本节参考冯家升著《火药的发明和西传》）。

到了唐朝末期，火药已经从炼丹家手里转移到军队中。没有炼丹家的启发，军事家决不会从难懂的方士著作里去找火药。

最初用火药制造的武器叫做“火箭”，唐朝咸通九年（867）十月，庞勋起义进攻宿州时，在一个大风天里，“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军营，死亡多人”（《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这种“火箭”也叫“飞火”。宋朝路振的《九国志》记载，在五代时期，有一个叫郑璠的攻打豫章，曾“发机飞火”，烧毁了豫章的龙沙门。郑璠率众突破龙沙门，被烧伤了皮肤。可见火药在晚唐和五代战争中已经发挥了威力。

总之，宋以前的火药武器共有两种。第一种是火箭，把火药的引线点着，用弓箭射向敌人的营寨、粮草。第二种，古人称为“发机飞火”，就是用抛石机把点着的火药包抛向敌人。古代的抛石机又称大炮，因为这种炮抛的是石头，所以炮字最初用石字旁，后来发明了火炮，又变成火字旁。

到了宋朝，便发明了各式各样的火箭。但是这种火箭都是以燃烧为主，宋朝以后逐渐用火药制造爆炸性武器。

唐朝人发明了火药是毫无疑义的事，但是，火药对人类文明起了什么作用？唐人发明的火药是怎样传到世界各国的呢？在中世纪，有三大伊斯兰教王朝先后兴起，这就是阿拉伯帝国的倭马王朝(661—750)、阿拔斯朝（750—1258）和埃及的马木路克朝(1250—1517)。阿拉伯帝国的极盛时期，疆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临大西洋，横跨亚非欧三洲，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唐朝和阿拉伯帝国（大食）经常往来，因此中国炼丹术也在八九世纪传到阿拉伯。中国炼丹家以丹砂为万灵之主，用以制仙丹、炼金银，而阿拉伯炼丹家也把丹砂叫做“赤硫磺”，也用以制仙丹、炼金银，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硝（硝石）在医药炼丹术上是一种必需的药料，医药和炼丹术既然在八九世纪传入阿拉伯帝国，那么硝石也很可能同时传入。1248 年以前，在伊宾拜尔写的《医药典》中，提到“巴鲁德”（“中国雪”)。可见在 12 世纪以前，唐人发明的火药业已传到阿拉伯了。

另一方面，在哈桑的兵书里，也有力地证明火药是从中国传去的。在这本书里，有三处焰火的配方，都写入“中国铁”，例如：

①实验花的成分：硝 10、硫磺 3、木炭 2、火石 4、中国铁 9、花 10。

②鸡斗的成分：硝石、硫磺 $1\frac{3}{4}$、木炭 $1\frac{1}{8}$、中国铁 2。

③契丹花用于火门的成分：硝 10、硫磺 2、木炭 $3\frac{1}{4}$、中国铁 10。

在 12 世纪以后，中国的火器也传入阿拉伯。据一种阿拉伯文兵书说，那时候阿拉伯有两种火器：一种叫“契丹火枪”，是和敌人交手时用的；另一种叫“契丹火箭”，是用于远射程的。很明显，这种火枪和火箭，必然是南宋人所习用的火枪和火箭。书中所

说的“契丹”就是中国，并不是契丹和辽。

火药也是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的。首先，唐人的炼丹术，于十二三世纪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大亚力卑尔特和罗吉尔·培根，就是炼丹家。在这两个人的著作里，都提到火药，但是他们还不会制造火药。在他们死后数十年，欧洲才有了火药。欧洲人使用火药，固然是由于受了他们文字上的启发，但在实际应用上，主要是因为战争的需要。公元1290年，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失败以后，法兰克人退出在亚洲大陆的亚加，转移到塞浦路斯岛上继续作战。当伊斯兰教国家进攻亚加时，曾用92座抛石机击毁了奥斯曼帝国堡垒上的一切防御工事。从此欧洲国家才开始接触到火药火攻法，才开始学习制造火药和火具。

唐朝发明的火药从阿拉伯传入欧洲，对整个世界文明发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恩格斯说：火药“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①]“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②]

直到今天，火药仍然在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上起着巨大的作用。

三、张遂和唐朝天文历算学的发展

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唐朝的天文学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唐政府设置太史局（有时叫浑天监、司天台等），内置天文博士、历法博士和天文观生、历生等，掌管天文，制定历法。

唐朝的算学由国子监管辖，内有算学博士、助教及学生。著名天文学家有张遂、李淳风、傅仁均等，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张遂。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9页。

张遂（673—727）是魏州乐昌人，幼年便刻苦好学，博览群书。他最喜欢天文历算。青年时代，他已是学识渊博的有名的学者了。大贵族武三思请他当官，企图借重他的名声博得礼贤下士的荣誉。张遂拒绝接受他的聘请，逃到嵩山，当了和尚，法号一行，人们称他为一行和尚。

唐玄宗非常重视学术，聘请不少名流学者，或当顾问，或叫他们集中起来著书立说。隐居嵩山的张遂，也应聘入宫，当了玄宗的天文历法顾问。玄宗曾问他有何特长，张遂说他记忆力很强，可以过目成诵。玄宗不大相信，就拿一本书给他看。张遂仔细看了一遍，果然一字不错地背诵出来。玄宗因此对他非常钦佩。

开元初年，玄宗要他修改历法。这是一件非常艰巨复杂的事，既要分析研究历代的历法，又必须通晓高深的数学。张遂在首都认真翻阅了有关文献，并请教一些数学权威，但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听说浙西天台山国清寺有位老僧精通数学，就不辞辛苦，到天台山向老僧请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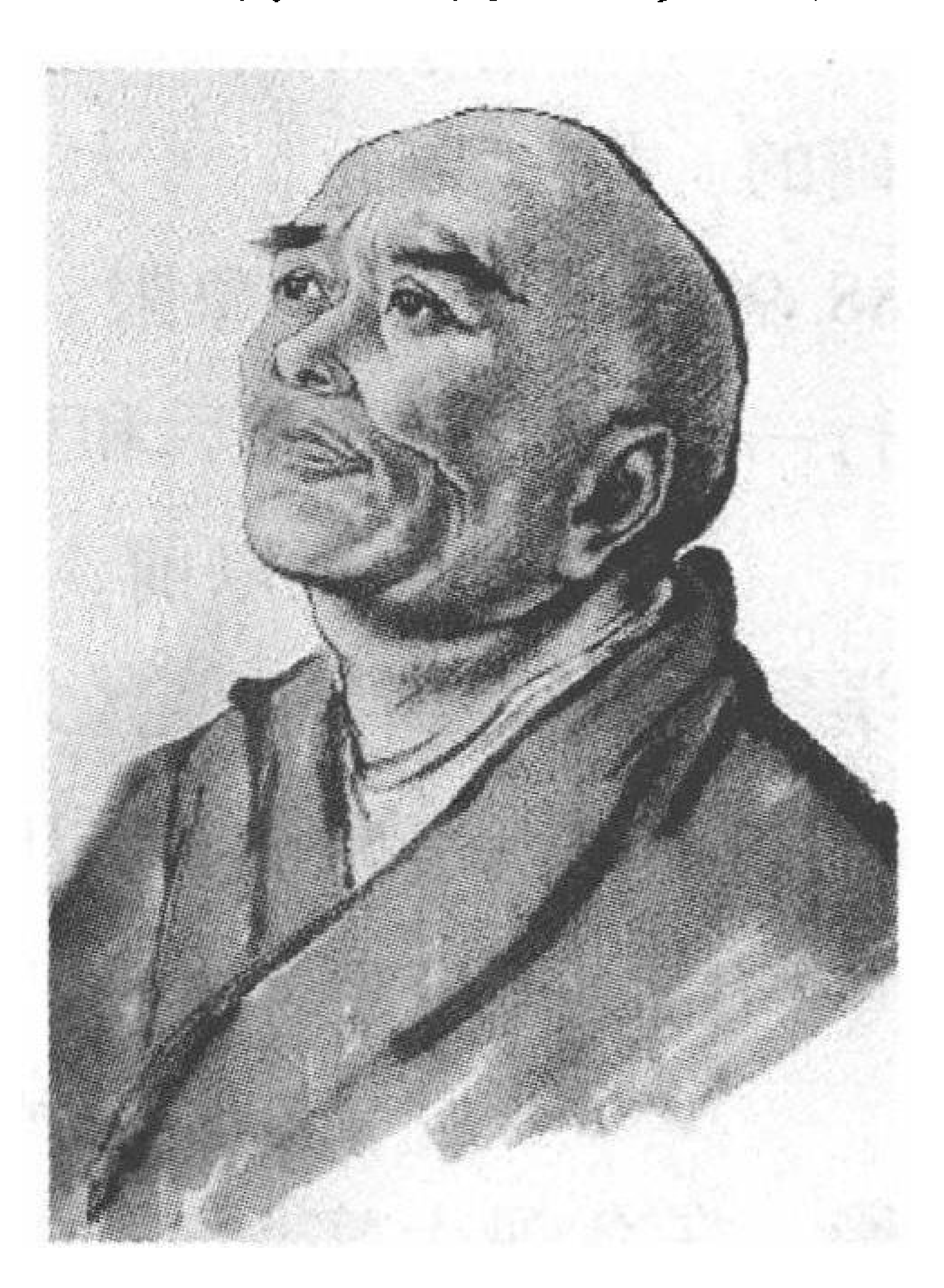
除了弄清计算上的问题以外，制定历法还须要进行天象观测，实际测量日月星辰在轨道上的位置和运动情况。为此他和另一位天文学家梁令瓒合作，制成观测天象的铜浑天仪和黄道游仪。

铜浑天仪是在汉朝浑天仪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制成的。张遂改制的浑天仪是一个球形的物体，球上有铁轴贯串球心，轴的方向就是地球的旋转方向。球和轴有两个交点，作为球的南极和北极。球面上刻着二十八宿和其他星辰。球的外围套有两个圆圈，一个叫地平圈，一个叫子午圈，交叉环套。天球半露在地平圈上，半隐在地平圈下。天轴支架在子午圈上边。另外，在球体上还有黄道和赤道，距离互成24°交角。在赤道和黄道上各刻有二十四节气，并且从冬至开始，刻分成365 $\frac{1}{4}$度，每度分为四格，太阳每天辐射在黄道上移动一度。这样一来，天体现象几乎都可以在球上表现出来了。张

遂为了使铜浑天仪能自己转动，还应用我国古代计时漏壶滴水的原理，在仪器上安装一个齿轮，用漏壶滴水的力量发动齿轮，齿轮带动浑天仪绕轴旋转，使仪器每天转动一周。这样便可以用水力转运仪器把天体现象反映出来。

黄道游仪是用以观测日月星辰位置和运动情况的天文仪器。当时天文学家认为，日月绕地而行。所谓“黄道”，就是太阳运行的轨道，而“白道”则是月球运行的轨道，用它来观测天象，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道上的坐标位置。

张遂用他制造的仪器重新测定一百五十余颗恒星的位置，同时也测量了二十八宿距离北极的度数。他在天文学上的一个新成就，就是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张遂把从测量一些恒星的轨道坐标及其对黄道的相对位置中得出来的数据，和前代天文学上测量的数据相比，发现有很大的差异。他的新发现表明：两个数据之间不仅赤道的位置和距极度数因岁差关系而产生差异，而且黄道上的位置也是不同的。根据这个情况，张遂认为，恒星在天体上的位置，也是在缓慢地移动着，并不像古人所认为的恒星位置是永恒不动的。张遂发现恒星运动，在世界天文史上是一次创举。公元 1718 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测量恒星的黄道度和古希腊不同，提出了恒星自行的观点，这已在张遂的观测发现 1000 年以后了。


张遂（僧一行）

张遂的另一伟大贡献是制定当时比较先进的《大衍历》。这个历法是一部具有改革精神的新历。张遂继承了汉朝以来天文学的优点，冲破了旧的传统束缚，最突出的成就是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太阳在黄道上运行时速度变化的规律（实际应当是地球绕太阳运行时速度的变化规律）。从两汉以来，历代天文学家都从太阳在黄道运行时的速度是均匀不变的原则

出发，把全年365天分为相同的度数，认为太阳每天等速度走了一度。根据这个道理，把全年均分为二十四个“气”，称“平气”。后来，北齐天文学家张子信，经过长期的观测，首先发现太阳每天的视运动是不均匀的。隋朝天文学家刘焯，在制定《皇极历》时，吸收了张子信的研究成果，并提出在历法中改用二十四等分周天来定节气，得知每气十五度多。这样划分节气的方法谓之定气。由于太阳每天在黄道移动的快慢不同，所以太阳移行一气所需的日数也不一样。冬至前后日行快，一气只有14.78日；夏至前后日行慢，一气达15.73日。他推算出春秋分各离冬至88日多，离夏至各93日多。刘焯所定的太阳运行的快慢的数值，是与实际不符的。而张遂的《大衍历》却符合实际情况，他认为冬至前后日行最快，所以二气之间时间最短；夏至前后日行最慢，所以二气之间时间最长。《大衍历》指出了正确的日行快慢规律，纠正了刘焯的错误认识。实际上《大衍历》的日行最快时刻是定在大雪和冬至之间，当时实际的近日点在冬至点前九度，所以《大衍历》的数据是准确的。另一方面，《大衍历》又测知从冬至到春分六个定点间共88.99日，日行一象限。从春分到夏至六个定气间共91.73日，也行一象限。春分前后和秋分前后的情况相同。

在1200多年以前，《大衍历》是最先进的历法，所以宋朝科学家沈括说：“开元《大衍历》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从唐朝中叶到明朝末年，使用了800余年。唐朝时，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把《大衍历》带到日本，在日本广泛流传使用，影响甚大。

张遂的另一伟大成就，是他指挥南宫说从全国各地测量了日影，在客观上实际是测定了子午线，这在世界天文史上还是第一次。

开元十三年（725），在张遂的倡议下，唐政府派南宫说等到全国十二个地方观测。观测的项目包括：这一地点的北极距地高度，冬至、夏至和春秋分日太阳在正南方的时刻八尺高表的影子

长度。

在这次测量中，以南宫说等人在今河南省的四个地点进行观测的一组最重要。他们除了测量北极高度和日影长度以外，还测量了这四个地点之间的距离。这四个地点是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浚仪（今开封市）、扶沟（今河南省扶沟县）、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这四个地点的地理经度几乎相等，误差很小。张遂根据这些地点实测所得的数据算得：从白马到上蔡，其距离相差526里270步（唐尺），夏至日表影的长度差2寸有零。这次观测再一次证明，古代传说的“南北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是错误的。千里一寸的说法，早在公元442年就被天文学家何承天所否定了。但是何承天始终认为，影差一寸的任意两地，其间南北距离的差总是相等的。这个说法实际是意味着地是平的，这当然是不科学的。隋朝的刘焯曾经提出过影差和南北距离的差的比率是不固定的。唐初李淳风也认为这个比率不是常数。开元年间张遂根据南宫说的实测，证明刘焯、李淳风的看法是正确的。从而使张遂等人完全放弃了地隔千里影差1寸的概念。根据南宫说得出的测量数据，很容易了解南北距离351里80步，北极高度相差1度。这个数据也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之长。化成现在的度量单位，当时测定子午线一度之长是129.22公里，而现代测量是111.2公里。张遂所得数据误差是13.9%。

张遂的数据误差虽然不小，但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长度的实测。它开创了通过实际测量认识地球的道路，纠正了日影千里差1寸的错误认识，把地理纬度测量和距离结合起来，既为制定新历法创造了条件，又给后来的天文大地测量奠定了基础。

通过这次测量，张遂认识了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这就是：在很小的有限的空间范围里探索出来的正确的科学规律，如果不加分析地任意向很大的甚至无限的空间条件下去推广，那就会得出荒唐的结果。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错误，就在于把只在小范围平地上总结

出来的平面测量理论主观地推广应用到大面积上去了。但是在大面积条件下地球表面就不能认为是平面，而必须用球面的概念来处理。张遂对古人的这个批判在科学思想上是一大进步。

对于张遂指导下的测量工作，过去有些论著夸大了历史的真实情况。南宫说在开元年间主观上并不是为了测量子午线的长度，而是为了测量日影在同一时间内在各地的投影长度的差别。因为在1200多年前，人们的知识还不能了解一个地方北极的高度就是这个地方的纬度，同时也不能知道北极1度的里差就是子午线1度的长度。因此我们只能说南宫说在客观上已经测出了子午线1度的长度。这个数据虽然不够精确，但他们使用的科学方法，却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次创举。

四、医学的发展和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

隋唐时期的医学有了很大发展，当时首都设立太医署，主管全国医学教育，培养医学人才。太医署划分医学和药学两部，设有专职的医疗、教学、行政、药工人员。

医学部设四科，即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在医科内部，又包括“体疗”（内科）、“疮疡”（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角法”（理疗）五个专业。根据各专业的教学内容，决定修业年限，内科七年，外科五年，五官四年，理疗三年。

药学设有药园300亩，专门培养学生种药、采药、制剂和用药的知识和技能。

隋唐时期名医辈出，巢元方、孙思邈、张文仲等都是杰出的医学家。隋朝的巢元方主编了《诸病源候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病源症候学的专著。这部书完成于大业六年（610），全书共50卷，把病源分为67门，列出各种症候1 700余条。这部书不仅论述各种疾病的病因和症状，而且包括疾病的诊断和预防。书里列出的主要

疾病有中风、风湿痹、虚劳、伤寒、天花、霍乱、疟疾、痢疾、水肿、黄疸、消渴、脚气、呕秽、痔瘘、痈疽等。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神经等科，每科都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说明。例如在妇产科里，即分为妇女、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五类。其具体内容包括月经不调、白带、子宫脱出、乳腺炎、妊娠恶露等。早在1300年前，我国就掌握了这样完备的医学知识，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诸病源候论》突出成就之一，是对各科疾病病源的认识具有很高的水平。例如在"瘟病候"中，已经认识到某些传染病是由外界有害因素所引起的，这些因素不仅能"多相染易"，而且可以预防。又如对"虚劳咳嗽候"的解释也合乎现代科学原理，作者说："虚劳而咳嗽者，肺腑气衰，邪伤于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微痛，或惊悸烦闷，或喘息口气，或咳逆唾血，此皆脏腑咳也。"

《诸病源候论》的另一特点是对于各科疾病的症状都作了详细说明。例如，关于眼病作者列出38条；妇女病列出140条，大大丰富了我国的医学宝库。

唐朝还编了一部新药典，即《新修本草》，这是世界第一部官修药典。我国古代相传的药典是《神农本草》，只记载365种药，梁朝陶弘景增修以后，共700余种。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太医苏敬等上书建议重修《本草》，唐政府征集20余人编写，用两年时间完成，定名为《新修本草》。全书56卷，记载药物850种，这本书的特点是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在编写过程中，唐政府曾通令全国，令各地选送地道药材，以之作为实物标本，描绘其图形，并详细介绍其产地、形态、性味、功效和主治，以便正确地识别采集和加工使用。在我国药物学史上，药图篇幅超过本草文字者，它算是仅有的一部。

这本书的另一特点，是继承了《本草经集注》的成果，并加以补充，使本书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如其中记载用白锡、银箔、

水银制造的汞合金“银膏”补牙，显然是唐朝群众的发明创造。这种方法欧洲在19世纪才开始使用，比我国晚了1100多年。

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581—682），是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名医。他是京兆华原人，隋文帝曾召他为国子博士，他不就，唐太宗初年到了长安，授给他谏议大夫的官职，但他仍然不愿做官。他年纪虽然大了，仍经常深入下层，不辞辛苦，不计报酬，不怕肮脏，甚至对那些“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的患者，总是想方设法予以治疗。

在医疗方面，孙思邈精益求精。他不仅刻苦钻研医学典籍，直到“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并认真总结临床经验，在反复实践中提高医学水平。他还经常学习民间的医疗经验。

孙思邈既博采诸家之长，又富于革新精神，这使他的理论和实践都突破了过去《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的旧框框，使我国医学“至唐而一变”。经过数十年的辛勤劳动，他从病理、治疗、药物、方剂等基础理论，以及内、外、儿、妇、针灸等科，进行全面总结，于永徽三年（652）写成了《备急千金要方》。全书共30卷，分为232门，方论5 200首。全书包括“脏脉之论，针灸之法，脉证之辨，食治之宜；先妇女而次婴孩，先脚气而后中风”。以及痈疽水肿，七窍之病，五丹之毒，备急之方，养生之术等。30年以后，在原书的基础上，他又写成《千金翼方》，把原来的旧作加以补充和发挥。孙思邈的医学成就，集中体现在这两部书里。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医疗学上。孙思邈针对当时医疗上存在的问题，提出综合治疗的方法。他提出：“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的观点，主张采用综合疗法。他不仅宣传综合疗法，而且亲自实施这种疗法。孙思邈既精通药理，又善于用药，并精通针灸法。在治病过程中，他特别重视针灸。在《明堂针灸图》里，他详细说明针灸疗法的特点、手法、穴位等问题，还不断探求新的穴位。有一天，一位患腿疼的患者来请他治

疗，孙思邈先给他服药，然后扎针，但未见效果。他千方百计设法治好患者，当时他设想，除了原有的365个穴位以外，是否会有其他新穴位呢？孙思邈一面用拇指按掐，一面问病人是否是这儿疼痛？他掐了很多部位，终于找到新穴位，治好了这位患者。这种疼点在哪儿就在哪针灸的方法，逐渐被推广起来，后来把这个随疼点而定的穴位，就叫做“阿是穴”，这是孙思邈的一大贡献（由于找准穴位时，病人发出了“啊，是！”的呼声，因此定名“阿是穴”）。

其次，孙思邈创建了妇科。他鉴于妇女具有胎、产、经、带、前阴、乳疾等特殊病症，主张妇女病应单独设立一科。他在自己著作里把“妇人方”列为卷首，对于妊娠、月经不调、赤白带下、养胎禁食、临床注意、产后护理等，都进行了深入具体研究。有一天，他在路上看见几个人抬着一口棺材，跟着的老妇哭得十分悲伤。孙思邈发现棺材下滴出几点鲜血，便急忙上前问明死者病情，知道死者是老妇的独生女，因难产刚死几小时。孙思邈认为这个妇女没有死，立刻叫他们打开棺材，经诊察，发现这妇女的脉搏还在微弱地跳动。孙思邈选定了穴位扎了一针，过了片刻，产妇苏醒过来，并且顺利地产下了婴儿。群众都称赞他医术高明。孙思邈在妇科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搜集处方540余种，灸法20余条。宋朝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和钱乙的《小儿药症直诀》就是在孙思邈的妇科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第三，药物学上的贡献。孙思邈不仅是著名医学家，而且对药物学也很有研究。他经常亲自上山采药，并反复实验。他从实践中总结了一些特效药的用途。例如用马齿苋、白头翁、黄连、苦参子治疗痢疾，用槟榔治疗绦虫等。孙思邈踏遍了中国几大名山，积累了丰富的采药和制药经验。他非常注意采药的季节和药物的处理方法，说明采药如果不按季节，处理上如果不分阴干或阳干，结果都会使药物失效。孙思邈的著作里，共计列出了233种药品采集的季节，并作了简要说明。有一部分药名下面，还注明根、茎、叶、

花、果各自不同的采集季节。此外，他的书还介绍常用药材 683 种，说明这些药物应随时采集，以备使用。

第四，其他方面的贡献。孙思邈认为，医生不仅应当了解各种药品的性能，还要掌握组成方剂的分配原则。假如医生不了解药物的特性，配方时又不分主次、轻重，以及药物之间的相反相杀的关系，而随意拼凑成方，这就不仅不能治病，而且会使病情恶化。孙思邈在药物调剂方面，不仅继承了前人的经验，而且进行新创造。例如东汉名医张仲景提出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孙思邈把这个药方变为四个方剂：即羊肉当归汤，羊肉杜仲汤，羊肉生地汤，羊肉汤，从而扩大了原方的治疗范围。这类例子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除了方剂学上的贡献以外，在《备急千金要方》里的“备急”门中，他对突然发生的“卒死”（休克）、“缢死”、“冻死”和火烧、虫兽咬伤或创伤等，都列出许多方剂，作为急救之用。

在他的著作里还列出“食治”门，介绍了谷、肉、果、菜等食物的疗病作用，主张凡是用食物能治好的病，就不必吃药。

另一方面，对于消渴病（糖尿病）如何防止痈疖的问题，他指出患消渴病过了百天，不能使用针灸疗法，要避免皮肤破损，因为皮肤破伤以后，容易发生痈疖。

孙思邈辛勤劳动了一生，给我国留下珍贵的药学医学遗产，千百年来，在人民群众当中一直起着救死扶伤的作用。因此后世称他“药王”，有的地方设有药王庙，就是纪念伟大的医药学家孙思邈的。

此外，在隋唐时期，外国的医药学也传入我国。隋朝有《龙树菩萨药方》4 卷，《婆罗门诸仙要方》20 卷。唐朝有波斯人李珣作的《海药本草》。外国医药学的传入，对于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诗人刘禹锡曾请天竺医生治疗眼病，他的《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写道：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珠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五、史学的发展及其重大成就

隋唐以前的史书，多是私家著作。到了唐朝，官修史书成为定制。唐太宗时，别置史馆于禁中，专门编国史，由宰相监修。馆内设修撰、直馆，从事具体编写工作。这种措施表明我国古代史书编纂工作到唐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映中央集权的统治越来越强。

由于加强了史书的编纂工作，取得的成绩也很大。贞观年间完成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李延寿还奉命独自删补南北朝到隋的八代史书，写成了《南史》、《北史》。现存的二十四史之中，唐朝修了八部，记载了西晋至唐初400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这是很大的贡献。

唐朝编纂的史书，除了沿袭前代的编年纪传体而外，又出现了会典、会要的新体裁，如唐玄宗时的《唐六典》和德宗时的《通典》等。《唐六典》是以官制为纲，把当时的各种令式，加以概括，分别系在有关官员的职掌下面。其中保存了大量唐前期的田制、户籍、赋役、考选、礼、乐、军防、驿传、刑法、营缮、水利等制度和法令的重要资料。德宗时杜佑编纂的《通典》共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九门，每门又分为若干子目，上起夏商，下迄天宝，凡是政治经济制度等都详其本末，并参以前代和当时人的重要议论。这部专著，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也为后代分门别类记载各朝的典章制度开创了先例。

当时史学上最重要的创作，就是刘知几的《史通》。刘知几

(661—721)，字子玄，江苏彭城（徐州市）人。他祖父是个史官，他父亲曾任唐高宗的侍御史。刘知几的家庭环境使他对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7 岁时基本上读完了唐朝以前的主要史书。20 岁中进士，被唐政府任命为获嘉县主簿。他利用任职以后的有利条件，继续研究史学。

刘知几不仅研究历史，而且关心政治。天授二年至天册万岁元年之间（691—695），他曾三次建议皇帝选贤任能，裁汰冗员，精简机构，严惩贪污分子，不要把高官厚禄给缺德少才的人。他的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是他的才能却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被提拔到京城任职，参加编写《三教珠英》。长安二年（702），升著作佐郎，后改任左史（皇帝议政时的六品官），并参加纂修《唐史》。第二年，又提升为凤阁舍人（中央政府的秘书），官居五品。

刘知几在修史过程中，发现大官僚集团的各种丑恶行为，他们不仅歪曲历史，还有种种“隐秘”。在编写《唐史》的时候，由于不能直笔写史而十分反感。在《史通·自叙》篇里，说明自己和顽固派的观点“凿枘相违，龃龉难入”，同时他认为：过去的史书，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讹谬甚多，必须重新修订。但他身为史官，却受种种限制，不能“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快孤愤，无以寄怀”。因此，从长安二年开始，刘知几就按着自己的意志编写《史通》。

当时学术界的保守派极端仇视刘知几，攻击他“躬为史臣而私自著述”，讥笑他“轻议前哲”。宰相兼史馆监修萧至忠多次批评他“论次无功”，对刘知几施加压力。兵部侍郎宗楚客公开散布说：“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于何地?”摆出了和刘知几势不两立的架势。刘知几并没有屈服，他顶住了顽固派的讽刺打击，毅然辞去史馆里的职务，并且给萧至忠写信，揭露史馆的黑暗。从此，他抓紧时间编写《史通》，经过 9 年的努力，终于在景云元年（710）完成了《史通》。

在这本书里，作者总结了唐朝以前各种史书，分析论证了这些

史书的优劣，同时提出了自己修史的见解。《史通》分内外两篇，内篇的《六家》、《二体》两章是专门分析研究唐以前史书的类别和体例。所谓“六家”指的是《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各家，说明各家的源流兴衰和优缺点。“二体”就是编年和纪传，作者指出两种体裁各有特点，不可偏废。外篇包括《史官建置》和《历史正史》两篇，概括了过去历代政府编纂史书机构的变化，和历朝正史的写作情况。总之，内外两篇各部分，实际就是刘知几对唐以前中国史学史的概述，明确肯定某些史书的优点，指出缺点。不仅如此，而且对于史书里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以及史书的论赞、序例、断限等，也备加论列。一面评论古人，同时也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刘知几认为修史者必须有史才、史学、史识，三者缺一不可。在中国文化史上，《史通》是一部划时代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的伟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作者坚持朴素唯物主义，反对在史书里宣扬神学迷信思想。作者引用史书中大量关于灾变怪异的记载，证明“天人感应”现象是根本不存在的。刘知几指出，所谓“祥瑞符命”“天意惩罚”等，除了少数是自然现象的偶合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伪造的。刘知几还认为，秦朝的灭亡，是由于胡亥的无道，汉朝的兴起，是因为刘邦有智慧，根本不是什么天意决定的。否则把一切归之于天命，既不能证明历史的发展，也不会给人们以有益的历史教训。因此，刘知几坚决主张写史书时应彻底清除神学迷信思想。

其次，刘知几主张写历史应当直笔。《直书篇》、《曲笔篇》从正反两方面详细论述这一点。什么是直笔呢？他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这就是说，凡是有关善恶褒贬之事，不管是谁做的，都应当据实直书。作史者怎样才算做到了直笔？刘知几提出四点要求：即不畏强暴，分清邪正是非，鉴别史料真伪，不为浮词妄饰。刘知几非常重视直笔，他以直笔为标准评价古今史学家，凡是合乎这个

标准的，他热情赞扬；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他严厉批判，从而发扬了史学优秀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评论的范围很广，认为孔子笔下的《春秋》虽然“别是非，申黜陟”，但仍有虚美之处，未能做到标准的直笔。对于唐初编修的几部史书，刘知几也毫无例外加以评论。他说：“皇家修五代史（梁、陈、北齐、北周、隋），馆中坠稿仍存，皆因彼旧事，定为新史。”“或以实为虚，以非为是”，以致“玉石同尽，真伪难寻”。他批评《周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遂使周代一代之史多非实录”。他把史家的曲笔痛斥为“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坏传统呢？他认为是由于史书作者畏惧权贵苟且取荣所致。

第三，刘知几反对复古主义，宣扬历史进化论。他认为把三皇五帝时代美化成理想时代，从春秋以来成为传统的说教，实际是没有根据的。刘知几在《疑古篇》里，根据大量史料论证尧舜相授，不是禅让，而是篡夺；并不是舜让位给禹，而是禹把舜给放逐了；不是人民不拥护启，而是启杀了益。成汤之代夏，武王之代商，都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刘知几的观点是对复古主义的有力批判。在刘知几看来，远古的生活很简陋，不是今不如古，而是古不如今。

第四，反对掩盖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主张实事求是的揭露统治阶级的本质。刘知几从夏商一直追索到唐朝，求得一条通例，即历代统治者都是争权夺利的人物，然而真实的历史却被史家粉饰，把某些创业帝王美化成至德的圣君。他用很多事例揭露史书的虚伪。刘知几在《疑古篇》里说明，不仅汉唐统治者经常处于内讧之中，而且三代所谓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都是互相争权夺势的能手。

刘知几的上述看法，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是他的进步历史观的表现。在1200年前，无疑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六、佛教道教的发展和西方宗教传入

周武帝毁佛以后，佛教虽然受了沉重打击，但是，由于剥削制度的存在，宗教仍然具有生存的土壤，仅仅用人力禁止不会生效。因此，到了隋朝，佛教又开始复兴。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敕令“户口出钱，建立经像，由是民间佛经，多于六艺之籍”（《佛祖统纪》卷三十九）。

到了唐朝，统治者继续利用宗教维护其特权。唐高祖李渊，把京城宅第送给沙门昙崇，并赐名“清禅寺”。唐太宗认为佛教“玄妙可师”。佛教不仅顺利发展，而且高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许多高僧生为帝师，死赠美谥，遗产甚多，死后又有高官显宦为他扶杖送葬。例如高僧玄奘改葬父母，当时僧俗会葬的人有1万余。玄奘死后，朝廷给他办丧事，用金棺银椁藏他骨灰，在500里内有100多万人送葬，3万多人庐墓。一个高僧能享有这样崇高的荣誉，可见当时宗教狂热达到什么程度了。

高宗武周时期，载初元年（690），沙门法明、怀义等10人向武则天进献《大云经》，陈符命，宣称武则天是弥勒佛化身，应当代唐作阎浮提主。武则天为了利用《大云经》制造夺权的舆论，令全国各州和两都都建置大云寺，各藏一部《大云经》，并及时向群众宣讲。武则天的这条命令执行得十分彻底，据考古资料可知，远在帕米尔的碎叶镇和海南岛，当时也设置了大云寺。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立即封怀义、法明为县公，特赐紫袈裟鱼袋，更进一步推动佛教的发展。

唐朝由于积极发展佛教，浪费了社会大量财富。载初元年（690），武则天令薛怀义作夹纻大像，佛的体积很大，仅一个小指就可容数十人。为了安置佛像，专门建筑了“天堂”。在建筑“天堂”的时候，“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薛怀义常作无遮会，用钱百万，士女云集，所在公

私田宅，多归僧有。后来薛怀义发怒，烧掉明堂与“天堂”，没有受任何处分，武则天仍然令他为使，重建明堂。

久视元年（700），武则天又造大像于白马阪，用工数百万。宰相狄仁杰说：“今之伽兰，制过宫阙……功不使鬼，止在役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

景云二年（711），唐睿宗为其二女造金仙、玉真观，毁大量民宅，用工数百万。左补阙辛替否上书反对说：“夺百姓口中之食，以养贪残；人无所食，未闻赈恤，而为二女造观，用钱百余万缗。”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宗和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等都崇奉佛教。代宗让僧徒任意出入宫廷，在宫廷陈设佛像、礼佛诵经，给僧众优厚的待遇。更加荒唐的是“每当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禳虏寇”。由于皇帝的提倡，于是“中外臣民承流相比，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通鉴》卷二百二十四）。

道教崇奉老子，唐统治者自认是老子的后代，因此也崇奉道教。道教最初在民间产生，东汉张道陵以符箓禁咒为人治病，后来又逐渐从符水转向炼丹。

道教宣扬清静无为，佛教高谈苦空寂灭，这都是装饰门面，实际都是与政治有关的。周武帝兴道灭佛，佛教徒助隋反周。在周武帝死后，著名道士焦子顺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协助他夺取北周皇权。隋文帝当皇帝以后，尊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他商讨国家大事，专为他建了五通观。隋炀帝怕道教搞阴谋，于大业元年（605），下令禁止图谶，烧毁与谶纬有关系的书，限制道教徒的活动。

隋末天下大乱，道士王远知给李渊出谋划策，叫他夺取政权。李渊成功以后，便打击佛教，暗助道教。另一方面，在唐朝初期，士族门阀还有影响，皇帝的李姓比不上山东高门。而《道德经》的作者李耳，却早成为超人的教主，如果和李耳攀上亲，皇室的门第必然可以提高。因此武德三年李渊在终南山建了老君庙，第二年

亲自到终南山礼拜老子。

唐太宗也利用道教，他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即李耳）……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大诏令集》第一百一十三卷《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贞观元年（627）七月，唐太宗下诏修葺亳州真源县的太清宫，因为这个地方是"圣祖老君"的诞生地。唐太宗偏护道教，主要是要确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孙。但他和佛教也有联系，他积极支持玄奘译经，敕令宰相房玄龄在首都主持召开欢迎玄奘的大会。

唐高宗即位以后，也利用道教为巩固政权服务。显庆元年（656），敕令改晋王宅为昊天观，在观中为太宗祭祀、祈福，并且以尹文操为观主兼知宗圣观。乾封元年（666），他东封岱岳，归途中曾到达亳州，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建置老君庙。高宗为了扩大老子的影响，当时下诏规定《道德经》和《论语》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并定为科举考试中必考的科目。这样做的目的，实际是要把道儒合为一体，作为一个拥护李唐王朝的社会势力。

唐高宗死后，佛教徒协助武则天夺权有功。武则天下诏降低道教地位，规定僧尼处在道士女冠之上。

唐中宗复位以后，又继续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不久韦皇后专政，佛教得势，道教又受排斥。

唐玄宗打垮了太平公主阴谋集团，巩固了李唐皇室。他上台以后，大兴道教，限制佛教。他振兴道教的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开元元年（713），发使搜访道经，纂修成道藏，目曰《三洞琼纲》，并且敕令西京太清观、玄都观、东明观、大德昭文馆、崇文馆学士修《一切道经音义》。

开元九年（721），遣使迎道士司马祯进京，亲受法箓，赏赐甚厚。置石柱于景龙观，令司马祯依蔡邕石柱三体书写《道德经》。后来玄宗采纳司马祯建议，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

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敕令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推崇玄学，置生徒，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按明经例参加科举。四月，唐玄宗自称梦见老子告诉他："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于是他派人到周至楼观山间去寻找。后来，命画玄元皇帝像，分置各州开元观。九月，玄宗亲自考试明道教经典的举子。

天宝元年（742）正月，在长安的大宁坊、洛阳积善坊设玄元皇帝庙。后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通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将"四子"著作改为真经。崇玄学设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100人。

第二年正月，追尊玄元皇帝（即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改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更置崇玄大学士一名，由宰相兼任，领两京玄元宫及道观。两京道观人员定为37人，各赐近城庄园一所，并量赐奴婢等。令崇玄馆学士今后每到三元日，讲《道德》、《南华》诸经，文武百官"咸就观礼"。

天宝五载，定为每年二月十五日为老子诞辰，与四月八日佛生日，全国官员、生徒休假一天。天宝七载，册封汉张天师为太师，陶弘景为太保。全国凡有洞宫山皆置坛祠宇，每处度道士五名，并取近山百姓30户，蠲免税役永远为道观服务。



吴道子《维摩诘像》

天宝八载，唐玄宗拜谒太清宫，给太上老君上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群臣上玄宗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敕令崇玄馆缮写一切道经，分送全国各道采访使，并令采访使在管内各道转抄，通过各级政府宣扬道家思想。

从上述情况看来，唐玄宗崇道，已达到极其荒唐地步。宋人范祖禹说："时帝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帝悦"（《唐鉴》）。

唐朝统治者除了利用道教抬高皇室的社会地位以外，他们都想通过道教徒取得长生药。从唐玄宗起，很多皇帝都积极追求长生不老。唐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都是吃长生药死的。至于大臣们，因吃长生药而死的就更多了。

唐朝统治者了解到宗教是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有力工具，对于外来宗教也十分欢迎。西方的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在唐朝时相继传入。

祆教 又名拜火教，波斯人琐罗斯德所创，系波斯国教，流行于波斯及中亚诸国。祆教认为世界上有光明和黑暗两神互相斗争。火是光明的象征，代表善神，所以崇拜它。祆教也拜日月星辰及天，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唐朝祆教进一步发展，信徒渐多，长安、洛阳、凉州、沙州等地都建立了祆祠，仅长安城内，就有胡祆祠、祆祠、西祆祠、南祆祠四所。

摩尼教 系波斯摩尼所创，又称明教，最初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及中亚地区。其教义认为：世界上具有明暗两种势力斗争，在天地未分之时，明暗各殊，双方势均力敌。后来黑暗侵犯光明。最后是光明与黑暗各复本位。现在世界正处于中间阶段，人们应当助明斗暗。摩尼教徒禁欲，不饮酒，不食肉，不祭祖，身着白衣，死后裸葬。延载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诞把摩尼教的《二宗经》传入中国。唐代宗时，摩尼师到达长安，大历三年（768），唐政府允许回鹘人信奉摩尼教者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后来又在扬州、洪州、荆州、越州、太原、洛阳设摩尼寺。唐武宗灭佛时期，摩尼教也受了打击。宣宗以后，逐渐恢复，在民间流传甚广，后来成为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号"食菜事魔"教。

伊斯兰教 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信仰——安拉——真主，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真主所造，教徒不食猪肉和无鳞之鱼，他们认为

吃这些东西是可憎的。《古兰经》是其基本教义。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阿拉伯帝国）遣使来唐。开元年间，大食使者和商人纷纷到长安、广州等地，伊斯兰教随之传入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徒瓦哈伯就曾在广州传教。

景教 系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又名也里可温教，贞观九年（635），大秦人阿罗本把景教传到唐朝。3 年以后，在长安义宁坊建了一所寺院。天宝年间，把景教寺改为大秦寺。除了长安以外，洛阳等大城市都设有大秦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载："高宗纂祖，更筑精宇，和宫敞明，遍满中土。"可见当时有不少人信仰这个宗教。会昌年间，景教也被破坏。

七、唐诗的发展

唐代诗歌无论题材之广泛，数量之繁多，艺术之精湛，形象之丰富，都是过去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据《全唐诗》所录，其中诗人2 300余家，作品 48 000 余首。

唐诗的发展一般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 90 多年是扭转齐梁以来浮艳的诗风使唐诗走向健康发展的时期。初唐前期流行的是虞世南、上官仪的作品，仍然是齐梁的诗风。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所谓初唐四杰，开始转变。后来的宋之问、沈佺期虽然也写了不少宫体诗，但他们却完成了七言古诗和五言七言近体诗的创造，对唐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陈子昂积极提倡建安风骨，批判齐梁诗风，高举诗歌革新的大旗，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恢复了我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奠定了唐诗健康发展的基础。

盛唐指从开元元年（713）到大历五年（770）的 50 多年间，这时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同时出现在诗坛。各种体裁的诗争芳斗艳，诗人辈出，犹如群星灿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王翰、崔颢等，成为浪漫

主义潮流中的主要诗人。他们的诗主要是反映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另一群是田园隐逸派诗人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他们的作品主要描写山水田园生活，思想性虽然不高，但艺术上很有成就。

安史之乱以后从大历六年（771）到唐文宗大和末年的60多年，诗歌进入中唐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各种矛盾激化，人民的苦难在诗歌中有了更多的反映。现实主义的作品得到极大的发展。从这个时候开始，反映人民疾苦成了优秀诗歌突出的主题。最突出的是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派，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张籍、李绅、王建、刘猛等。新乐府诗主要是揭发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同情人民的疾苦，他们的诗在当时及后代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中唐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加丰富。中唐前20年，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是盛唐诗的余韵。后期青年诗人李贺，吸收楚辞、乐府的浪漫主义传统，写出他精神上的苦闷和追求。韩愈、孟郊的诗追求奇险，这些名家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到了晚唐（唐文宗开成初到唐亡），伴随着国势的衰微和社会动乱，诗的风格发生很大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发展，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们却无所作为，从而感伤情绪成为他们诗歌的基调。此外，唐末的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仍然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写出一些具有批判的和战斗性的诗篇。

八、杰出的诗人李白

李白生于武周长安元年（701），死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他诞生于安西的碎叶。他父亲李客，是一个富商。在他5岁的时候，李客便携带全家从碎叶搬到绵州彰明县青莲乡。李白从此就在蜀中生活，直到20多岁。开元十三年（725），诗人为了寻找机会

发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便离开绵州，开始了漫游的生活。

李白离开四川以后，大约游历了 3 年光景，到 27 岁时，来到湖北的安陆。在这里，他和以前高宗时期的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了婚，便暂时定居在安陆。从此以后，直到35 岁，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虽然仍在各地漫游，但大体上比较经常地住在安陆。大概在他 35 岁的时候离开安陆，北游到山西的太原。



李　白

李白是夏天到太原的，在元参军家做客，游览了周围的名胜。大概在这年秋天就离开太原了。

接着他就东游齐鲁，最常住的地方是任城和沙邱（今山东的济宁和掖县），而且在沙邱安了家，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时他和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五人共同隐居在泰山南边的徂徕山，常常一块饮酒酣歌，当时人称为“竹溪六逸”。

离开山东以后，他南下漫游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经过了十余年的社会磨炼，他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了。

唐玄宗听说李白才华出众，天宝元年（742），召他进京。李白虽然游历十余年，但并没有到过长安。现在皇帝下诏征召，他当然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次进京，可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为苍生谋幸福了。李白入宫，玄宗却只让他当了一个翰林供奉，这是一种以文学词章被顾问的侍从职务，不是实际官职。这时李白除了在宫内侍从之外，在长安结识了不少朋友，最著名者有贺知章、崔宗之、晁衡等。这些人的地位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有那种放浪不羁的性格。他们经常饮酒，酒后则高谈阔论，表示不受现实社会的羁绊。

李白在长安三年，后被放还。在以后的十年中，他到过的地方

很多，东西南北行踪不定，除了常回到任城家中以外，他经常留在梁宋一带。大约在他五十四五岁的两年中，他经常往来于广陵、金陵、宣城（今江苏、安徽）等地。56岁的时候，他在庐山，被永王璘召为幕僚。就在这一年，永王璘和他哥哥唐肃宗争夺帝位。第二年，永王璘兵败，李白受到株连，被逮捕后囚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后来虽经别人营救出狱，但仍被流放到夜郎（今贵州桐梓），当时他58岁。第二年，在流放途中遇赦，才得回来。62岁死于当涂县。

李白是我们民族史上伟大的古典诗人之一，李白诗歌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充满着激昂向上、嫉恶如仇的精神。

李白很自负，他觉得自己不仅有诗才，而且有很大的政治才能，他经常自比周公、张良、韩信、诸葛亮、谢安等人，当他发觉自己的才能无处施展时，便愤慨极了。他说自己是杂草中的孤芳、群鸡中的凤凰。他极端蔑视邪恶势力，有许多诗是直接揭露腐败的统治阶级的。如《古风》五十一：

> “殷后[1]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2]满中野，菉葹[3]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虎口何婉娈[4]，女媭[5]空婵娟。彭咸[6]久沦没，此意与谁论。”

在这首诗里，诗人把后期的唐玄宗比作残暴昏庸的殷纣王和楚怀王，而且把整个社会都和殷纣楚怀时期相比，对昏庸的皇帝和依势的佞臣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

① “殷后”：纣王。

② “夷羊”：一种神兽。

③ “菉葹”：两种恶草，比喻奸臣。

④ “婉娈”：思慕貌。

⑤ “女媭”：相传是屈原的姐姐。“婵娟”是啴咺的假借字，即喘息之意。（屈原之姊劝屈原不听，所以说空叹息。）

⑥ 彭咸：殷朝贤大夫，谏君不听，投水而死。

李白对一些封建社会的旧传统观念也持怀疑和蔑视的态度。当时，孔夫子在一般知识分子心目中是最神圣的。李白有时却以孔子自比，甚至在高兴的时候，随便拿孔子开玩笑，并不把孔子看得高不可攀。在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是最受尊重的。李白却常常嘲笑那些白首死读经书的儒生，大胆提出“儒生不及游侠人”的观点。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参政都是通过科举，唐朝诗人绝大多数都赴京应考，李白始终没有去参加考试。他虽然热心政治活动，但从来不愿意卑躬屈膝，追求官职。李白对束缚人的礼教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他身上很少有历来读书人的那种迂腐、伪善。因此在许多士大夫心目中，李白简直是不可理解的。有人说他是“谪仙”，也有人说他是“狂士”。李白自己也感到和社会习俗冲突，自己不为社会所容，所以他也自称是“狂人”。

李白的诗歌还注意反映各阶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为人民鸣不平。在李白的诗歌中，人物形象非常多，其中却很少有达官贵人，绝大多数是村女、征人、宫女、弃妇、歌妓、卖酒的老叟等社会下层人民。李白很了解这些人，对他们具有真实的感情。在《丁都护歌》里，描写了纤夫的劳动场面：

>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系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这首诗是在长江下游写的。当地政府在山上采取大石，用拖船搬运，天旱水浅，千万个劳动者用力牵拉，也很难到达江边。但是监督的官员（都护）却限令极严，使劳动者无时喘息。李白想到这些石头使人民长期从事苦役，不禁感叹说：“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丁都护歌》是乐府旧曲，相传是“其声哀切”，李白用以歌咏新事，就更加悲恻感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对于劳动人民的态度和人道主义精神。

正因为李白同情人民群众，当他看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痛苦时，总是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反对非正义战争。他写了不少反对战争的诗，如《古风》第三十四首说：

> “羽檄[1]如流星，虎符[2]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3]，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4]，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催两无声。困兽当猛虎[5]，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6]，一使有苗平？”

这首诗写的是如下的一段史实：

天宝年间，杨国忠组织进攻南诏的战争，当时百姓不愿当兵，杨国忠派御史带着刑具分道抓丁。“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支军队不战而败，杨国忠反而掩藏败状，虚报战功。天宝十三载（754）六月，又出征云南，结果在西洱河全军覆没，20万人无一生还。从这首诗里不仅可以看出当时战争的紧急情况，同时更反映了人民被迫服役的惨痛情景。另一方面，诗里说：“三公运权衡”和“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从这几句可以看出李白对朝廷的讽刺和谴责，这是代表人民群众发出的正义呼声。

但是，李白并不是无原则反对一切战争的，他反对的是以人民的生命财产来满足统治阶级少数人的野心的那种非正义战争。当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渴望能消灭安禄山的叛军，而且反对唐玄宗的逃

---

① “羽檄”：征兵的文书。
② “虎符”：征调军队的文书。
③ “白日”：形容政治清明。“紫微”指朝廷。
④ “楚征兵”：南方发生战争。
⑤ “困兽”以后两句，形容怯懦的士卒与凶猛的敌人作战等于送死。
⑥ 干：盾牌；戚：大斧。

跑主义。后来他参加永王璘的队伍，写了不少抗战的诗。

李白还有许多诗歌，热情歌颂了祖国的美好河山。在李白的诗中，有浩浩荡荡的长江，有奔腾怒吼的黄河，有峥嵘的剑阁，有喷射百丈的瀑布，有恬静幽寂碧波荡漾的洞庭湖，有孤直的松柏，有清涟水面的芙蓉，有茫茫的柳絮，有摧崩百川的大鹏，有能使人垂泪的猿啼，有悲哀的杜鹃，有翻飞万里的苍鹰，有引人深思的月光，更有闪电雷鸣……所有这些，都为人民所喜爱，成为脍炙人口的杰作。李白笔下的大自然，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从李白的诗里，可以听到中国大自然的音响，可以看到中国山河的美丽图画。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他所塑造的形象上。在李白的诗里，我们往往感触到一种超越现实的艺术形象，这种形象是由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大力夸张创造出来的。夸张比喻的手法在李白诗中随处可见。例如：他极言侠客的重义，便写出“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捧土塞黄河”等名句；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诗人却写出“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以反衬战死者妻子悲恨的深重；要肯定文章的有力，则写“兴酣落笔摇五岳”；为了否定功名的价值，则写“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亦应西北流”；为了表现自己的才能，则写“为君谈笑静胡沙”；形容安禄山叛军势焰之盛，则写“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在这些诗句当中，李白用夸张比喻的手法，把两种轻重显然极不相称的事物对举起来，以突出显示所要表达的意义，因此它所体现的感情及所发出的感人力量特别强烈。毫无疑问，假如诗人没有不可抑遏的激情和异乎常人的想象力，这是不可能的。

李白诗篇另一个艺术特点，就是它的艺术形象所概括的生活现象具有极大的广阔性。他形象地抓住许多难于直接联系着的事物，构成一副完整的形象。例如《行路难》，诗人的笔从酒肴案前忽然跃到黄河、太行、碧溪，以至沧海。再如《将进酒》，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要及时行乐以消除胸中郁积的惆怅。为了强调要及时，首先指出人生时光之易逝而不可复返。但对这一概念，诗人并不是抽

象地叙述出来，而是以壮阔的自然界现象——黄河奔流的形象来比喻大量时光之如逝水，一去不复返，并把人生相当漫长的岁月转变缩短到朝暮之间，这样给人的时光消逝迅速之感便特别强烈。

李白的诗歌，是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在文学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南朝齐梁以来，颓废淫靡的形式主义文学曾经泛滥一时，宫体诗就是它的代表。初唐的文坛，仍然蒙受着这种恶劣的影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陈子昂在唐代第一个提出了鲜明的战斗主张，对这股形式主义的逆流进行了正面的抨击。他反对“采丽竞繁”，提倡“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这也就是要求文学家关心现实的重大课题，正视并反映现实，要求作品写得清新和刚健。陈子昂虽然在他的创作中贯彻了自己主张，然而他的作品却还存在着干枯板滞等特点。当然，要彻底清除这种影响，也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要取得全面胜利，还有待于后人的不懈努力。

李白继承了陈子昂的理论，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建安以后的形式主义文学，揭露了他们“绮丽不足珍”的实质，并且把恢复发扬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李白的诗就是他的理论和实践在创作上的光辉成就。过去陈子昂所没有做到的，李白做到了。陈子昂所没有完成的，李白完成了。陈子昂成为李白的先驱，李白继承和发展了陈子昂开始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李白的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李白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了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汉魏乐府中对社会生活规律的深入探索，两晋乐府中对幻想中美好世界的强烈追求，南朝乐府中人民的纯真的爱情，北朝乐府中的英雄气概和边塞景色，三调杂曲之类的豪唱狂歌，这一切，都对诗人具有深刻的影响，诗人通过自己的创作，熔炼成一个全新的风格。这是文学评论家一致承认的。

其次，李白对于汉魏以来乐府民歌遗产的继承，一方面忠实于

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他的创造性。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那些直接用乐府古题为题的诗篇，在同一题目之下，乐府古词的妙处，往往正因为李白的新词而更加鲜明。汉魏以来，诗人拟作的乐府很多，其中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的也不少，但是像李白这样的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却是空前未有的。文学史证明，正是这样高度创造性的继承，才能把乐府民歌中的优良传统真正发扬出来。

李白的诗不但对当时的文学界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以后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白和杜甫被后人推崇为“诗仙”、“诗圣”，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李白的诗由于被人们所喜爱，所以流行很广。如《静夜思》、《蜀道难》那样的诗更是家喻户晓。他的诗中那鲜明的个性，豪放的气魄，朴素的形式，浪漫主义的格调，是千秋万代也不会泯灭的，会永远在诗坛闪耀着奇光异彩。在李白以后的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他的诗仍然影响和哺育一代代诗人，甚至到了近代，我们仍然可以从龚自珍等人的诗中看到李白的影响。

九、一代诗史

——伟大的诗人杜甫

杜甫字子美，唐睿宗先天元年（712），生于河南巩县，死于大历五年（770），终年59岁。他的祖先是中下级官员，并有文学传统。杜甫十四五岁学习作诗，20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开始他的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735），参加进士考试，不幸落第。第二年，开始他的第二次漫游，这次是游历齐赵（今山东河北一部分）。

开元二十九年（741），他又回到洛阳，大约三年以后，会见了大诗人李白，他们和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两年以后，在鲁郡和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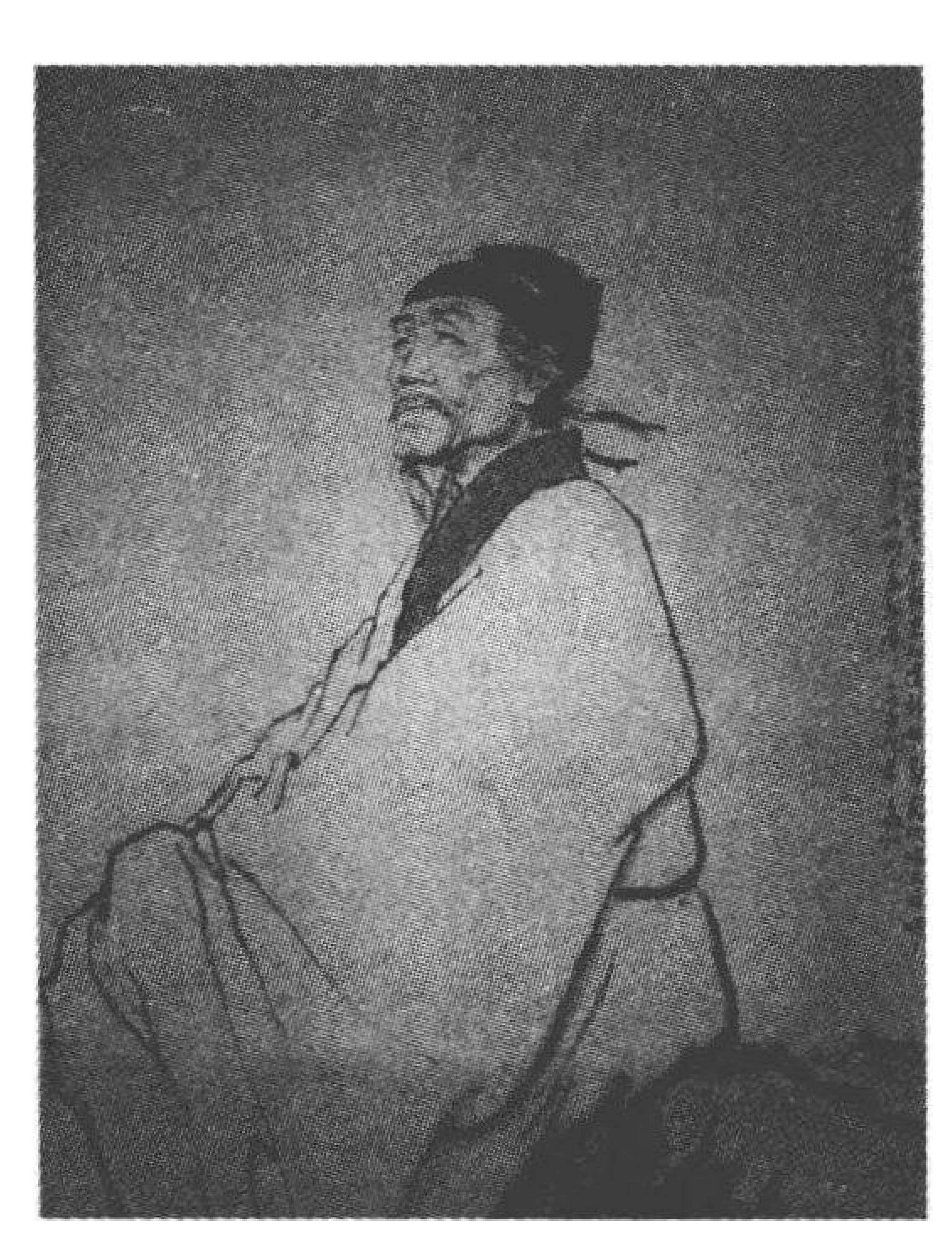
白分手以后，便结束了他的游历生活。

杜甫多年的游历生活，接触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游览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增加了他的感性知识，使他更加热爱祖国了。

天宝五载（746），35 岁的杜甫来到首都长安。杜甫到达长安的目的是为了做官，但由于李林甫、杨国忠专权，他们需要的不是贤才，而是奴才，因此杜甫便无官可做。

唐朝人特别重视诗歌。当时知识分子除了参加科举以外，向达官贵人投诗，也是谋求官职的一条途径。“投诗”求官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杜甫在应诏失败以后，也曾向公卿“投诗”。如“赠翰林张学士”、“赠起居舍人”、“上韦左相”等，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天宝十二载（753），还曾两次向皇帝献赋，虽然博得“词感帝王尊”的虚名，但却得不到一官半职。

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唐政府才任命他为河西尉。因为县尉是直接敲榨人民的，所以杜甫坚决拒绝了这一官职。统治者又改派他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是个管理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小官。官位虽低，总比鞭打人民的县尉要好，因此他准备就职。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安史之乱爆发了。诗人这时的生活非常困难。在长安，他住在东郊杜陵附近的少陵，过着乞丐式的生活，他的幼子就是在这年饿死的。饥寒交迫，再加上病魔缠绕，杜甫的生活和十年以前相比，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了。


杜　甫

不久长安沦陷。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险从小路逃出长安，到了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凤翔。肃宗让他做了左拾遗，这是一个向皇帝提意见的谏官。由于诗人好批评朝政，在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管理地方的祭祀、学校选举等工作。他离开中央政府以后，

在去华州的路上，得到深入民间的机会。有名的“三吏”、“三别”，就是他从洛阳回华州路上所看到的广大人民惨痛生活的写真。

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弃官不作。这年冬天，他到了成都。他的朋友严武镇蜀，保荐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和节度使参谋。后来，严武死了，杜甫不得不离开他的草堂，流浪到嘉州、渝州、忠州、江陵等地，大历五年（770）死在潭州到岳阳的船上。

杜甫的一生，是苦难的也是光荣的。正是他这种苦难的生活，才逐渐改变杜甫的阶级感情，滋长了他对统治阶级的憎恨。生活增强了杜甫诗的感染力，使他的作品饱含着血泪辛酸，同时丰富了他的语言，写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非常高的作品。

杜甫的诗流传到今天的有 1 400 多首，他的诗是历史的镜子，比较全面深刻反映唐朝的社会现实，几乎照见了每一个角落。他的诗作被誉为是穷天地民物之变，历兵火治乱之迹的“诗史”。杜甫不但了解人民的疾苦，而且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唐中叶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多少人牺牲了生命，多少家庭的和平生活遭到破坏。例如在《无家别》里，使我们看到一幅家破人亡悲惨凄凉的景象：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
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1]因阵败，归来寻旧蹊[2]。久行见空巷，
日瘦[3]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
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① “贱子”：老兵自称。
② “旧蹊”：旧路，就是他的家乡旧里。
③ “日瘦”：日色无光。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①]。虽从本州役，
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②]。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③]。永痛长病母，
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④]，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在杜甫的诗里不仅看见人民的苦难，而且可以看出劳动人民恢复生产的善良愿望。例如《往在》说：“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月。”《蚕谷》说：“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昼梦》说：“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甫提出的这些要求，是当时人民群众最低的和最迫切的愿望。

另一方面，在杜甫的诗里，又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尖锐地讽刺他们的骄奢淫逸，有力地抨击了昏庸无能的政治。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道：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⑤]。蚩尤[⑥]塞寒空，
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⑦]，羽林相摩戛[⑧]。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⑨]。赐浴皆长缨[⑩]，

① “鼓鞞”：同鼙，骑鼓。
② “终转迷”：迷路不辨方向。
③ “齐”：相同。根本没有家，去远去近都一样。
④ “两酸嘶”：母子二人终身挨着痛楚。
⑤ 嵽嵲：山高峻貌。
⑥ 蚩尤：传说蚩尤与黄帝作战，兴大雾。这里作大雾讲。
⑦ 郁律：形容暖气蒸腾。
⑧ 摩戛：卫队多兵仗相摩擦。
⑨ 胶葛：广大貌。
⑩ 长缨：缨，帽带，指贵族和大臣们。

与宴非短褐。彤庭[1]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2]恩，
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3]。况闻内金盘[4]，
尽在卫霍室[5]，中堂有神仙[6]，烟雾蒙玉质。
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7]。劝客驼蹄羹，
霜橙压香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8]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首诗反映天宝末年的社会已面临严重危机，而最高统治者却在骊山歌舞欢乐。这种情况使诗人无比愤慨，站在人民立场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诗中无情地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度和穷奢极欲，使百姓无法生存。他以愤怒的心情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鲜明地指出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杜甫已经理解到统治者的荒淫生活是建筑在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之上的，这一点比起仅仅反对统治者的腐化要深刻得多。杜甫已经初步认识社会的本质问题，而且自觉地起来为人民鸣不平。从这里可以看出，杜诗的思想已经达到时代的高峰。

我们从诗人的作品中，看到他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出色地塑造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这里面有老人、妇女、男女青年、儿童、士兵、船夫等，他们都是当时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例如《石壕吏》说：

---

① 彤庭：朝廷。
② 筐篚：竹器，古礼，皇帝宴会用此盛帛赐群臣。
③ 仁者宜战栗：有良心者应知有所警惕。
④ 内金盘：宫内金盘。
⑤ 卫霍室：卫青、霍去病是汉武帝的外戚，借指杨国忠等兄弟姊妹们。
⑥ 神仙：指贵妃姊妹们。
⑦ 悲管逐清瑟：丝竹合奏。
⑧ 荣枯：荣指朱门，枯指冻死骨，强烈的对比。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
老妇出看门。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
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①！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
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②，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
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从诗里可以看出，战争夺去这两位老人的3个儿子，破坏了他们的家庭，贫困得使儿媳"出入无完裙"。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封建官吏深夜又来"捉人"。老媪为了让自己的孙子有人哺乳，为了不叫老翁送死，她勇敢地挺身而出，来担当临头的灾难。



杜甫草堂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杜甫塑造这几个人物时，不但写出其鲜明的个性，而且体现了这个时代给人物打上的烙印。就写作方法而言，从杜甫的整个情况考察，具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杜甫对唐朝社会有深刻的认识，他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他善于选择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人物作题材，善于把忧国忧民的感

① "长已矣"：感叹词。永远完了。

② 到河阳兵营中去服役。河阳在今河南孟县。

情集中在一个画面上，通过人物的各种活动体现出来。其次，杜甫善于用生动形象的细节描写。例如《石壕吏》中最后两句："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写的是深夜诗人听到哭泣声。这样一个细节，在诗里具有很大作用。它告诉读者，这一家老少在为老妇被抓走而整夜哭泣，同时说明诗人自己也一夜未合眼。这些细节的描写，大大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使读者如身临其境。第三，杜甫的很多诗是以叙事为主，结合抒情，客观的描写和鲜明的倾向性相结合。例如《新安吏》是把抒情、叙事、写景的手法融合为一体的典型。至于《石壕吏》，表面虽然是客观叙述，但作者却把自己对人民的同情完全渗透在字里行间。也有的诗，在叙述之余，诗人常加上一两句抒情，使诗中的思想内容更加深刻，如《北征》和《垂老别》等。

杜甫的另一成就是大量选用口语入诗，丰富了诗的语言，加强了诗的表现力，使诗歌更接近人民群众，更容易感染读者。在南朝时期，诗和口语几乎绝缘，李白开始把口语吸收入诗，但是运用口语最多的却是杜甫。例如在杜诗中不写"食"，而写"吃"；不写"餐餐"，而写"顿顿"；不写"父母"，而写"爷娘"；不写"高呼"，而写"大叫"。这类口头语言在杜诗中是不胜枚举的。从诗的发展看，杜甫大量使用口语，不能不说是诗学一大革新，同时也是诗歌一次解放。

杜甫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他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并推动唐朝后期现实主义的创作，使现实主义倾向在此后的诗歌里取得了支配地位。大家知道，现实主义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必须指出：杜甫以前的诗歌，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主要存在于人民口头创作上，如《诗经》、《汉乐府》等，当时只有极少数文学家继承这种精神。但是，在文学史上，有意识地发扬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创作里，影响到后代的，不能不归功于杜甫。第一个学习杜甫并指出杜甫这种带有划时代意义功绩的是白居易。他明确指出：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觑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寒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诗如此，况不追者乎！仆尝痛诗道破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①

这是大诗人白居易对杜甫的崇高评价，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杜甫对白居易的创作有巨大影响。特别是他的《秦中吟》和《新乐府》50首，从诗的传统讲，都是在杜诗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不仅如此，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影响宋元以后各代文学。



杜牧《张好好诗》

其次，在艺术创作方面，杜甫的影响也非常突出。从诗的章法、句法、字法、韵法以及诗的体裁方面看，杜甫在文学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他创造了因

①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事名题的方法，为后代诗人创作现实主义的诗歌广开了方便之门。原来在唐朝以前的诗，一贯流行“拟古”的风气。一般作者都利用“汉乐府”的旧题来描写时事，有的则是专咏古题，例如借用“乌生”来咏乌，借用“鸡鸣曲”来咏鸡。这种文不对题的怪现象，由于掩盖了诗的现实性，从而使读者捉摸不定，不知道作者是咏时事还是咏古事或咏古题。这种矛盾现象，从三国直到唐代中叶，一直存在着，没有得到解决。例如李白对玄宗进攻吐蕃的战争虽然写过讽刺诗，但是他却借古老的“汉乐府”旧题，如《战城南》、《关山月》之类。这样做就不免掩盖了诗的活生生的现实内容，削弱了诗的战斗力。到了杜甫，他创造性的解决了这一矛盾，使诗的内容和标题完全一致。他创造诗的新题，例如他反对当时的穷兵黩武，使用了《兵车行》的标题，而不用《战城南》的标题。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奢侈；使用《丽人行》的标题，而不用《长安有狭邪行》之类。这样一来，使读者面目一新。

十、人民的诗人白居易

继李白、杜甫之后，唐朝另一个伟大的人民诗人是白居易。他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在诗歌创作上达到了新高峰。

白居易（772—846），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唐德宗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五年以后当了周至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县尉是封建王朝的下级官员，在这个岗位上，一方面对上级官员要奔走逢迎，另一方面对其属下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这样的官场生活，白居易当然是不乐于久居的。但是在那近两年的县尉生活里，他却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白居易由于亲眼看到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丰富了他诗歌的创作源泉。从这时起，白居易写出不少名篇。元和二年（807）冬天，他被调到长安，又经过一次考试，当了翰林学士。元和三年任左拾遗，他除了写一般的启奏外，更有意识地以诗歌来

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这些诗里，他尖锐地揭露了贵族官僚的巧取豪夺，以及他们的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他的诗歌在当时就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使达官显贵们大为不满。不久，便遭受一连串的排斥和打击。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是白居易的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他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改革政治的主张，但是，他再也没有青年时代那种锐气了。长庆二年（822），出任杭州刺史，这是诗人多年的夙愿，所以他非常高兴。他得到任命以后，急忙整顿行装，十月初便到达目的地。到杭州后，本着“勤恤人庶，下苏凋瘵”的精神，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动手。当时杭州人民最大的困难就是饮水问题。李泌在杭州时，曾开凿六口井，白居易“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新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又组织力量增设湖堤，加高数尺，以蓄水灌田，从此濒湖十万多亩土地解除了旱涝的威胁，使杭州人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他在杭州三年，于长庆四年转任苏州刺史。在苏州两年多，后又担任刑部侍郎、河南尹。会昌六年（846）八月卒，终年75岁。

白居易的晚年生活陷于“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是从贬谪于江州开始的，当时他察觉通过皇帝实现“兼济天下”之志是不可能的。良心促使他对人民的苦难又不能熟视无睹，所以只能在个人职权范围内替人民做点好事。诗人在忠州、杭州、苏州任职期间，程度不同地为人民解除了一些痛苦。从苏州“病免郡事”以后，他发现牛李党争日益激烈，看出政治改革更难了，便决定走“独善其身”的道路。在当时恶劣的环境里，他不向权贵低头，不为党争所累，保持了人间的正义和自身的高洁，这种精神是高尚的。

元和二年（806），白居易写出几首名篇，其中有《观刈麦》和《宿紫阁北村》二首。他在《观刈麦》一诗中写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

妇姑荷箪食，[1] 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岗。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2]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这首诗反映农民在炎夏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情景。看！一个劳动着的农民，顶着烈日，在拼命地干着。他忘记了疲劳，忘记了炎热，只知道珍惜夏日白天时间长！在他旁边有一个贫妇人，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破筐，艰难地拾地上丢掉的麦穗。因为她家里剩下的麦子，已经拿去交税，现在为了活命，只能靠拾一点麦穗度日。诗的最后一段，诗人把农民的饥饿生活和自己的优裕生活作了对比而感到不安，并谴责自己。正因为这样，所以诗人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群众的距离缩短了。从而使诗人的创作，逐渐走向新天地。

在元和三年以后的几年里，诗人白居易写了《秦中吟》和《新乐府》，充满了战斗激情，现在列举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介绍一下。

在《卖炭翁》里，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手工业者的悲惨遭遇，诗人写道：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3]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4]，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5]。一车炭，千

---

① 箪食：盛饭的竹器。
② 岁晏：年终。
③ 南山：终南山，在长安之南。
④ 黄衣句：唐朝宦官品级高的穿黄衣，低的穿白衣。
⑤ 回车句：长安东西两市都在城的南部，皇宫在北部，所以把车牵向北走。

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①，系向牛头充炭直。”

唐朝后期的宫市，实际是以给皇帝购买生活必需品为名，公开掠夺长安工商业者的财物。白居易借着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大胆地揭露了这种强盗制度。诗人首先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形象地描写了一个卖炭老人的外貌，然后指出“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老人就靠这一车炭维持生活。这可怜的老人，“身上衣裳单”，又加上“夜来城外一尺雪”，因此他是不会不希望天气能暖和一些的。但是，他为生活所迫，却“心忧炭贱愿天寒”，希望天再冷一些，希望炭价再高一点。这个反映卖炭翁内心矛盾的细节刻画，更加突出地写出了那时劳动人民的悲苦，深刻揭露那个社会的罪恶本质。叫人愤怒的还不止于此，这车炭却被宦官及其随从白白地抢走了，换来的只是不值多少钱的“半匹红纱一丈绫”，这是多么残酷的暴行呵！

诗人在这里无情地揭露了人民和统治集团尖锐的矛盾，白居易的爱憎感情，表示得多么鲜明！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群众越来越近了。

白居易的作品，不仅通过个别历史现象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生活，而且还能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戳穿唐朝后期阻碍历史发展的主要症结，进行控诉和批判。他在《重赋》一诗中写道：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②，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

① 唐朝的绢布代替货币使用，所以宦官用一丈绫半匹绢作一车炭的代价。
② 防其淫：防其滥增税。

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①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②，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

白居易的诗不仅有很高的思想性，而且有很高的艺术性。他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了无数典型形象。白居易的现实主义创作是自觉的，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他力求高度地概括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选取最典型的事件人物，运用一系列方法来创造多种典型形象，全面地反映社会本质。

另一方面，诗人善于利用细节刻划，用对比抒情和叙事相结合等一系列艺术手法来塑造典型形象，使之鲜明突出。他无论写一个人物和一件事，都能感动读者，痛苦的令人流泪，愤怒的令人发指。读了白居易的诗，使我们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从白居易的全部作品看来，他的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流畅，但同时又是经过千锤百炼，作了大量的艺术加工。

正因为白居易诗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以他的诗歌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白居易的诗在唐朝就被广大群众所喜爱。他对元稹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儒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

---

① 羡余：当时地方大官如节度使、刺史额外搜刮民财贡献皇帝以求宠，美其名曰："羡余"，意即赋税的盈余。

② 琼林库：皇帝个人私藏贮之处。

咏仆诗者。”不仅如此，他的诗还被“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氏长庆集》序）。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民百姓，雅俗共赏，至于乐工歌伎，则更相競习，所以元稹感慨地说：“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白氏长庆集》序）。特别是他的《长恨歌》和《琵琶行》，更是被很多人传诵。一个诗人的作品能这样密切地和人民的生活联系一起，是古典文学中所没有的事。

白居易的讽喻诗，对后代的影响最深远，唐后期的张籍、王建、元稹、李绅等，围绕白居易形成一个以新乐府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诗歌高潮。到了晚唐，皮日休等现实主义诗人，就是受白居易的理论和创作的深刻影响，写出了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诗篇，给诗歌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唐朝新乐府的精神和艺术风格，被历代进步作家广泛地学习模仿，用以指责当代的政治弊病，反映人民疾苦，并且和单纯追求辞藻格律的形式主义艺术流弊进行尖锐的斗争。宋朝的王禹偁、陆游等人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受其影响。王禹偁自己说：“本与乐天为后进”。除了著名作家以外，历代学习白居易的人还有很多。

白居易诗在国外也广泛流传。李商隐说：“姓名过海流入鸡林、日南有文字国。”日本、新罗诸国也家有传写。日本的嵯峨天皇曾经抄写许多白居易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可见当时白居易诗已经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不少外国读者通过白居易的诗，和中国人民结成了文字因缘，促进了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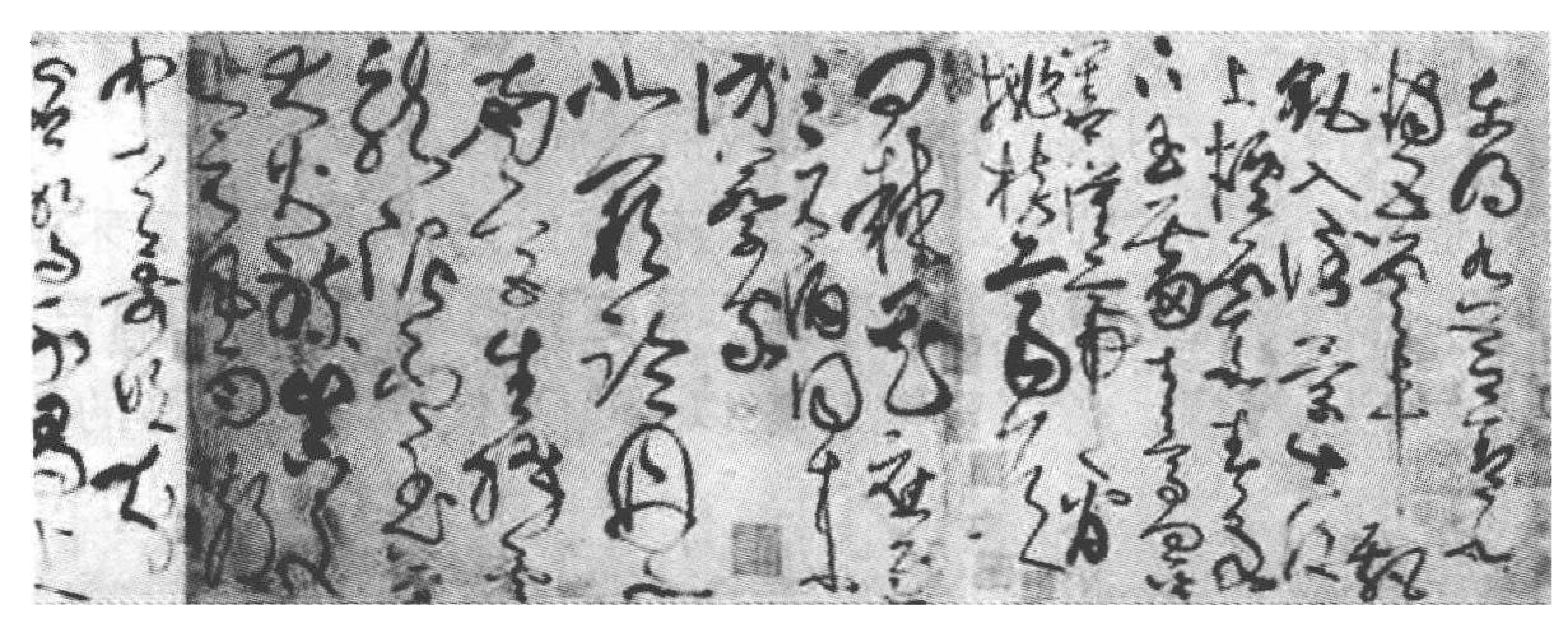
十一、韩愈、柳宗元领导下的古文运动

古文是与骈文对立的概念，其特点是散行单句，不拘形式，不像骈文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在文体上恢复了先秦两汉的传统，因此叫做古文。

骈俪文是六朝的产物，六朝时期，士族门阀专政，他们生活空

虚，写文章只能在骈辞俪句上争妍斗丽。到了北朝末期，颜之推、苏绰等人就反对骈文，主张文体改革。到了唐初，反对骈文者越来越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前面已提到过的陈子昂。他认为，改变文章的内容，必须配合适当的形式。他根据自己的主张，写了很多散文，对文体改革作出了贡献。陈子昂以后，有些学者写文章以五经为本，文体为之一变，开始了散文（古文）运动。其中著名者有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他们继承了陈子昂的精神，开启了古文运动的先河。

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韩愈和柳宗元。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人。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曾任刺史、吏部侍郎等官职。安史之乱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藩镇割



张旭的草书

据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央政令无法贯彻。同时佛教道教势力猖獗，破坏国家税收，威胁李唐王朝的统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中有些知识分子看到了这种政治危机，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王朝，因此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思想正统的统治地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是主要代表人物，企图以儒学来取代佛道的宗教。韩愈认为，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了动摇，就是破坏了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封建道德的准则。这种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就意味着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的走向崩溃。韩愈为了挽救这种危局，所以才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家道统，反对佛老。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伴随着社会政治

运动而产生的。因为韩愈等人要宣传自己在政治上的一套主张，宣扬儒家思想。当时的骈俪文已经成了自由表达思想的桎梏，文章内容要求突破那种旧形式的束缚，因此他们便不得不以借助"古文"为名，开展一个反对骈俪文的文体改革运动。韩愈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这个"道"就是儒家思想，韩愈原来是要从古人之"辞"以求古人之"道"。

韩愈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一方面反对骊体文，极力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体，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来建立新型古文的标准。他准备创造一种融化古人词汇语法而又适合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学语言，同时力求用这种新颖的文学语言，创造一种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形式，这就是韩愈文体改革的主要内容。

韩愈不仅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而且也是杰出的古文学家。他把新型古文广泛地用于政论、书启、赠序、杂说、碑铭等各种体裁，创造出很多优秀作品。

韩愈的政论有《原道》、《原性》、《原毁》、《争臣论》、《谏迎佛骨表》等，都是散文名篇。这类作品内容虽然宣扬儒家思想，有不少糟粕，但文中坚决反对佛道，反对寺院地主，客观上具有进步意义。唐代佛教、道教恶性发展，僧侣具有免税免役特权，因此买"度牒"以投靠寺院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上大批人奉事佛道，不仅浪费了人力财力，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而且他们应纳的赋税，全部转嫁给一般人民，当然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因此韩愈的反佛论文，是打击寺院地主的战斗武器，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意义。

在韩愈的散文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杂文。他运用这种文学形式对社会许多不合理现象进行了大胆辛辣的嘲讽，内容犀利，形式活泼，短小精悍，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杂说》第四写道：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里韩愈是用伯乐与千里马比喻贤臣难遇明主，而抒其不平之气。文章具有逼人的气势，通畅的文辞，精炼简洁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是他的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散文代表作。

在《杂说》里，还有《说龙篇》、《说马篇》、《获麟篇》等，是借助龙、马、麟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穷愁落寞的情怀。寓意委曲深致，构思精巧缜密，对后世散文产生了很大影响。

韩愈的某些祭文和序文，如《祭十二郎文》、《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里面具有诗一般的语言，形象的描写手法，把抒情、叙事、议论冶于一炉，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祭十二郎文》，抒写了对亡侄的沉痛感情，曲折真挚，感人肺腑，被后代人誉为祭文中的千古绝调。《送李愿归盘谷序》，鄙视当时声威显赫的官僚，嘲笑追逐势力的官迷，赞美品行高洁的读书人。文中语调铿锵，情绪激昂，气势充沛。韩愈写道：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作者仅用廖廖几笔，写尽了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僚向上爬的可怜

可鄙的丑态。

古文运动另一健将是柳宗元（773—819），他是河东人，贞元九年（793）进士。曾任县尉、监察御史、员外郎、刺史等职。由于参与王叔文的政治革新，被大宦官迫害，贬为永州司马。他在永州生活了10年之久，后调任柳州刺史。这两个地方都是边远地区，荒僻贫困。柳宗元在这样的生活磨炼中，并不妥协屈服，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其优秀品质，怀着郁愤，孤独地死在柳州，仅仅活了47岁。

元和元年（806），柳宗元离开首都以后，以文章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竭力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明道”，所谓“明道”就是宣扬正确的思想或主张。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通过辞藻形式来表达，而辞藻形式又要服务于思想内容。文章如果单纯讲求形式，只追求辞藻的华丽，是不可能具有生命力的。但是，在柳宗元以前，社会上流行着骈体文，他坚决反对这种文体。柳宗元以“明道”为己任，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褒贬”和“讽喻”，写文章就是为了对美好的事物进行歌颂、宣扬，对丑恶的东西加以批判讽刺，从而赋予他的“明道”主张以具体的内容。这在客观上不仅反对了文学中的形式主义、繁琐主义，而且进一步明确了文学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文学和社会政治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在封建社会，《五经》是社会公认的经典著作，是学习的典范。柳宗元认为，要写好文章，必须以《诗》、《书》、《礼》、《春秋》、《易》为本，并参考《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史记》等书，以吸收融合它们的各种优点。

柳宗元不仅宣扬古代散文，而且写出了大量优秀作品。在他的文集里，保存着很多论文，阐发了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并通过对社会现象和历史事实的剖析，谴责一切不合理的事物，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如《六逆论》一文，深刻地分析了现实社会的贵贱问题，揭露了“视其贱者而贱之，贵者而贵之”的世俗观点，反映了社会矛盾。在《封建论》中，一方面指出分封制的产生在于

“势”，并不是天意或圣人之意，肯定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作者解剖了分封制度，批判了“继世而理”的世袭世禄制度造成“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畸形状态。柳宗元利用《封建论》借古喻今，斥责豪门地主对政权的垄断，并有力地抨击了藩镇割据。柳宗元这些散文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这是柳文主要成就之一。

古文运动是直接继承先秦两汉优秀散文传统的，柳宗元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传统。他的讽刺散文，把先秦诸子散文仅作设譬之用的寓言片断，发展成完整的更富于文学意味的短篇，使寓言取得一种独立的文学地位。不仅如此，柳宗元还在寓言中带进更为深厚的现实内容，使之能成为具有战斗特色的讽刺文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戒》，文中借驴、麋、鼠三种动物的故事来讽刺那些或位宠而骄或盲目自大的得意忘形之徒，并指出他们自取灭亡的下场。《黔之驴》写道：

> 黔之驴。有好事者船载而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
>
>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
> 噫！形之龙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这类寓言时常概括了一种普遍的生活真理，其讽刺对象是比较广泛的。但这些徒有其表、虚张声势的“庞然大物”，在统治集团中却是大量存在的。因此，这种寓言无疑是刺向整个官僚集团一把锋利的匕首。

柳宗元另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是《捕蛇者说》，作者在这500字的短文中，深刻揭露出赋役之毒甚于毒蛇的真相，具体地描写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苦，暴露封建剥削的残酷性。蒋家祖孙三代都以捕蛇为业，以毒蛇交税，以致："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但是当柳宗元表示代他请求官府废除这种以蛇交税的办法时，捕蛇者竟"大戚"至于"汪然出涕"，说："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税不幸之甚也。"作者以层层逼近的手法，明确点出主题，指出封建赋役对于人民比毒蛇更毒更苦，人民宁愿冒生命危险去捕蛇，却不愿当政府的纳税户，说明"苛政猛于虎"。作者在字里行间透露了对劳动人民的真挚同情，并天真地希望"观人风者"能有所醒悟，减轻人民负担，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柳宗元在传记文学方面也有很高成就，他写了不少市民和劳动者的传记，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倾注了作者强烈的爱憎，为人民发出不平的呼声。如《童区寄传》反映边区的人口买卖和劳动者的反抗精神；《种树郭橐驼传》以树为喻，反对奴役和压迫剥削人民；《段太尉逸事状》，反映军阀的残暴横行，以及人民被迫害被杀戮的命运，同时歌颂了不避艰险爱护人民的段太尉的英雄形象。

韩愈柳宗元领导下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散文发展的转折点。形式主义的骈体文，经过唐朝韩柳领导的古文（散文）运动打击以后，开始走上了衰亡的道路，他们把文体从骈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活泼流畅的散文送入艺术之宫，扭转了300年的文风。

十二、传奇小说

我国古代小说"至唐代为之一变"，这就是说，唐人已经有意识地把小说作为独立的文学形式进行创作，这种小说在文学史上，通称"传奇"。小说在唐代达到成熟阶段主要是由三个因素促成的：首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扩大了题材，促

进了小说的创作。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城市的兴盛和人口激增。首都长安，人口百万，是世界最大的都市。扬州、成都、洛阳、广州等地，也是闻名全国的大都市。大城市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除了有贵族官僚以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商人、手工业者和从事各种行业的市民，知识分子也活跃于城市以谋取官职。当时人们的社会活动范围更加广泛，社会生活的内容更加复杂。封建文人和市民生活的接触比较密切，见闻比较丰富。他们不满足只用散文诗歌去表现自己的思想生活，希望扩大题材，创造出反映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因此，当时便出现了大量小说。

其次，唐代的古文运动，改革了骈俪文体，丰富提高了散文技巧。因为小说要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需要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能力，古文运动恰好在这方面为它创造了适当的条件。因为古文运动的发展是在中唐以后，而当时正好是小说繁荣时期。从当时水平较高的传奇作品，便可以看出古文运动的影响。

另一方面，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社会上出现一种新风俗，就是“行卷”和“温卷”。当时应试的文人为了获得主考官的赏识，往往在考前送上自己的文章，叫做“行卷”，以后再送叫做“温卷”。在“行卷”和“温卷”时，经常利用小说。因为小说“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这种风气的盛行，能反过来刺激小说的发展。另外，佛道思想的盛行，佛经中的故事，也给传奇小说很大的启发。

唐朝小说流传到现在的不下数百篇，其中著名的专集有四十余种。

第一类是讽喻小说，作者是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以达到讽喻的目的。例如沈既济的《枕中记》，刻画了卢生的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原来卢生是一个“尝志于学，富于游艺”，却在政治上失意的青年。卢生在做梦以前所追求的理想，是“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他在邯郸旅店中遇见了道士吕翁，吕翁给他一个枕头，他在枕上入睡，当时主人正在煮黄粱饭。卢生在梦里先

娶了名门崔氏女为妻，接着考中了进士，当官以后又建立战功，最后当上宰相，封燕国公。前后取得赐田、甲第、名马不可胜数。他的五个儿子都是朝官，卢生年逾八十，可谓“富贵寿考”了。他极享富贵荣华以后老死。这样，卢生在梦里满足了他在现实中所无法达到的愿望。卢生这个形象完全是当时文人追求荣华富贵声色享乐的典型。

作者在表现梦幻时，其特征是时间短促。卢生入梦时，主人正在做饭，他在梦中度过50多年，醒来时，“主人蒸黍未熟”，蒸一顿黄粱饭最多不过一小时。小说作者用几十分钟时间来映衬几十年的光阴，集中概括地描写了卢生最重要的生活环节，这就更加显示了作者的观点：人间的荣华富贵，不过如梦境一样，刹那而尽。这篇小说对那些热衷于功名富贵的封建文人来说，无疑是极其辛辣的讽刺。

第二类是侠义小说，是描写一些身怀绝技，具有神出鬼没的超人武艺的剑侠英雄人物。其中以袁郊的《红线传》和裴铏的《聂隐娘》最有代表性。《红线传》产生在至德二载（757）以后，当时唐政府命令安禄山手下的降将潞州节度使薛嵩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互为姻娅，以为羁縻之计，不料田承嗣借养病为由，想吞并潞州，意思是要发动战争，这是当时藩镇为了扩大地盘经常发生的事。但是，人民群众却反对这种兼并战争，他们希望能有除暴安良的侠士出来消灭战争，《红线传》里那个侠女的形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

第三类是爱情小说。如白行简的《李娃传》，描写士族子弟和妓女恋爱的故事。在小说里，作者生动地表现出李娃的忠于爱情和舍己为人的精神，同时也批判了门阀制度对爱情的破坏，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第四类是历史政治小说，例如陈鸿的《东城父老传》，通过斗鸡者贾昌父老的经历评论唐玄宗前后期的政治得失。玄宗前期实行政治改革，从而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这就是小说主人公所津津乐道的开元盛世。天宝以后，由于唐玄宗纵情声色，生活腐化，奸

相李林甫、杨国忠当权，朝政败坏，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小说的主人公是开元天宝四十年历史的见证人，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情况。

皇甫枚的《三水小牍》中有一篇小说，题目叫《张直方》，形象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藩镇割据势力的专横残暴。独霸一方的节度使张直方，整天酗酒，任意杀戮奴仆，无恶不作。他的党徒王知古，一天夜间误入狐仙之宅，老狐仙原来想把狐女嫁给他，但当狐仙听说他是军阀张直方的同伙时，惊恐万状，连忙把他撵出去。作者对横行霸道的节度使，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并通过狐仙退婚，表现了人民对军阀的憎恨。

第五类是神话故事，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写落第书生柳毅，在去泾阳访友的途中，遇到受夫家虐待的洞庭龙女。他为了解除龙女的苦难，热情地为她到洞庭湖送信。龙女的叔父钱塘君得信以后，很快飞到泾阳，吃掉龙女的丈夫，救回龙女。钱塘君为了感谢他，威胁他和龙女结婚，柳毅为人光明磊落，坚决反对。他说："我送信是为了救人，并无个人打算，假若和龙女结婚，就使自己成为'杀其婿而纳其妻'的不义之人。"龙女听了，对他十分敬佩。后来洞庭君准备把龙女嫁给别人，龙女坚决不从。经过几番周折，龙女终于主动嫁给柳毅。小说使虐待龙女的泾阳君一家受到惩罚，让龙女自己择婿，宣扬了妇女婚姻自主，并对传统的封建思想作出有力的挑战。

唐朝传奇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的一大跃进。小说作者是有意识地进行创作，他们不仅对现实生活作了比较深入和细致的描绘，而且在语言、结构、情节和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是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每个人物都具有独特的个性。例如李娃和霍小玉同是妓女，但李娃的生活经验丰富，老于人情世故，她虽然爱慕郑生，但不为感情所左右。最初她把郑生当普通嫖客看待，后来决定与郑生结婚，为郑生的前途谋划，处处表现胸有成竹。霍小玉却是另外一种性格。她感情热烈，尽管知道由于社会地位悬殊不能与李益结合，但她不像李娃那

样深谋远虑，只知执著而又单纯地把全部希望都倾注在李益身上。李娃注重实际，霍小玉却偏重理想。唐朝小说里出现了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当时的小说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

唐朝小说另一特点是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赋予仙、鬼、物、怪以人格化的智勇双全和柔情侠骨，塑造一批理想的英雄形象。在爱情婚姻方面，这些英雄个性解放，大胆地自由选择她们所爱的对象，体现了作者对于婚姻自由的向往，勇敢地冲击着封建门阀制度。因此，在传奇小说作者的笔下，天上地下无所不达，既没有空间时间的限制，死生也不能把恋人隔离。南柯的梦境，具有神奇绝技的剑侠，离魂私奔的情女，死者再生，婚姻再世，仙女下凡，鬼魂不灭，狐魅有情等艺术构思，构成这些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

唐朝传奇小说对后世文学影响甚大，它把我国小说从记述神怪的狭小天地，引向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歌颂伟大理想的广阔道路。唐朝小说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对五代以后的小说戏剧，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龙女和霍小玉争取婚姻自主的反抗精神，成了后世小说、戏剧反复表现的主题。

其次，唐朝小说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广泛的题材，元朝王实甫的《西厢记》，渊源于元稹的《莺莺传》。高文秀的《郑元和风雪打瓦罐》和明朝的《绣襦记》，都取材于《李娃传》。清朝洪升的《长生殿》，取材于唐人的《长恨歌传》。至于“三言”“二拍”及《聊斋志异》等书，受唐朝小说的影响更是明显，这里就不赘言了。

十三、变文和词

唐代的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什么叫变文呢？原来，和尚在讲经说法时，为了吸引听众，便把佛经里的故事通俗地讲唱出来。讲唱人一面说一面唱，一面加表演动作。讲唱依据话本，话本的文体是散文和韵文相参。这种话本就叫变文。

这种变文从听讲的对象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叫俗讲，听讲的对象是未出家的人；一种叫“僧讲”，听讲的对象是出家人。由于听讲的对象不同，所以“俗讲”就更通俗，而且不断有所更新，以讲唱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

就内容而言，唐代的变文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演绎佛教故事的，如《维摩经变文》、《降魔变文》、《破魔变文》等；另一种是演绎非佛教故事的。这一种包括中国古代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人物传记等。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就属于这一类。

到了唐代中期和晚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变文也风行于世。

变文对唐以后的文学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影响，宋元以后的平话、词话、白话小说、弹词等都和唐代变文有些关系。

这样一种重要的民间文学，从前很少记载。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两万多卷藏书，其中就有很多变文抄本和少量刻本。近人把这些变文编为《敦煌变文集》（上、下），对研究这些俗讲文学很有帮助。

唐朝通俗文学的另一种文体是民间词，主要是敦煌曲子词。词就是配合曲调来唱的一种诗体，也就是歌词。当时流行很多乐曲，如《菩萨蛮》、《哀江南》、《念奴娇》等等，因为乐曲的调不同，唱词的句数和每句的字数，以及用韵的位置、字声的平仄都具有不同格式。和律诗相比，词的基本特点就是长短句相参。

唐朝的词产生于初唐或盛唐，它是从民间词发展演变来的。敦煌发现的民间词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有描写边区战地生活的，也有反映战士与亲人离别之情的。如：

> “十四十五从军征，手执长枪。低头泪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
>
> ——失调名

敦煌民间词的题材比较广泛，除了上述内容外，还有一些描写封建官吏、商人、渔夫等各类人物的作品。

安史之乱以后，封建文人受民间词的影响，有些人开始填词。最早填词的是张志和、戴叙伦、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戴叙伦的《调笑令》：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月明，月明，胡笳一声愁绝。”

“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江南塞北别离。别离，别离，河汉虽路绝！”

两首《调笑令》描写的都是边塞的荒凉景象和战士的思乡愁绪，两者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悲咽苍凉的情调。另一方面，从这两首词的严格的声律，韵位富于变化，以及句调更为长短不齐方面看来，既反映了诗要讲究声律的精神，又表现出词的特征。

唐代宗大历以后，词在继续发展，当时填词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温庭筠和韦庄。

温庭筠（812—870?），本名岐，字正卿，太原初（今山西太原）人。出身于没落贵族之家，屡应试不第，后终官国子助教。温庭筠精于音律，“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他的诗与李商隐齐名，文采绚丽，具有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艺术成就超过晚唐任何词人。他的词流传后世的有60余首。他的词上承南朝宫体诗的诗风，下为花间派词人开了道路，多数是描写妇女的服饰、容貌和情意。如《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①]，鬓云[②]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③]，双双金鹧鸪。[④]”

---

① 小山：沈屏所画之景。金明灭：屏山之金碧山水，因日久剥落表现出或明或暗。

② 鬓云：唐代妇女挽鬓作环如云状。

③ 襦：短衣。

④ 金鹧鸪：用金线绣鹧鸪鸟于短衣上。

温庭筠也写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和妇女思念征夫之词。如：

“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玉连环，金镞箭，年年征战。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

《蕃女怨》

“梳洗罢，独依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辉脉脉水悠悠，断肠白苹洲。”

《忆江南》

前首词写的是征人的艰苦战斗生活，后一首写妇女盼望自己亲人归来的一片痴情。词里反映她楼前经过的船皆非自己亲人所乘之船，所看到的仅仅是斜阳映照着滔滔不断的流水，使她忧愁得似乎肝肠已断！

这两首词清新朴素，明朗生动，作者在创造词的意境方面表现了杰出的才华。词到了温庭筠的手里完全定型，而且成为文人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他的词直接影响了五代，为花间词奠定了基础。

另一位花间词人是韦庄（836—910?），他曾任前蜀王建宰相。韦庄的词的风格和温庭筠不同，他主要是通过离情别恨的爱情题材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他的几首《菩萨蛮》，正是他身世之感的代表作。其中一首写道：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①江南老。春水碧于天②，画船听雨眠。垆边③人似月，皓腕④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

① 合：应当，应该。
② 碧于天：绿得胜过天色。
③ 垆边：摆酒坛处。
④ 皓腕：手腕白如雪。

须断肠[1]！”

这首词表现作者的生活闲适。他睡在画舫里听雨声，船在碧绿的水中荡漾。那酒垆边白皙美貌的少女，引起他无限的回忆。这一切，都使他不愿意回到自己家乡。

韦庄还有一些词，写出自己对爱情生活中的离愁别恨的回忆。具有真挚感情。如《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这两首《女冠子》都是作者追念其宠姬之词，前者是追忆临别情景；后一首是梦中相见。两首词在构思布局上别具匠心，语言通俗而生动，没有任何雕琢，和温庭筠的作品显然不同。

十四、艺术园地绚丽多彩

音乐 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传入了中原。到北周时期，高昌、龟兹、康国、安国音乐在长安等地颇为流行，因此隋朝宫廷乐歌，也杂有“胡声”（《隋书》卷十四《音乐志》）。隋炀帝时期，国家有九部乐，即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其中除清乐、礼毕以外，都是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当时著名音乐家有万宝常、郑译、何妥等，最杰出的是万宝常。他著有《乐谱》六十四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治”，是一部重大创作，但由于他批评过何妥，受苏威、

---

① 断肠：形容极度思念或悲伤。

何妥等人排斥，长期不见录用，含恨而死。

唐朝继承隋朝音乐的传统有十部乐。高宗以后，十部乐逐渐淘汰。当时的音乐家们，吸收了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的精华，创作了新乐，形成了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伎规模小，演奏者只有 3 至 12 人，在堂上表演。立部伎在堂下演奏，参加的有数十人。坐部伎主要用龟兹曲，乐器以琵琶为主。立部伎多用大鼓，并杂以龟兹曲。凡坐部伎中不可教者，退为立部伎，再不可教者，乃习雅乐，可见当时雅乐地位最低。

唐朝著名音乐家有祖孝孙、王长通、李龟年、唐玄宗和曹善才等。唐玄宗不仅长于作曲，并且善打羯鼓。他曾选拔坐部伎 300 人，教于梨园，号称“皇帝梨园弟子”，发现其中乐声有误者，随时即行纠正。又选宫女数百，也为“梨园弟子”，教以音声。可见唐朝音乐的发达。

西域不仅传入音乐，而且又传入舞蹈。唐朝各种舞蹈多配音乐，故称乐舞。其中以三大舞为代表。三大舞即七德舞、九功舞和上元舞。七德舞属于武舞，原来是秦王破阵乐，采民间流行歌曲，并掺杂龟兹乐作成。九功舞是一种文舞，本为功成庆善乐。上元舞，本为上元乐。

盛唐时期，以“霓裳羽衣舞”最有名，唐人歌咏此舞的作者很多，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写了《霓裳羽衣舞歌》。

绘画 隋朝著名画家有展子虔、郑法士、董伯仁等。展子虔善画各种楼阁、山水、人物，他能够使咫尺的画面，具备千里之趣。展子虔的春游图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名画，这幅画笔法精细，对于山水与人物的精神状态，表现得融洽无间，对唐宋绘画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朝初年，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的人物画最有名，如《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二十四人图》、《太宗步辇图》等。他们多以真人真事为题材，也有一部分凭想象画的。他们二人的画，笔力刚健，利用简练的笔法表达出人物的性格。



阎立本《步辇图》

盛唐时期的吴道子（道玄），最长于佛道画，被誉为画圣。吴道子比阎立德兄弟更加熟练的运用晕染法（凹凸法），并达到理想的效果。他的画在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深浅，从而使画面特别富有立体感。吴道子的画不仅求其形似，而且求其神似。他先后在寺观画壁三百多间，画中的人物形态万千，无一相同。



吴道子《天王送子图》

中唐的张萱、周昉，善画妇女，别开生面。唐朝以前的妇女画，多画后妃、义妇、节妇，以宣扬纲常名教。张萱、周昉打破旧框框，描绘家庭生活，如烹茶、乞巧、藏迷、吹箫等等，使妇女画的题材更加广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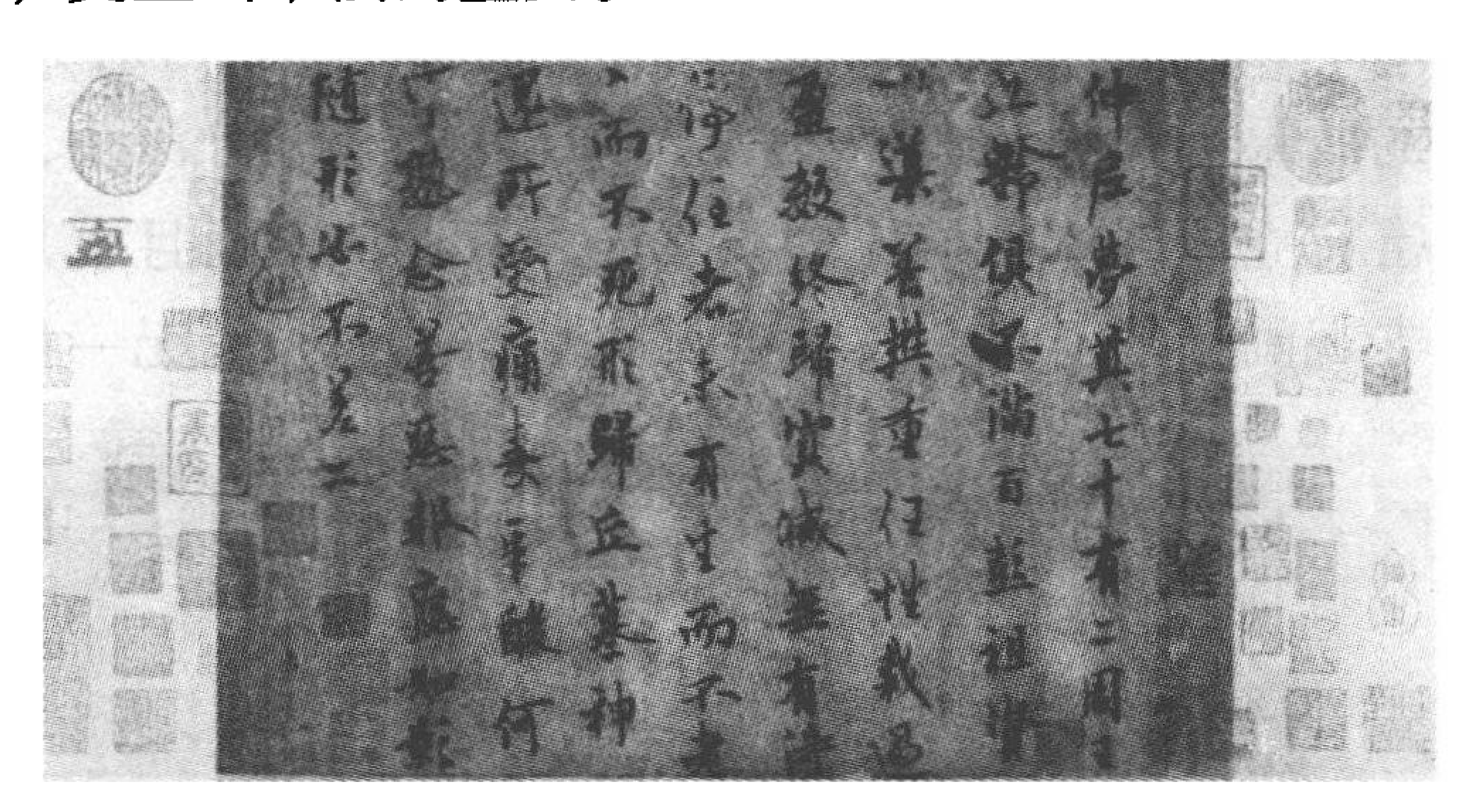
中唐最杰出的画家是韩滉，他和张萱不同，他喜欢画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宣和画谱》所著录的36件韩滉的作品中，多数

是农村景物画。

山水画以李思训的作品最有名，他的艺术特点是描绘工细，设色绚丽，景物逼真。他儿子李昭道也长于山水画。

书法 唐朝特别重视书法，学校教育、科举制度都和书法有密切关系。首都设立六种学馆。书学属于六种学馆之一，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科举考试科目中，有“明书”，及第后，被委任当官。进士、明经及第以后，不能立即当官，必须经过吏部考试。考试的内容是“身、言、书、判”。在具体考试之时，先考书判，书判合格后，再考察其身言。但由于每年参加吏部铨选的人员甚多，不能一一察其身言，实际上主要凭书判用人，从而形成“吏部选人，必限书判”的情况，更显出书法的重要。

由于唐代十分重视书法，因此出现很多著名书法家。初唐的虞世南、欧阳询，都学王羲之书，各有心得。继虞、欧而起者有褚遂良和薛稷。初唐这四家基本上是王羲之的后继者，很少创新。盛唐的颜真卿、张旭、贺知章、马怀素等，才是唐代新书法的创造者。颜真卿工于篆隶，又能融篆隶于行楷，方严正大，面目一新。他的书法气势雄浑，形体敦厚。颜真卿的传世作品较多，以《多宝塔碑》、《颜家庙碑》最有名。怀素是著名草书书法家，他曾学书于颜真卿，造诣很高，李白很称赞他。后期柳公权与颜真卿齐名，他吸收颜欧两家之长，写出的字谨严又有开阔疏朗的神致，代表性作品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



欧阳询《梦奠帖》

至于篆书，以李阳冰的作品最有名。隶书首推李潮、蔡有邻、

韩择木等。草书则推贺知章、张旭等。

敦煌艺术 敦煌莫高窟艺术作品的内容非常丰富，总的说来可分三大类：雕塑、壁画和建筑，这里重点谈谈雕塑和壁画。



颜真卿《多宝塔碑》(局部)

雕塑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塑像又是石窟的主体，多数是采用具有三度空间的立体像，但由于“神”的身份不同，又分别采取不同手法来表现。主体塑像多为圆塑，侍从的菩萨多是浮雕，至于附属的供养菩萨、飞天、千佛等，则采用影塑或浮雕。圆塑的内容主要是佛、菩萨、罗汉、天王等，分别置于圆拱龛、双树龛、阙形龛内。同时也有无龛主尊，如275窟弥勒菩萨，丰圆而略微笑的面容和健壮的体魄，多具有西域民族的特点。头上的三珠冠，垂肩的发辫，胸前的璎珞，以及交脚而坐的姿势，显然带有一定的印度、中亚、波斯风俗。另外有些石窟中的塑像，具有“秀骨清像”的风格，人物多是瘦脸型，褒衣博带，大冠高履，颇有江南士大夫的风采。

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当时的雕塑不仅出现了群像，而且出现一批大型佛像。如证圣元年（695）96窟的北大像，高33米，面部保持初唐塑像的风韵。玄宗时高26米的南大像，其面部丰腴，神态庄静，高大雄健的体魄，充分显示了唐朝艺术家塑像时那种“目准心计”的卓越技艺。唐朝雕塑的另一特点是群像的发展，如有的龛中塑了七身佛像，还有多至十一身佛像的。如果加上龛内供养菩萨、天王、力士像就更多了。这些群像无论在人物相互关系的配合上，或人物精神面貌的表现上，都超过前代的水平。

唐朝天王、力士的塑像，都表现了浑身是力量的神态，这种力量，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内在力量的显露。46 窟的天王，两眼圆睁，紧闭双唇，身披金甲，双手叉腰，脚踏魔鬼，显示了极其豪放的风度。

敦煌莫高窟塑像的特点，一方面在泥塑上掌握了纯熟的技巧，同时在彩和塑的有机结合上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当塑出了概括的形象以后，更以彩色描绘细部。这样做不仅使形象更真实更丰富，而且赋予形象以色彩的美感，从而发展了我国民族雕塑艺术彩绘装銮的优秀传统。

敦煌壁画规模巨大，总面积五万多平方米，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从画的内容看，可以划分佛像画、佛经故事画、民族传统神话故事画、经变画四大类。


唐代壁画《弥勒下生经变》中的诀别图

作为宗教艺术说来，佛像画是敦煌壁画中的主要内容。这里有三世佛、七世佛、释迦多宝并法佛、天王、乾闼婆（飞天）、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等。隋唐时期，由于大乘教思想的流行，敦煌的佛像画有了新发展。又出现了佛、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四大天王、地藏菩萨等单独形象。最大的菩萨画像高 10 米，最长的菩萨群像行列，有连续数十身之多。

在佛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飞翔于佛像上空的乾闼婆（飞天），她们不长翅膀，不托云彩，挥舞长巾，扬手散花，怡然自得地翩翩起舞，遨游太空，给人们以美妙的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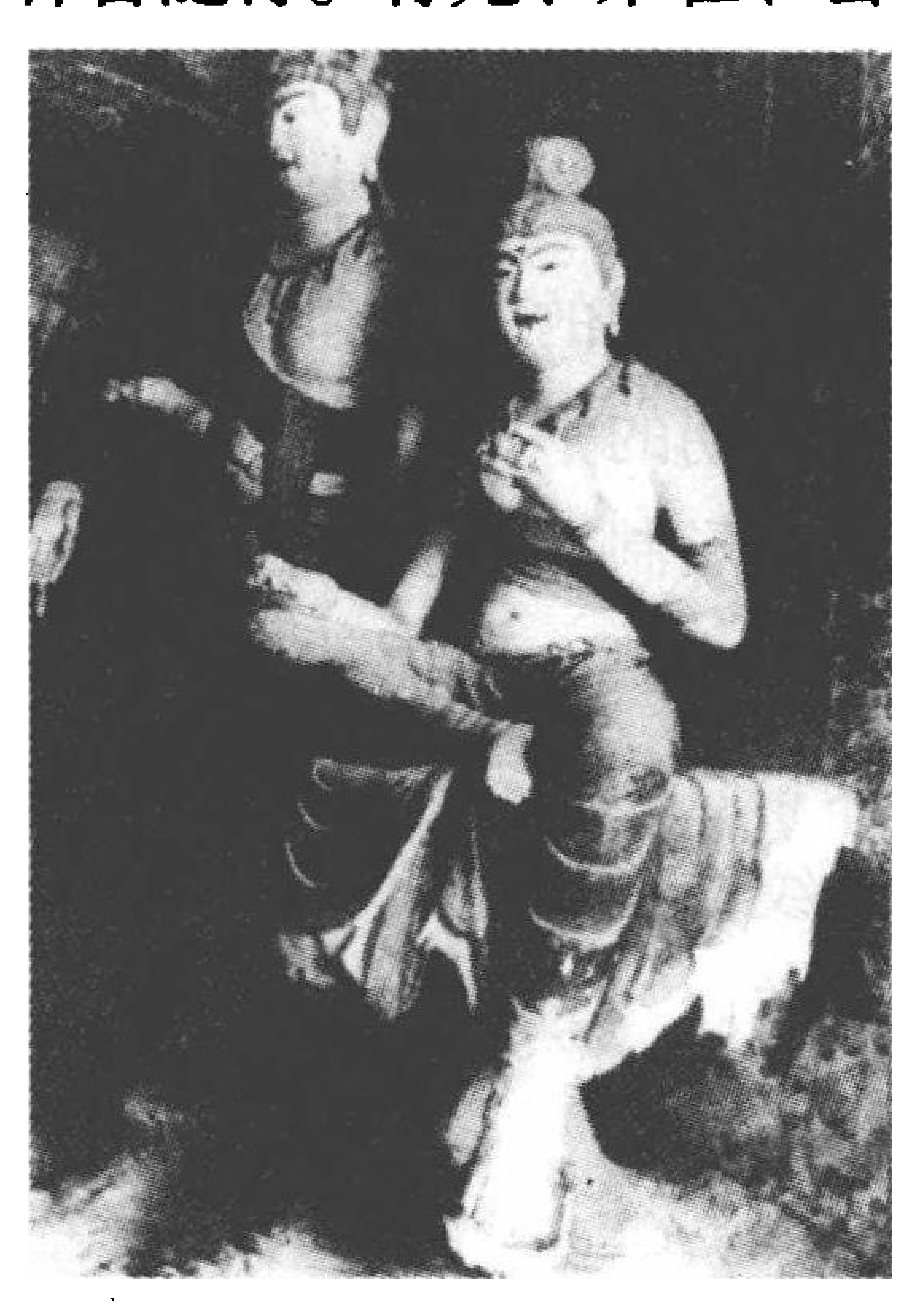
第二类壁画是佛经故事画。早期壁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小乘教

《文度集经》、《贤愚经》和《佛说修行本起经》等，内容是佛的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本生故事画的是释迦生前种种善行。壁画里有《鹿王本生》、《尸毗王本生》、《菩萨本生》等。这些本生原来是印度民间故事，在佛教兴起以后，被纳入佛经，打上了佛教的烙印，随佛教传入我国。

佛传故事画是宣扬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早期壁画中多为片断的图画，如四相、八相等。从北周以后至隋唐，出现了完整的佛传连环画。例如在29窟人字披顶上，六条连环画长达20多米，这是莫高窟早期最完整的佛传连环画。这幅画从摩耶夫人夜梦神人乘象入胎和夫人有孕开始，用了69个不同情节的画面，一直画到释迦牟尼出家，在菩提树下苦修为止。这69个画面互相衔接，有机地连成一气，内容丰富，首尾完整，是我国早期佛传故事画最完整的一幅。

第三类是我国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的壁画。在北魏249窟和西魏285窟的顶部，除了顶部中心画莲花藻井四枚上画天公以外，南北则画东王公西王母驾龙凤出行图。车上重盖高耸，车后旌旗飘扬，前有扬幡的方士开路，后有人头龙身的神兽随行。青龙、朱雀、玄武、白虎分布各壁。另外有人首蛇身的伏牺女娲，穿大袖、长袍，手持规矩，胸悬明月，浮游于太空。隋朝302窟里也是画的传统神话故事。

第四类是经变画。所谓经变画就是以佛经为根据的绘画，这里所谈的经变画，就是指一部经一幅画的大型结构。在敦煌石窟艺术当中，这种经变从隋朝开始，到唐朝发展到极盛时期。唐朝主要经变画有《阿弥陀经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楞伽经变》等。经变画是中国佛教



敦煌79窟唐代菩萨造像

艺术的独创形式，大多数经变，中间都画佛国世界，或画释迦及天众，四周穿插一些故事情节，结构严谨而生动活泼。唐前期的经变画形式多样，意境开朗，呈现一派生气蓬勃的景象。

敦煌艺术虽然以佛教内容为主，但它也反映敦煌一带的社会经济生活。在石窟中保存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画面：如二牛抬扛、曲辕犁、播种、割麦、打场、扬场等全部农业生产过程。同时保留了捕野羊、杀野猪、追黄羊的场面。这些画面为研究南北朝、隋、唐社会经济和文化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敦煌壁画中的图案，多用变形的植物纹、动物纹、天象纹、几何纹和主题性壁画相同的人物形象组合而成，各种纹样大部分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例如莲花在佛经中叫“法花”，象征纯洁、净化、净土；龙、凤、麒麟象征祥瑞；石榴象征多子多孙；忍冬象征坚忍不拔的精神。（参考段文杰著《敦煌石窟内容及其特点简述》）



晚唐敦煌供养菩萨像

敦煌壁画中不同的图案，各自具有不同的花纹和不同风格。南北朝初期的平棋与人字披相结合的窟顶，是敦煌石窟最典型的形制。这种形制在东汉画像墓顶上已经出现，敦煌的平棋与人字披，显然是模仿崖山屋顶的形式。至于龛楣形如菩提树叶、圆光背光等形象，有些受西域印度的影响。在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波斯纹样流行于西域及河西陇右，从而在敦煌壁画中，反映不少波斯纹样。

附录一　隋朝帝系表

文帝杨坚（1）——炀帝广（2）——恭帝侑（3）

附录二　唐朝帝系表

高祖李渊(1) —— 太宗世民(2) —— 高宗治(3)

—— 中宗显(4) —— 武则天改唐为周(5) —— (中宗复唐国号)睿宗旦(6)

—— 玄宗隆基(7) —— 肃宗亨(8) —— 代宗豫(9)

—— 德宗适(10) —— 顺宗诵(11) —— 宪宗纯(12)

—— 穆宗恒(13) ——┬ 敬宗湛(14)
　　　　　　　　　├ 文宗昂(15)
　　　　　　　　　└ 武宗炎(16)

—— 宣宗忱(17)

—— 懿宗漼(18) ┬ 僖宗儇(19)
　　　　　　　└ 昭宗晔(20)

—— 哀帝柷(21)

附录三　隋唐大事年表

中国纪年	公元纪年	大　　事
北周大象二年 陈太建十二年	580	五月，周宣帝宇文赟死。周静帝宇文阐八岁即位。杨坚入宫辅政，假黄钺左大丞相总揽军政大权。六月，相州总管尉迟迥讨杨坚，司马消难王谦应之，韦孝宽等奉令平定尉迟迥等。九月，杨坚自称大丞相。十二月，杨坚自称隋王，加九锡。
隋开皇元年 陈太建十三年	581	二月，杨坚代周称帝，国号隋，建元开皇。取消周六官制，置三省六部。四月，筑长城二旬而止。八月，隋打败吐谷浑。九月，隋铸五铢钱，统一货币。十月，隋行新律，去枭轘及鞭法。本年定均田制和租调法。
开皇二年 太建十四年	582	一月，陈宣帝死，太子陈叔宝即位。五月，突厥寇武威、天水。
开皇三年 陈至德元载	583	三月，隋迁都大兴，减民役为20天，调二丈，取消盐铁专卖。四月，隋军大败突厥。十月，隋罢郡为州，改地方三级制为两级制。本年颁用铜斗铁尺，统一度量衡。设置黎阳、广通、常平仓。
开皇四年 至德二载	584	正月，隋颁布甲子元历。二月，突厥达头可汗请降于隋。六月，隋令宇文恺主持开广通渠，以通大兴至潼关漕运。
开皇五年 至德三载	585	正月，隋颁新修五礼。五月，初置义仓。隋清查户口，新编入籍者164万余口。七月，东突厥沙、钵可汗上表称臣于隋。本年隋发3万丁筑长城于朔方、灵武，筑长城700里。

开皇六年 至德四载	586	二月，发15万丁朔方以东边险地筑数十城。八月，关内七州大旱，诏免赋役。
开皇七年 祯明元年	587	二月，发10万丁修长城，二旬而罢。四月，隋于扬州开山阳渎。突厥沙钵略可汗死，弟莫何可汗立。五月，隋灭后梁。十一月，高颎上书困陈之策。本年杨素造战船于永安。
开皇八年 祯明二年	588	十一月，文帝以杨广、杨素、杨俊为元帅，以50万人伐陈。十二月，突厥莫何可汗死，都兰可汗立。
开皇九年	589	一月，隋军渡江，攻克建康，陈亡。
开皇十年	590	五月，诏军人户籍属州县，府兵与均田制合一。制民五十免役收庸。十一月，江南士族沈玄侩等叛乱，被杨素平定。
开皇十一年	591	吐谷浑王夸吕死，子世伏立。开皇中，废九品中正制。
开皇十二年	592	八月，诏诸州死刑报大理寺复审。十二月，诏免河北、河东功调并减三分之一田租。遣使天下均田。
开皇十三年	593	二月，营建仁寿宫。四月，定战亡之家免役一年。七月，突厥染干可汗请婚，许之。
开皇十四年	594	六月，诏公卿以下给职田，废公廨本钱。八月，关中大旱。十一月，制州县官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开皇十五年	595	二月，没收天下兵器，严禁私造。五月，吐谷浑遣使入贡。十二月，诏盗边粮一升以上者斩，并籍没其家。
开皇十六年	596	六月，诏工商不许当官。八月，诏决死罪者上奏后行刑。十一月，以光化公主嫁吐谷浑王世伏。
开皇十七年	597	四月，颁张胄玄新历。七月，桂州李世贤起义，被虞庆则镇压。以安义公主嫁突利可汗。十二月，吐谷浑主世伏被臣下所杀，立伏允为王。高丽王汤死，子高元立。袭爵辽东公。
开皇十八年	598	正月，诏江南各州民间有船三丈以上者没入官。二月，高丽入侵辽西，隋以杨谅率兵反击。七月，河南八州水灾，免课役。

开皇十九年	599	二月，讨突厥都兰可汗。十月，以突利为启民可汗，隋以宗女义成公主嫁之。
开皇二十年	600	三月，熙州李英林起义，被张衡镇压。十一月，立晋王杨广为太子。十二月，日本推古天皇遣隋使到大兴。
仁寿三年	603	九月，置常平仓官，启民可汗归国。文中子、王通献“太平策”。
仁寿四年	604	七月，太子杨广杀杨坚自立为帝。八月，汉王杨谅起兵失败。十月，诏除妇人奴婢部曲之课。十一月，发10万丁掘关防。
炀帝大业元年	605	正月，改元大业。三月，宇文恺主持营建东都。征淮南民伕数十万疏邗沟。发河南百余万丁开通济渠。四月，刘方大败林邑。五月，筑西苑周200余里。八月，炀帝巡游江都。
大业二年	606	正月，派使省併州县。十月，创进士科，置洛口仓。十二月，置回洛仓。本年全国计8 907 536户，46 010 956口。
大业三年	607	三月，派朱宽出使流求。四月，颁布大业律。五月，发河北十余万丁凿太行山驰道。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八月，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炀帝至金河入启民可汗帐。日本使者小野妹子到隋。十月，以裴矩经略西域。本年河南大水，漂没30余郡。
大业四年	608	四月，隋派裴世清出使日本。九月，日本派小野妹子随裴世清使隋。高向玄理到隋留学。十月，派常骏等到南海赤土。发河北百余万人开永济渠。
大业五年	609	正月，诏天下均田。五月，击破吐谷浑。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六月，西域27国来会。
大业六年	610	正月，有人自称弥勒佛组织数十人在京城建国门暴动。三月，炀帝游江都，以王世充为江都宫监。六月，雁门人尉迟通聚众3 000人起义。十二月，开江南运河。本年巢元方作《诸病源候论》。

大业七年	611	二月，征天下兵会涿郡，在东莱口造船，准备进攻高丽。山东河南大水，漂没 30 余郡。王薄起义。窦建德、刘霸道、张金称、高士达起义。
大业八年	612	正月，炀帝督水陆军百余万进攻高丽。六月，来护儿以水军进攻平壤大败。七月，宇文述所率陆军在高丽境内大败而归。
大业九年	613	正月，炀帝第二次大征兵入侵高丽。三月，济阴孟海公起义，孟让、孙宣雅起义，王薄被张须陀打败。六月，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围东都，炀帝引兵还京。十二月，扶风向海明等起义。本年杜伏威、辅公祏在长白山起义。
大业十年	614	二月，炀帝复征天下兵，第三次侵略高丽。四月，彭城张大虎起义。五月，以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七月，高丽王遣使乞降，下诏班师。十一月，离石胡刘苗起义。十二月，孟让率兵南下，被王世充打败。以张须陀为河南讨捕大使。
大业十一年	615	二月，诏民悉居城内，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上谷王须拔魏刀儿起义。四月，以李渊为河东安抚大使。十月，炀帝还东都。诏东都再造龙舟。东海李子通起义。
大业十二年	616	正月，炀帝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镇压农民军。七月，炀帝南逃江都。十月，瓦岗军进兵河南。十二月，以李渊为太原留守。张金称、高士达牺牲，余众归窦建德。
大业十三年	617	正月，杜伏威攻破历阳，大败陈稜军。窦建德称长乐王。瓦岗军攻陷兴洛仓，开仓任民取食，略河南地，李密自称魏公。五月，李渊、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七月，窦建德在河间大捷。十一月，李渊打进长安。李密杀翟让。十二月，金城薛举自称天子。
唐武德元年	618	三月，宇文化及杀隋炀帝，隋亡。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唐，建元武德。六月，唐立李建成为太子。凉州李轨降，薛仁杲、徐世勣降唐。

武德二年	619	二月，征租庸调。窦建德斩宇文化及于聊城。三月，刘武周勾结突厥进犯太原。九月，李子通称吴帝于江都，杜伏威降。十一月，窦建德攻陷黎阳。
武德三年	620	秦王李世民打败刘武周、宋金刚，收复河东。五月，李世民进军中原，围攻王世充。十二月，李子通打败大士族沈法兴。
武德四年	621	三月，窦建德率10万大军援助王世充。四月，虎牢之战，窦建德被唐军战败，河北义军溃散。王世充降唐，河南悉平。七月，刘黑闼二次起义。九月，唐将李靖渡江南征。十月，萧铣降。
武德五年	622	正月，刘黑闼恢复建德故地。四月，李世民兄弟三人率兵镇压刘黑闼。七月，杜伏威降。
武德六年	623	正月，刘黑闼被部下所执以降斩之。林邑入贡。三月，令天下百姓按资产定为三等户。七月，辅公祏二次起义。
武德七年	624	正月，封高丽、百济、新罗诸王为郡王。三月，李孝恭镇压辅公祏起义。四月，颁布均田令租庸调法。本年付奕上疏请除佛教。
武德八年	625	正月，许突厥、吐谷浑互市。五月，王孝通作《缉古算经》。
武德九年	626	三月，突厥寇原州、灵州、秦州、朔州、泾州。六月，玄武门之变。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突厥侵犯渭桥，请盟而去。本年，中天竺学者波颇密多罗来唐。龟兹、高丽、百济、新罗入贡。
太宗贞观元年	627	正月，改元贞观。制谏官、史官随宰相入朝议事。六月，山东大旱。本年玄奘赴天竺求经。
贞观二年	628	二月，诏州县置义仓。突厥突利可汗请入朝。十二月，册封薛延陀夷男为真珠可汗。
贞观三年	629	九月，在天下各州置医学。十一月，令李靖、李勣率10万人反击东突厥。十二月，突利可汗降。本年唐人从塞外归来120余万。

贞观四年	630	二月，李靖大破突厥于阴山。颉利可汗被俘。分其地为六州，设云中定襄都督府管辖之。十二月，高昌王入朝。
贞观五年	631	五月，以金宝从突厥赎回唐人 8 万口令天下决死刑必须三复奏，在京诸司五复奏。林邑、日本、新罗入贡。
贞观六年	632	正月，群臣请封禅，魏徵坚决反对乃止。十二月，党项前后内属者 30 万口，以其地为 16 州。
贞观七年	633	三月，李淳风造浑天黄道仪。九月，山东、河南 40 余州大水。十二月，以李靖、侯君集大举讨伐吐谷浑。
贞观八年	634	七月，山东、河南、淮海间大水。十月，吐蕃入贡求和亲。本年高昌、石国、龟兹入贡。
贞观九年	635	三月，分民户为九等。四月，侯君集等大败吐谷浑。
贞观十年	636	正月，房玄龄魏徵上《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诏藏于秘阁。突厥阿史那社尔降。本年改统军别将为折冲都尉，全国十道置军府 634。
贞观十一年	637	正月，房玄龄等修订唐律五百条，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格七百条。九月，黄河泛滥。十一月，以武则天为太宗才人而入宫。
贞观十二年	638	正月，高士廉、许敬宗编《氏族志》。七月，诏于长安建大秦寺。八月，吐蕃进犯松州。
贞观十三年	639	十二月，侯君集出发征高丽。本年全国共 358 州，1 511 县。高丽、新罗、波斯及西域诸国入贡。
贞观十四年	640	二月，诏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新罗、百济、高丽、吐蕃遣子弟入国学。八月，侯君集平定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
贞观十五年	641	正月，江夏王李道宗奉诏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吐蕃遣子弟入长安国学。四月，吕才作《阴阳书》。
贞观十六年	642	九月，西突厥寇伊州，郭孝恪反击。十一月，高丽泉盖苏文杀其王高武，自任莫离支。

贞观十七年	643	四月，废太子李承乾为庶人，立李治为太子。
贞观十九年	645	正月，玄奘回国。十一月，李世勣、张亮率兵进攻高丽，攻安市不下，班师。
贞观廿年	646	六月，李世勣大破薛延陀于郁督君山北。九月，铁勒诸部内属，唐统一漠北。
贞观廿一年	647	正月，以铁勒、回纥诸部之地分置六都督府、七州。三月，李世勣再攻高丽。四月，设燕然都护府于金山。十二月，唐伐龟兹。本年中亚诸国入贡。唐遣使天竺取熬糖法。
贞观廿二年	648	十一月，契丹内属，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闰十二月，阿史那社尔击败龟兹。诃陵国使人贡。
贞观廿三年	649	四月，太宗死，长孙无忌、褚遂良受遗诏辅政。六月，李治即位。诏雍州给复一年。
永徽元年	650	九月，高侃擒突厥车鼻可汗，分置单于、瀚海都护府。本年雍、同、绛州大旱，齐、定等州大水。
永徽二年	651	七月，西突厥贺鲁自立。沙钵罗可汗进攻庭州，梁建方反击。本年停止秀才科考试。
永徽三年	652	正月，牢山大战，唐军打败贺鲁军。三月，建立大雁塔，本年全国 380 万户。
永徽四年	653	三月，颁孔颖达《五经正义》。四月，林邑国王遣使贡驯象。十月，睦州女子陈硕贞起义，自称文佳皇帝，被崔义玄镇压。
永徽五年	654	三月，以太宗才人武则天为昭义。四万丁筑长安城。十一月，“和雇”京兆百姓四万人筑罗城，30 日而罢。本年洛州刺史贾敦颐没收豪强籍外占田 3 000 余顷，分给贫民。
永徽六年	655	十月，废王皇后为庶人，立武则天为皇后。
显庆元年	656	四月，矩州谢无零起义。十二月，设置算学。程知节破西突厥。
显庆二年	657	十二月，苏定方大败西突厥沙钵略可汗。分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

显庆三年	658	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六月，派程知节薛仁贵征高丽，大破之。九月，废书学、历学。
显庆四年	659	四月，贬杀反对武则天的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柳奭、于志宁等。六月，孔志约等撰《姓氏録》。九月，诏以石、米等十国置州府百二十七。本年，李延寿编完《南史》、《北史》。
显庆五年	660	三月，苏定方、刘伯英率 10 万人打败了百济，诏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
龙朔元年	661	四月，苏定方人侵高丽。六月、吐火罗、波斯等 16 国归附，以其地置八都督府、76 州、110 县、126 军府，同隶属安西都护府。
龙朔二年	662	正月，东都置国子监。立卑路斯为波斯王。四月，复置律学书学。
龙朔三年	663	二月，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部落，改名为瀚海都护府。旧瀚海都护府移古云中城，改名云中都护府。九月，唐将刘仁轨、孙仁师平百济，并击败日本援兵于白江。
麟德元年	664	一月，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都护府。十二月，杀上官仪，武则天专权。
麟德二年	665	五月，颁行李淳风的麟德历。十月，高丽王藏遣子聘唐。
乾封元年	666	正月，高宗至泰山封禅，到曲阜祀孔，在亳州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
总章元年	668	九月，唐军攻克平壤，高丽王降。下 70 城，697 200户。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本年，京城及山东、江淮旱、饥。
总章二年	669	五月，敕徙高丽38 200户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八月，改瀚海都护府为北庭都护府。
总章三年	670	正月，在辽东置州县。四月，吐蕃入侵吐谷浑，薛仁贵组织反击。七月，吐蕃大败唐军，吐谷浑地尽没，余众内迁灵州。本年 40 余州大旱，百姓大饥。

上元元年	674	八月，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改元上元。十二月，于阗王阇伏雄、波斯王卑路斯来朝。本年高宗召见孙思邈，孙思邈辞疾请归，著《千金方》三十卷。
仪凤元年	676	二月，迁安东都护府于辽东。三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四州。八月，置南选使。
仪凤二年	677	敕关内河东诸州招募勇敢，以讨吐蕃，开始募兵。
仪凤三年	678	九月，李敬玄率兵18万与吐蕃战于青海，兵败。大将刘审礼被俘。
永隆元年	680	三月，裴行俭大破突厥于黑山。五月，常州刘龙子起义。七月，吐蕃寇河源、黑止常之反击。安西四镇失守。十二月，李淳风注释《五曹算术》等十部算经。
开耀元年	681	八月，河南、河北大水，许民至江淮就食。本年，进士考试加试杂文。
永淳元年	682	六月，山东大雨，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瘟疫，两京间死者枕于路，人相食。
弘道元年	683	四月，绥州白铁余起义，占据城平，围攻绥德，被程务挺镇压。十二月，高宗死，李显即位，政事仍决于武则天。
嗣圣、文明、光宅元年	684	二月，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李旦为帝。武则天临朝称制。九月，改元光宅，立武氏诸王宗庙。十月，徐敬业扬州叛乱，李孝逸率30万大军平乱。
垂拱元年	685	三月，制内外九品以上官员及百姓，咸令自举。六月，漠北同罗、仆固叛唐。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
垂拱二年	686	二月，给新罗《礼记》等书。三月，以索元礼为游击将军，实施特务统治。
垂拱三年	687	七月，突厥寇朔州，黑齿常之组织反击。本年天下大饥，山东关内尤甚。

垂拱四年	688	五月，武则天加号圣母神皇。八月，越王李贞、瑯琊王李冲起兵谋匡复唐室失败。九月，武则天大规模诛唐宗室。
永昌载初	689	九月，薛怀义两次出征突厥大败。十一月，武则天自名曌，改诏称制。除唐宗室属籍。
周天授元年	690	二月，策贡士于洛城殿，殿试从此开始。七月，令天下各州置大云寺，宣扬《大云经》。九月，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元年。
天授二年	691	四月，令佛在道前，僧尼在道冠之上。七月，移关内雍、同等州民数十万于东都。
如意、长寿	692	正月，武则天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十月，王孝杰大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
延载元年	694	正月，突厥可汗骨笃禄死，默啜自立为可汗。本年摩尼教传入唐。
证圣、天册万岁元年	695	正月，明堂建成，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四月，大周万口颂德天枢成。
万岁通天元年	696	三月，王孝杰、娄师德率兵与吐蕃军大战于素罗汗山，大败。五月，营州都督契丹人李尽忠叛唐，占领营州等 13 州之地。九月，初令山东组织武骑团。诏天下系囚及士庶家奴骁勇者，官偿其值，发以击契丹。
神功元年	697	三月，突厥立默啜可汗。六月，酷吏来俊臣等伏诛。
圣历元年	698	九月，立李显为太子。默啜可汗进犯赵、定等州。本年，封粟末靺鞨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剑南三万逃户起义。
圣历二年	699	正月，置控鹤监，以张昌宗、张易之领之。河南河北置武骑团以备突厥。
久视元年	700	闰七月，唐休璟大败吐蕃。张易之等引商人宋霸子等人宫侍宴同博。

大足、长安	701	五月，以魏元忠为灵武道大总管以备突厥。十月，武则天还长安。
长安二年	702	正月，创立武举科。三月，突厥破石岭，寇并州，以薛季昶反击之。十月，日本使者献方物。十二月，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
长安三年	703	四月，吐蕃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七月，突骑可汗乌质勒，攻陷碎叶镇，并徙其牙帐居之。十一月始安欧阳倩领数万人起义。
长安四年	704	四月，武则天令作大像于白司马阪糜费巨亿。十一月，大雨雪。
神龙元年	705	正月，张柬之等组织武装入宫，杀张易之兄弟。武则天传位给李显，改元神龙。二月复国号唐，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立韦氏为皇后。五月，赐张柬之等五人王爵，夺其权力，韦后专政。六月，河南、河北 17 州大水。十二月，武则天死。
神龙二年	706	闰正月，置公主府，设官员。二月，置十道巡察使。三月，大置员外官，自京司及诸州凡 2 000 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又将千人。七月，立李重俊为太子。十二月，突厥入寇灵、原、会等州，掠牧马数万。
景龙元年	707	三月，京师至山东大疫，河南北大旱。四月，以金城公主嫁吐蕃赞普。七月，太子与李多祚等矫诏杀武三思。太子重俊以后因兵败而死。宜州钟大眼起义。
景龙二年	708	三月，张仁愿修三受降城。四月，设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
景龙三年	709	正月，长宁公主、安乐公主多纵僮奴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九月，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各树朋党准备夺权。本年关中饥，米斗百钱。
睿宗景云元年	710	六月，韦后杀中宗立温王李重茂。临淄王李隆基起兵诛韦后之党，拥李旦为帝。李隆基被立为太子。本年，刘知几著《史通》。

景云二年	711	二月，令太子监国。四月，始在河西设立节度使。六月，置十道按察使。十一月，令百姓二十五成丁，五十五免役。
玄宗先天元年	712	八月，睿宗传位太子李隆基。十一月，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大掠而去。
开元元年	713	七月，杀太平公主。以高力士知内省事。十二月，改元开元。
开元二年	714	正月，制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为京官。裁汰僧尼 12 000 余人。三月，毁天枢。五月，罢员外员试官等数千人。十二月，设陇右节度使。
开元三年	715	正月，突厥十姓降者万余帐。六月，山东诸州蝗灾，遣使分道驱除瘗埋。十一月，相州崔子嵒起义。
开元四年	716	二月，玄宗在宣政殿考试县令，45 人落第被淘汰。六月，同罗、回纥、霫、拔也古、仆固部归附，第二次统一漠北。本年开大庾岭。
开元五年	717	二月，奚、契丹内附，光复营州等 13 州。九月，恢复贞观时谏官史官参加宰相议事的制度。十一月，令马怀素等组织编写与整理书籍。本年日本吉备真备等入唐留学。
开元六年	718	正月，整顿金融，禁用恶钱。十月，撤销公廨本钱。
开元七年	719	初置剑南节度使，领益彭等 25 州。
开元八年	720	四月，天竺遣使献五色鹦鹉。十一月，突厥寇甘、凉等州。
开元九年	721	二月，以宇文融为覆田劝农使，检括全国各州浮户及籍外土地。本年，张遂作《大衍历》。梁令瓒作黄道游仪。四月，兰池州康待宾起义。
开元十年	722	五月，许、汝、陈州大水。八月，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等州。九月，京城权梁山起义。

开元十一年	723	九月，令诸州各置医博士一人。十一月，募白丁12万为“长从宿卫”。
开元十二年	724	三月，今太史南宫说等实测子午线。八月，宇文融括天下户80余万，“田亦称是”。
开元十三年	725	四月，改集仙殿为集贤殿，置学士和直学士。十月，张遂作成水运浑天仪。
开元十四年	726	正月，更立契丹松漠王为广化王，奚饶乐王为奉诚王，并妻以公主。本年，黑水靺鞨遣使入见，唐在黑水靺鞨置黑水都督府。全国人口增至7 069 500余户，4 140余万口。
开元十五年	727	九月，全国63州大水，17州霜旱。本年，张遂完成《大衍历》。
开元十六年	728	正月，泷州陈行范起义，陷40余城，被杨思勗镇压。八月，颁行《大衍历》。
开元十七年	729	三月，限明经进士每年不得过百人。八月，禁私卖铜铁锡铅。
开元十八年	730	三月，复京官职田，本年恢复公廨本钱。
开元十九年	731	正月，吐蕃求《春秋》、《毛诗》、《礼记》，许之。
开元廿年	732	九月，萧嵩等上新修《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制所司行用之。本年全国户口增至7 861 236户，45 431 265口。
开元廿一年	733	正月，制每年科举加试老子策。九月，裴耀卿奏请于河口、三门东西各置仓。本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各置采访使。
开元廿二年	734	五月，李林甫任宰相。敕禁买卖口分田。本年日本吉备真备携带《唐礼》、《大衍历》、《乐书》回国。裴耀卿改革漕运。
开元廿三年	735	三月，敕礼部侍郎知贡举。七月，诸公主实封加至千户。
开元廿四年	736	六月，醴泉刘志诚起义。本年减少官员年支五六十万贯。歙州洪贞起义。
开元廿五年	737	九月，重新颁布均田租庸调法。

开元廿六年	738	六月，渤海求《唐礼》、《三国志》、《晋书》，许之。九月，皮逻阁统一六诏。
开元廿八年	740	三月，西突厥亡。本年全国人口增至 8 412 871 户，4 814 万口。
开元廿九年	741	正月，始置玄学，博士助教各一人，设道举科。六月，吐蕃 40 万人寇。十一月，安禄山任营州刺史充平卢军使及四府经略使。
天宝元年	742	正月，安禄山兼任平卢节度使。二月，改官名更州为郡。本年天下郡府 362，沿边置十节度。全国人口增至 899 800 户，4 899 800 口，凡拥兵 49 万。
天宝二年	743	三月，转运使韦坚引灌水作广运潭。四月，南海吴令光起义。
天宝三载	744	正月，改年为载。二月，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
天宝四载	745	八月，玄宗以杨太真为贵妃。九月，安禄山打败奚、契丹。
天宝五载	746	本年海内富实，米斗价 13 钱，青齐斗米 3 钱。绢一匹 200。天下岁入粟 1 980 余万斛，庸调绢 740 万匹，地税钱 200 余万缗，绵 180 余万屯，布1 035万端。
天宝六载	747	正月，以安禄山为御史大夫。十一月，宰相李林甫屡置冤狱，被诛者数百家。十二月，高仙芝远征小勃律，执其王。
天宝七载	748	六月，赐安禄山铁券，以杨钊（国忠）判度支。十月，封杨妃二姊为国夫人。
天宝八载	749	四月，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彻底破坏。
天宝九载	750	五月，安禄山进封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从此开始。八月，以安禄山兼任河北采访处置使。十二月，南诏王阁罗风起兵攻陷云南。
天宝十载	751	正月，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八月，鲜于仲通被南诏打败。高仙芝被大食打败，中国造纸法西传。

天宝十一载	752	五月，杨国忠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林甫死，以杨国忠兼宰相及吏部尚书。
天宝十二载	753	六月，杨国忠以十万兵进攻南诏失败。本年全国9 619 254户，52 880 488口。
天宝十三载	754	二月，唐僧鉴真一行到达日本。八月，关中大饥。制举人策外加试诗赋各一首。
天宝十四载	755	二月，安禄山以蕃将32人代汉将。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叛乱。十二月，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反击叛军。武牢之战，唐军大败，安禄山陷东都。
肃宗至德元载	756	正月，安禄山称大燕皇帝。五月，郭子仪等反击，光复河北十余郡。鲁炅坚守南阳。六月，潼关失守，叛军攻入长安。玄宗奔蜀，途中被迫杀杨贵妃、杨国忠。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十二月，吐蕃攻陷威戒、神威军及石堡城。
至德二载	757	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叛将尹子奇围攻睢阳，张巡、许远坚守。九月，唐军15万攻入长安。十月，唐军收复两京。肃宗还长安。安庆绪奔邺。十二月，李隆基回长安。宦官李辅国专权。
乾元元年	758	二月，改载为年。五月，停采访使。改黜陟使为观察使。九月，以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十月，史思明援安庆绪。
乾元二年	759	二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不克。三月，史思明杀安庆绪。四月，史思明称大燕皇帝。九月，叛军二次攻入东都。
上元元年	760	五月，以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度支铸钱盐铁使，实行食盐专卖。六月，岁荒，斗米七千钱，人相食。本年人口减至1 931 145户。
上元二年	761	三月，史思明被其子朝义所杀。
代宗宝应元年	762	三月，封郭子仪为汾阳王，镇河东。四月，玄宗、肃宗死，李豫即位，改元宝应。五月，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八月，台州袁晁起义，占领浙东州县。十月，唐军大败史朝义，收复东都。

广德元年	763	正月，史朝义自杀，安史乱平。七月，吐蕃入寇，尽取河西陇右地。十月，代宗奔陕郡，吐蕃入长安。郭子仪率兵反攻。十二月，代宗还都，以鱼朝恩掌禁军。
广德二年	764	七月，开征天下青苗钱。八月，仆固怀恩叛唐勾结回纥吐蕃入寇。
永泰元年	765	三月，吐蕃请和。五月，李正己逐侯希逸，诏许其留后，占据山东。本年宣饶方清、陈庄起义。
大历二年	767	正月，分剑南，置东川。本年，河东、江南之道55州水灾。
大历三年	768	正月，代宗至章敬寺，度僧千人。六月，幽州节度使李怀仙被朱希彩所杀，自称留后。桂州万重光起义。
大历四年	769	十二月，敕京兆府地税分夏秋两次征收，税额大增。户税税额增加。
大历八年	773	八月，回纥遣使以马万匹求互市。十月，吐蕃寇泾、邠等州。九月，岭南哥舒晃叛。
大历十年	775	正月，田承嗣陷相州，攻洺、卫二州。三月，陕州军乱，逐兵马使赵令珍。四月，幽州、卢龙留后朱滔、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等受诏分道讨田承嗣。八月，田承嗣等束身归朝。
大历十一年	776	正月，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20万众。恢复田承嗣官爵。
大历十二年	777	五月，李正己拥兵10万，据淄青等15州。田承嗣拥兵5万，据魏博等7州。李宝臣拥兵5万，据恒、易等7州。梁崇义拥兵2万，据襄邓6州以对抗朝廷。
大历十四年	779	五月，代宗死，李适即皇帝位。十月，吐蕃、南诏入寇。
建中元年	780	二月，废租庸调、地税、户税制，实施两税法。湖南王国良起义。

建中二年	781	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子惟岳袭位，不准，于是河北四镇叛乱。六月，以李希烈为汉南北兵马使，督诸道兵讨之。七月，李晟破田悦于临。八月，梁崇义败死。
建中三年	782	闰正月，王武俊袭杀李惟岳。四月，诏括富商钱。五月，诏天下税每缗加两百。十月，以朱滔为盟主，田悦、王武俊、李纳皆称王，反抗朝廷。十二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
建中四年	783	五月，初行间架税、除陌钱。八月，泾州兵变，攻进长安，德宗逃奔奉天，朱泚据长安称帝。
兴元元年	784	正月，田悦、王武俊等上表“谢罪”。五月，李晟浑瑊率兵收复长安，朱泚走死。七月，德宗还长安。十月，宦官窦文场为神策军兵马使。
贞元元年	785	八月，马燧平河中李怀光。十二月，户部奏岁贡者 150 州。
贞元二年	786	四月，淮西将陈僊奇杀李希烈以降。唐以陈仙奇为节度使。七月，陈仙奇被吴少诚所杀，唐以吴少诚留后。
贞元三年	787	八月，吐蕃率羌浑之众寇陇州。十月，大稔，诏所在“和籴”。
贞元四年	788	五月，吐蕃以三万军寇泾、邠、庆、鄜等州。
贞元六年	790	正月，皇帝迎佛骨。六月，吐蕃陷安西，北庭及沙陀降吐蕃，惟西州为唐所守。
贞元七年	791	二月，回鹘奉诚可汗立。三月，关中大疫。
贞元八年	792	五月，京兆加青苗钱。40 余州大水。十一月，宦官窦文场掌左神策军。
贞元十年	794	五月，钦州黄少卿起义。陆贽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贞元十一年	795	二月，册封嵩命为渤海郡王。幽州打破奚王啜利军六万余众。十月，南诏攻吐蕃。
贞元十二年	796	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宦官权益重。

贞元十三年	797	二月，筑方渠、合道、木坡三城，以备吐蕃。十二月，宦官为宫市使。
贞元十四年	798	闰五月，夕州军乱，逐神策行营节度使韩全义。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统军，凡15万人。
贞元十五年	799	二月，宣武军叛，杀节度使陆长源。十二月，吐蕃5万，分击嶲州及南诏。
贞元十六年	800	正月，韩全义统十七道兵讨吴少诚。十月，诏赦吴少诚及其将士。
贞元十七年	801	七月，韦皋以九道兵大破吐蕃于维州。十月，杜佑进《通典》。
贞元十八年	802	正月，骠国遣使入贡，献其乐12曲，乐工35人。
顺宗永贞元年	805	正月，德宗死，太子诵即位。王叔文、王伾掌权。罢宫市及五坊小儿，放宫女，惩贪暴，擢贤良。八月，大宦官俱文珍等废顺宗，立太子李纯。十一月，贬王叔文等。
宪宗元和元年	806	三月，西川节度使刘辟叛，敕令高崇文讨伐。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本年，定两税三分制。
元和二年	807	十月，镇海节度使李錡叛。朝廷两税只依江南八道。全国税户2 440 254。
元和三年	808	策士牛僧儒、李宗闵等，李吉甫摈而不用，牛李党争始此。
元和四年	809	正月，渤海王嵩璘死，子元瑜立。闰三月，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六月，禁钱不得过五岭。
元和六年	811	九月，裁减内外官808员及诸司流外1 769人。本年大稔，斗米有值二钱者。
元和八年	813	正月，渤海王元瑜死，子议立。二月，李吉甫进《元和郡县图志》。七月，徙受降城于天德军。绛州有经起义。
元和九年	814	九月，淮西吴元济叛。十月，以严绶为申光招讨使，讨元济。

元和十年	815	十月，行新删定勅格。十一月，吐蕃请求互市，许之。
元和十二年	817	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夜袭蔡州，擒吴元济，淮西平。河南、北大水。
元和十三年	818	四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献清棣二州。五月，以大仁秀为渤海郡王。七月，诏讨伐淄青节度使李师道。
元和十四年	819	正月，韩愈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二月，刘悟杀李师道以降，淄青十二州平。十月，吐蕃兵15万围盐州。
元和十五年	820	正月，宦官陈弘志杀唐宪宗，太子李恒即位。
穆宗长庆元年	821	四月，诏贬李宗闵等10人。七月，幽州留后朱克融叛乱。镇兵叛，以王廷凑留后。九月，唐与吐蕃建立“长庆会盟碑”。
长庆四年	824	正月，穆宗死，敬宗李湛立。九月，波斯献沉香。长安织工张韶起义。
敬宗宝历元年	825	十二月，昭义节度使刘悟死，其子刘从谏请继父位，许之。
宝历二年	826	宦官刘克明杀敬宗立绛王悟，王守澄讨克明，杀悟立文宗李昂。
文宗太和二年	828	三月，令京兆尹造水车，散给郑白渠百姓灌田用。
太和三年	829	十二月，南诏进犯成都，掠百姓工匠数万而去。
太和四年	830	正月，牛僧儒为相，排斥李德裕。十月，以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本年，河南、江南、湖南大水。
太和五年	831	五月，南诏放还所掠百姓工匠4 000人。七月，温造疏浚怀州古渠，灌田5 000顷。九月，吐蕃将悉怛谋以维州来降，牛僧儒拒而不受。
太和六年	832	九月，淄青初定两税上供。本年，剑南、河南、关内饥，浙西剑南大疫。
太和七年	833	六月，河阳修防口堰，灌田5 000余顷。

太和九年	835	十一月，甘露之变。
开成元年	836	九月，私书省集贤院应欠书 45 261 卷，配诸道缮写。
开成三年	838	八月，山南东道诸州大水。十二月，日本贡珍珠绢。日僧圆仁来唐。
开成四年	839	本年，回鹘乱起，其势渐衰。
开成五年	840	正月，文宗死，宦官陈弘志、仇士良立李炎为武宗。九月，黠戛斯打败回鹘。本年，新罗留唐学生 150 人归国。
武宗会昌元年	841	正月，诏州县所征斛斗一律以额为定，不许随年检责数外。
会昌二年	842	二月，令户部加给河东、凤翔、鄜坊、邠宁等道州府官课钱 66 500 贯。
会昌三年	843	正月，刘沔军大败回鹘。六月，黠戛斯入贡。
会昌四年	844	正月，河东都将杨弁叛乱，旋讨平。六月，裁减州县冗官 1 214 人。
会昌五年	845	七月，敕併省天下佛寺，其余僧尼皆令还俗。八月，凡天下毁寺 4 600 区，还俗僧尼 26 万余，奴婢 15 万人，没收土地数十万顷。本年全国人口计 4 955 151 户。
会昌六年	846	三月，武宗死，李德裕失势，宦官拥光王李忱即位。洪州刘大朴起义。七月，回鹘乌介可汗被杀，立其弟特勒遏捻为可汗。
宣宗大中元年	847	二月，敕许恢复佛教。十二月，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后又贬崖州）。
大中三年	849	二月，吐蕃所控制的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七关来降。八月，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土田，5 年不征税。
大中五年	851	十月，沙州张议潮起义，打败吐蕃，解放瓜、沙、伊等十州，河湟之地重新归唐，任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大中九年	855	闰四月，诏州县作差科簿。七月，浙东兵变，逐观察使李讷。
大中十二年	858	二月，渤海王彝震死，其弟虔晃立。四月，岭南兵变，囚节度使杨发。八月，河南、河北、淮南大水，漂没数万家。
大中十三年	859	八月，宣宗李忱死，宦官拥立李漼为懿宗。十二月，裘甫在浙东起义。
咸通元年	860	正月，裘甫起义，攻克剡县。二月，裘甫自称都知兵马使，建元“罗平”。七月，农民军在大梁山战败。八月，裘甫牺牲。
咸通三年	862	五月，分岭南为东西两道，以广东为东道，邕州为西道。七月，徐州兵变。十一月，南诏攻安南。
咸通四年	863	正月，南诏攻陷交阯，杀虏15万人。七月，东都、许、汝、徐、泗大水。发山东兵万人镇交州。
咸通七年	866	六月，高骈大破南诏于交阯。十二月，黠戛斯遣使入贡。
咸通九年	868	七月，桂州戍卒推庞勋起义。十月，庞勋攻克宿州。兵变转为农民起义。庞勋克徐州。十二月，农民军取得都梁城大捷。本年江淮旱蝗。雕版印刷金刚经。
咸通十年	869	二月，王弘立在鹿唐寨战败。四月，庞勋在柳子被康承训打败。九月，张玄稔降唐，宿州陷。庞勋战死蕲县西。十月，濠州失陷，吴迥牺牲，庞勋起义告终。
咸通十四年	873	五月，南诏寇西川，黔南。七月，懿宗死，宦官立普王李俨。八月，关东、河南大水。
僖宗乾符元年	874	关中旱饥，濮州人王仙芝起义于长垣。
乾符二年	875	五月，王仙芝克濮州。六月，克曹州。冤句人黄巢参加起义。十二月，唐以宋威镇压黄巢。

乾符三年	876	二月，敕各地置刀弓皷鼓以反击农民军。七月，宋威破王仙芝于沂州。九月，农民军克汝州，掳刺史王镣。十一月，克郢王复州。十二月，王仙芝在蕲州欲降，被黄巢所阻。从此黄、王二人分兵。
乾符四年	877	二月，王仙芝破鄂州。黄巢克郓州、沂州。七月，王仙芝、黄巢攻宋州不克。八月，农民军转攻安州、隋州，克之。十一月，黄巢北攻匡城、濮州。王仙芝遣尚让洽降，为宋威所获。
乾符五年	878	二月，王仙芝败死于黄梅，黄巢自称黄王，建元王霸。十二月，黄巢克福州。
乾符六年	879	九月，黄巢克广州。闰十月，黄巢开始北伐。十一月，农民军破江防，荆门之战被唐军打败，回军转战至饶、信、杭诸州，众20万。
广明元年	880	五月，黄巢在信州大捷，高骈骁将张璘败死。七月，黄巢自采石飞渡长江北进。九月，黄巢渡淮而北。十一月，黄巢克东都。十二月，黄巢打破潼关，攻克长安，建大齐政权，改元金统。唐僖宗逃奔成都。
广明二年 中和元年	881	三月，尚让、王播、林言等在龙尾陂为郑畋所败。四月，唐弘夫一度攻入长安，旋被黄巢所逐。
中和二年	882	二月，朱温率农民军克同州。阡能起义于邛州、雅州。九月，朱温降于王重荣。十一月，李克用率沙陀军南下，镇压农民起义。阡能起义最后失败。
中和三年	883	二月，尚让等在梁田陂被唐军打败，损数万众。四月，黄巢由长安东撤。五月，唐节度使秦宗权以蔡州降黄巢。六月，黄巢开始围攻陈州。
中和四年	884	四月，围陈之役失败，黄巢退居故阳里。五月，黄巢在王满渡为李克用所败。六月，黄巢自杀于狼虎谷，唐末农民战争告终。

光启元年	885	三月，唐僖宗还都。秦宗权称帝自置百官。六月，秦宗权陷东都。七月，宦官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十二月，李克用以援王重荣为名逼近长安，田令孜挟僖宗奔凤翔。
光启二年	886	正月，田令孜劫僖宗奔宝鸡。四月，朱玫奉襄王李煴监国，玫自为左右神策十军使。五月，诏讨朱玫。王行瑜杀朱玫。王重荣执杀李煴。荆襄大饥。
光启三年	887	三月，僖宗还凤翔。四月，朱全忠击破秦宗权。
昭宗文德元年	888	二月，僖宗还长安。三月，僖宗死，其弟李敏（杰）即位。四月，孙儒克扬州，杨行密奔还庐州。十二月，蔡将申丛执秦宗权降朱全忠。
龙纪元年	889	二月，秦宗权被杀。三月，封朱全忠为东平郡王。七月，诏杭州置武威军，以钱镠为防御招讨使。
大顺元年	890	二月，朱全忠进位中书令。五月，诏以朱全忠取潞州，攻昭义。
大顺二年	891	正月，孙儒攻宣州。八月，罢宦官杨复恭兵，出为凤翔监军。王建克成都。十月，杨复恭反，走兴元，以王建为西川节度使。
景福元年	892	正月，凤翔李茂贞、靖难王行瑜等请讨杨复恭。二月，以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三月，置武胜军于杭州，以钱镠为防御使。李茂贞攻克兴元，杨复恭奔阆州。十月，以李存孝为邢洺磁节度使。
景福二年	893	五月，王潮取福州。时溥焚死，朱全忠领其地徐州。九月，钱镠据浙江，授以镇海节度使。杀宰相杜让能。李茂贞进中书令，尽有凤翔、兴元二十五州之地。
乾宁元年	894	五月，刘建锋据潭州，称留后。七月，李茂贞攻陷阆州，杨复恭逃至乾元被执。
乾宁二年	895	五月，李茂贞、王行瑜、韩建率兵数千人入朝，京师大恐。七月，削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为行营都统。十二月，李克用晋爵晋王。

乾宁四年	897	二月，朱全忠取郓、齐、曹、棣、兖、沂、密、徐、许、陈、汝、郑、滑、濮等州。
光化元年	898	正月，昭宗下罪己诏，复李茂贞官爵。三月，以朱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三镇节度使。四月，朱全忠打败李克用，克洺州。五月，全忠取邢磁二州。八月，昭宗归长安。
光化二年	899	三月，朱全忠大败刘仁恭军。五月，李克用攻拔潞州。十一月，陕州都将朱友谦杀李璠，附全忠。马殷攻郴连诸州，尽有湖南之地。
光化三年	900	十月，马殷取桂、宜、岩、柳、象五州地。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幽昭宗于少阳院，立太子李裕为帝。
天复元年	901	正月，孙德昭杀刘季述，昭宗复位，黜太子。李茂贞人总朝政。十一月，韩全诲等劫昭宗至凤翔。朱全忠取华州。本年，黄巢余部黄浩据浏阳，被土豪镇压。
天复二年	902	五月，朱全忠围凤翔。九月，李茂贞攻朱全忠失败。十月，朱全忠遣使迎昭宗。十二月，朱全忠与李茂贞和。
天复三年	903	正月，李茂贞杀韩全诲。昭宗还长安。朱全忠杀宦官 800 余人。二月，进封朱全忠为梁王。
昭宣帝天佑元年	904	闰四月，朱全忠挟昭宗至洛阳。八月，全忠杀昭宗，立太子李祚为帝。
天佑二年	905	二月，朱全忠杀唐宗室李裕等 10 余人。杀唐臣独孤损、裴枢等 30 余人。
天佑三年	906	九月，朱全忠率军北攻沧州刘守文。幽州刘仁恭令征境内 15 岁以上 70 岁以下男丁充军以救沧州。十月，王建立行台于蜀。朱全忠以高季昌为荆南留后。
天佑四年	907	四月，朱全忠篡唐，国号梁，改元开平，都开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隋唐史话　　下
作者＝乌廷玉著
页数＝４３８
ＳＳ号＝１２４２３８４１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１０